

La femme gelée

Annie Ernaux



被冻住的女人

著

[法] 安妮·埃尔诺

译

曹冬雪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开头描写了安妮·埃尔诺在少女时代性别意识的觉醒，以及希望未来在自主选择的职业中实现自我的雄心。后来，她三十岁了，成了一名教师，嫁给了一位高管，还是两个幼子的母亲。她打理着他们漂亮的公寓，抚养着孩子。然而，像千千万万的其他女性一样，她感到自己的热情和好奇心、力量和幸福，在婚姻生活中被消磨殆尽。她周围的每个人似乎都认为这是正常的，是“令人钦佩”的女性状态，但这种状态却折磨着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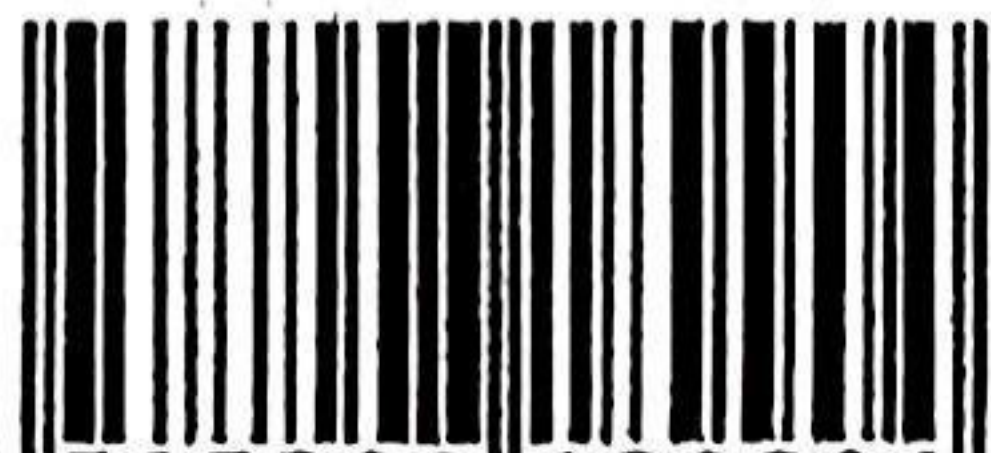
在埃尔诺看来，从女孩到妻子、母亲的过程，就是一个发现和确认文化和教育造成的非理性的男女差异的过程。在书里，被冻住的女人的名字直到最后都无人知晓，主人公的故事也可能成为每个女人的故事。

《被冻住的女人》是安妮·埃尔诺的第三部作品，也是作者本人称之为“小说”的最后一部作品。此后，她经历了与丈夫的离婚、父亲的死亡，创造出标志性的简洁形式。

埃尔诺“以勇气和临床医生般的敏锐揭示出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她“始终如一地从不同角度审视在性别、语言和阶层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生活”。

——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

ISBN 978-7-208-18990-4



9 787208 189904 >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
定价：52.00 元

Amie Zraux

La femme gelée
Annie Ernaux

被冻住的女人

著

[法] **安妮·埃尔诺**

译

曹冬雪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安妮·埃尔诺出生于法国利勒博纳，在诺曼底的伊沃托度过青年时代。持有现代文学国家教师资格证，曾在安纳西、蓬图瓦兹和国家远程教育中心教书。她住在瓦兹谷地区的塞尔吉。2022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译者简介：

曹冬雪，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理工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法语教师，译有《形影不离》《正义与批评》《论美国的民主》等作品。

“安妮·埃尔诺作品集” 中文版序言

当我二十岁开始写作时，我认为文学的目的是改变现实的样貌，剥离其物质层面的东西，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写人们所经历过的事情。比如，那时我认为我的家庭环境和我父母作为咖啡杂货店店主的职业，以及我所居住的平民街区的生活，都是“低于文学”的。同样，与我的身体和我作为一个女孩的经历（两年半前遭受的一次性暴力）有关的一切，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得到升华，它们是不能进入文学的。然而，用我的第一部作品作为尝试，我失败了，它被出版商拒绝。有时我会想：幸好是这样。因为十年后，我对文学的看法已经不一样了。这是因为在此期间，我撞击到了现实。地下堕胎的现实，我负责家务、照顾两个孩子和从事一份教师工作的婚姻生活的现实，学识使

我与之疏远的父亲的突然死亡的现实。我发觉，写作对我来说只能是这样：通过我所经历的，或者我在周遭世界所生活的和观察到的，把现实揭露出来。第一人称，“我”，自然而然地作为一种工具出现，它能够锻造记忆，捕捉和展现我们生活中难以察觉的东西。这个冒着风险说出一切的“我”，除了理解和分享之外，没有其他的顾虑。

我所写的书都是这种愿望的结果——把个体和私密的东西转化为一种可知可感的实体，可以让他人理解。这些书以不同的形式潜入身体、爱的激情、社会的羞耻、疾病、亲人的死亡这些共同经验中。与此同时，它们寻求改变社会和文化上的等级差异，质疑男性目光对世界的统治。通过这种方式，它们有助于实现我自己对文学的期许：带来更多的认知和更多的自由。

安妮·埃尔诺

2023 年 2 月

目 录

“安妮·埃尔诺作品集” 中文版序言	1
被冻住的女人	1

致菲利普

她们脆弱、轻盈，是双手柔嫩的仙女，是家里的阵阵微风，安静地创造秩序与美，她们沉默寡言，百依百顺，这样的女性即使我百般寻觅，在我整个童年境况中也寥寥无几。甚至很难见到稍逊一些的类型：没那么优雅，更能干粗活，把厨房水槽擦得锃亮如镜，合理利用剩饭剩菜，家务全部做完后，提前一刻钟到学校门口等候放学铃声响起，至死都将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我身边的那些女人，一个个大嗓门，身材走样，不是太胖就是太平，手指粗糙，要么素面朝天，要么浓妆艳抹，脸颊和嘴唇涂得通红。她们的烹饪手艺止于炖兔肉和烤米糕¹，米糕烤出来甚至还是黏糊糊的。她们想都没想过家里的灰尘应当每日清

扫，她们曾经或仍然在田间、厂里或一些从早到晚营业的小店铺里干活。有些老太太，我们会在周日下午去看望，去的时候要带着手指饼干和烧酒，把酒滴进咖啡里喝。她们黑黝黝的，伤痛缠身，裙子散发着食品柜里过期黄油的气味。她们完全不像书里那些盘着银色发髻、温柔的老奶奶，一边给孩子讲仙女故事一边爱抚着他们，这些老奶奶被称作“祖母”。而我祖辈的那些女人，无论是我的阿姨奶奶还是我外婆，都不太随和，她们不喜欢小孩子扑到自己围裙里，已经没有这个习惯，仅仅只在见面和分别的时候亲一下，随口来一句“你又长高了”，“学习一直挺好的吧”，其他就没什么可跟我说的了。她们用方言跟我父母聊天，议论高昂的生活成本、房租、住房实际使用面积和街坊邻居，有时会笑着看看我。夏天，我们常常会在周日骑车去卡罗琳娜姨奶奶家，路面崎岖不平，稍微下点雨就泥泞不堪，世界尽头，两三座农舍跟原野上的牧草齐高。到了她家，我们打开门闩，心

里不抱太大希望，卡罗琳娜从来都不在家，要到旁边那些房子里去打听。找到她时，她正在捆洋葱或在给母牛接生。一回到家，她就劈柴生火，给我们弄晚饭，有溏心蛋、面包、黄油和白芷利口酒。我们看着她，敬佩不已：“卡罗琳娜，你总是忙个不停！你不感到厌烦吗？”她笑着回一句：“你说怎么办呢，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像这样，有时会害怕吧，孤零零一个人……她吃了一惊，眯着眼：“在我这个年纪别人还能对我做什么？……”我不怎么听，来到池塘附近，沿着围墙向前走，墙脚的荨麻长得比我还要高，我把盘子碎片翻过来，姨奶奶扔到那里的罐头盒子，都已经生锈了，里面装满水和小虫。天气晴朗时，卡罗琳娜经常会送我们一程，跟在自行车旁边走个一公里。然后我们看到她小小的身影消失在油菜地里。这个八十岁的女人，即使在夏天最热的时候，也总是裹着紧身胸衣和长裙，我知道她既不需要怜悯，也不需要保护。爱丽丝姨奶奶同样如此。她一身颤动的肥肉

但手脚灵活，不怎么爱干净。我从她家床底爬出来时，裙边上粘满了一团团尘絮。一把还沾有油污的勺子在我手里转了又转，我才鼓起勇气挑开炖梨起皱的皮。她盯着我，不解地说“你怎么不吃”，然后哈哈大笑，“它不会堵住你的屁眼！”同样如此的还有我外婆。她住在盖德区铁路和木材厂之间的一座棚屋里。当我们到她家时，她要么在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要么就是在给兔子弄吃的，我母亲气不打一处来：“都这把年纪了，就不能歇歇。”这样的指责让外婆很是恼火。几年前，她紧紧抓着野草爬上铁轨，将苹果和苹果起泡酒卖给登陆的美国大兵。她一边嘟囔着一边把平底锅端过来，锅里的咖啡仍在沸腾，白色的泡沫上下翻滚。还有残余的糖黏在杯底，她把起泡酒倒进去。大家都在慢慢地摇晃杯子，用酒把杯里的残糖涮干净。他们聊着天，说来说去无非邻里之间那些事，以及埋怨房东不肯修房子，我有点厌烦，这房子又小又没有平坦的地面，不指望能有什么新发现，也

没什么可吃的，外婆使劲要把杯底残余的几滴酒吸进嘴里。我看着她的脸，颧骨凸起，脸色就跟她补袜子时用的黄杨木蛋一样黄。有时，在菜园子的一角，她以为没人看见，便将黑色长裙下的两腿岔开，站着撒尿。然而，她以全区第一名拿到小学毕业证书，本来有可能成为小学教师，但她母亲说，这辈子都不可能，她是长女，家里还有五个小的需要她照顾。这段被讲了无数遍的故事，用来解释一种不太美好的命运。她当时像我一样往前奔跑，对一切没有丝毫怀疑，她去上学，突然厄运猛扑在她身上，五个小毛娃把她往后拽，一切都结束了。我不理解的是，后来她自己也生了六个，而且你知道，那会儿可没有生育津贴可领。不需要别人跟我描绘，我很早就知道，小孩子们，或者按我周围人的说法，小崽子们，带来的是真正的穷困，绝对的灾难。同时也意味着堕落放纵，没脑子，穷人，等等。我周围的多子女家庭，是成群结队吸溜着脏鼻涕的孩子，是婴儿车不离身的女人，她们身上

挂着大大小小塞满食物的包裹，走起路来步履沉重，左右摇晃，每到月底便怨声载道。外婆任由自己生那么多，但不该指责她，六个、十个孩子，在从前这很正常，现在不一样了。我的姨妈、舅舅们自己受够了多子女之苦，因此我的表兄弟很多都是家中独子。我也是独苗，而且是“迟生子”，这个词指的是一类特殊的孩子，他们诞生于一种古老的欲望，父母原先并不想要或不再想要孩子，转念之间生下了他们。我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这是肯定的。我深信自己走了好运。

索朗日姨妈是个例外。用我母亲的话说，养一大帮孩子的可怜的索朗日。她也住在盖德区，周日我们经常去她家。如同一场没有禁令也没有空间限制的大课间活动。夏天，七个表兄弟姐妹，还有街坊邻居的孩子，我跟他们一边荡秋千一边尖叫，秋千是用堆在工厂旁的木板做的。冬天我们挤在唯一一间摆满床的大房间里玩耍。我狂热地沉浸在那热烈与躁动的气氛中，要是气氛再热烈几分，我简直想要住在那里。但

我看到索朗日姨妈就有些害怕，她已经显露老态，一直在厨房忙个不停，嘴巴时而抽搐变形。有好几个月她都是躺在床上跟我们说话，子宫已经开始在她的肚子里晃动。有时候她眼睛定定地看着前方，把窗户打开又关上，把椅子挪来挪去，突然她就爆发了，大喊着要带孩子们走，说她一直过得不幸福，我姨父端着酒杯静静坐在桌旁，要么一言不发，要么冷笑道：“你不知道自己能去哪儿，蠢货。”她冲到院子里，哭喊着：“我要跳进蓄水池里。”孩子们在前面拦住她，有时是邻居过来拦。在 first 声吵闹响起时，我们就悄悄溜走了。一扭头，我看到最小的那个女孩脸贴在窗户上，张着嘴默默流泪。

我不知道其他姨妈是否过得幸福，但她们不像索朗日那样面如死灰，也不会挨揍。她们脾气暴躁，嘴唇和面颊通红，一直很忙，在我印象中，她们似乎总是行色匆匆，几乎没有时间在路上停留，见到我时，抱紧购物袋弯下腰，干巴巴地亲我一口，大声来一句：

“小丫头你变成啥样了？”她们也没有泛滥的温情，不会噘着嘴，爱意融融地眯着眼跟小孩说话。这是一群有点生硬、粗暴的女人，她们会怒气冲天地骂着脏话，在家族聚餐结束或是在领圣体时，能把头埋在餐巾里笑出泪来。玛德莱娜姨妈甚至不小心露出了她粉色内裤上的褶子。我不记得她们任何一个人在家里做针线活儿或熬酱汁的样子，她们从餐橱里端出熟食拼盘和金字塔形白纸包装的奶油糕点。对于灰尘，收拾屋子，她们全都不在乎，但表面上还是要表示歉意。“你们不要盯着屋子看”，她们说。没有家里的女人，她们全都是外面的女人，从十二岁起就跟男人一样干活，甚至不是在干净的纺织业，而是在缆绳厂或罐头厂。我很愿意听她们说话，向她们提各式各样的问题，警报器、必须要穿的工装、女工头，等等，大家在一间屋里笑成一团。我觉得她们仿佛也在上学，只不过作业和惩罚没那么多。一开始，我还不懂得欣赏高高在上、可怕的女教师，也还不知道盯着即将装满的酸黄瓜罐头

并非美差，那时候我觉得长大后跟她们一样挺好的。

有一位女性，她的形象远远超过外婆和姨妈们那些零零碎碎的印象，她肤色白皙，声音在我心中回响，她的形象包裹着我，那就是我母亲。在她身边生活，我怎么可能不坚信身为女性是一项荣耀，甚至女性的地位高于男性？她是力量与风暴，也是美的化身，她对万事万物感到好奇，她是船首的雕像，为我开启未来，告诉我永远不要对任何事、任何人感到恐惧。她要跟一切作斗争：店里的供货商和不肯老老实实付款的客户，路上的排水沟，随时可能压垮我们的大块头蔬菜。她身后跟着一个温柔的男人，他喜欢胡思乱想，说话时语调平和，任何一点烦心事都能搅得他好几天心神不宁，不过他知晓很多趣事和谜语，像什么“草地里的两百万头毛驴”，他还会在打理菜园子时教我唱歌，而我则忙着抓虫子丢到鸡窝里。这个男人就是我父亲。父母在我头脑里是连为一体的，只不过我是母

亲的“白娃娃”，是父亲的“迟来宝贝”，是两个人改变心意迎来的孩子。我应该像母亲，因为我是个小女生，会像她一样长出乳房，烫头发，穿长筒袜。

“早晨，爸爸去上班，妈妈留在家里做家务，准备美味的饭菜……”我结结巴巴地跟其他同学一起读课文，从不提出疑问。我的父母跟正常父母不一样，那时我还没有因此感到羞耻。

我父亲早晨不出门，下午也不出门，他从不出门，就待在家里。他给人倒咖啡，拿吃的，洗碗，收拾厨房，择菜。他跟我母亲生活在一起，活动轨迹重合，一边是男人们来来往往，另一边是女人和孩子们进进出出，对我来说，这就是整个世界了。他们俩认识同样的人，心怀同样的忧虑，每晚他把收银台抽屉里的钱倒出来，她看着他清点，两个人异口同声，或者其中一个说“不多”，有时则是“今天还可以”。第二天，他们中的一个会带着钱去邮局。两个人做的工作不完全一样，是的，一直存在固定的分

工，但只有母亲洗熨衣服、父亲打理菜园子是受到传统影响，其余的似乎是根据个人喜好与能力进行的分工。母亲主要负责食品杂货店，父亲则负责咖啡馆。一边是中午的熙熙攘攘，分秒必争，顾客都不想等，都站着，有各种诉求，一瓶啤酒，一包大头针，总是半信半疑，要一直说服他们，您看那个牌子的质量更好。要眉飞色舞，要能说会道。母亲从店里出来时很疲劳，却容光焕发。另一边是自在的小酌，男人们安静地坐着，任由时间流逝，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不必急躁，无需推销商品，甚至不需要跟顾客攀谈，他们自己聊自己的。正好，父亲的脾气阴晴不定，这是母亲说的。而且，咖啡馆的人不会占用他全部时间，他还能做不少其他事。锅碗瓢盆的音乐伴着收音机里的歌声和《纳内特维他命的发现》节目，该儿童节目由巴那尼亚食品公司赞助播出，就在这一片声响中，我终于醒来，下楼走到厨房，看到父亲正在清洗昨晚的餐具。他给我准备午餐，送我去上学，回

来后还要做饭。下午，他要么在院子里做木工，要么扛着铲子去菜园。他削土豆皮，带状的土豆皮从他指缝间盘旋而下；他在烤架上翻弄熏鲱鱼，把我们熏得够呛；他一边种韭葱苗一边教我吹口哨。无论他做什么，于我而言没有区别，他一直是那个慢悠悠、爱胡思乱想的男人。一天当中无论何时都可以见到他安静笃定的样子。跟周边那些工人，一整天都在外的职员相比，我觉得父亲一直在度假，这正合我意。当我和其他女孩闹翻时，当周四天气太冷无法在院子里玩耍时，我们会一起在咖啡馆玩多米诺骨牌或跳棋。春日里，我陪他一起去菜园，种菜是他的一大爱好。他教会我各种稀奇古怪的菜名，美德稻草洋葱、肥胖金发懒惰生菜，诸如此类。我跟他一起把种植绳拉在翻整过的土地上。我们一起给自己结结实实加个餐，有熏猪肉和黑皮萝卜，吃完后把盘子转到另一边品尝煮苹果。周六，我看着他打死兔子，搓揉兔子仍然软绵绵的肚皮，让兔子把尿都尿出来，他给兔子剥皮的声音

听起来像是在撕一块旧布。他是抚慰疼痛的爸爸，急忙跑来查看我流血的膝盖，然后去给我找药。在我得水痘、麻疹、百日咳时，他寸步不离，守在床头给我读《小妇人》或陪我玩刽子手字谜游戏；他是个孩童般的爸爸，“你比她还笨”，妈妈说。他乐于带我去集市，去看费南代尔的电影，给我做高跷，教我说战前的土话，我含糊不清地模仿那些词的发音，“贝贝得里斯塔”“索茨格”，乐在其中；他也是不可缺少的爸爸，送我去上学，中午和晚上在校门口等我，手扶着自行车，跟聚在一起的母亲们稍微保持着距离，他用铁夹子夹紧裤脚。他生怕迟到一分钟。后来我长大了些，能自己一个人出门，他总是等我回家。一个上了年纪才有女儿的喜不自胜的父亲。在记忆中一成不变的橘黄色光线下，他穿过院子，低头避开阳光，胳膊底下挎着个篮子。我四岁那年，他教我怎么穿大衣，要先把里面的毛衣袖口攥在手心里，要不然袖子会挤到胳膊上面。跟他相关的所有画面都那么温馨有爱。

不允许别人顶嘴的一家之主们、在家里吼来吼去的粗汉们、战场上或职场上的英雄们，对你们我一无所知，我是那个男人的女儿。

什么俄狄浦斯情结，我才不信。我也爱她，我的母亲。

我听见从她喉咙里发出的深沉的嗓音，是她。在那些聚会的夜晚，我趴在她腿上昏昏睡去，一阵风，开关门的嘎吱声，一切都在她身边颤动乃至爆裂。有那么神奇的一天，让所有人始料不及，烟灰缸从窗户飞出去，在一个送货人脚下摔得粉碎，他晕头晕脑地忘了给我们送来某件货物。这是她一次怒火中烧的结果，她那些让人提神醒脑的怒火。她嚷嚷着干这一行烦死了，说归说，一会儿便平静下来，瓶子里装着能让人舌头变红的虞美人花糖，大盒子里有散装饼干，我们俩抓几块出来吃，以此在她的坏脾气发作之后安慰自己。我知道，我们都知道她口口声声说想要健康，想要快乐，但实际上她永远不会厌倦当老板娘，

即使只是家小店，那也是不折不扣的老板娘。她说不管怎样她做好了分内事。她四分之三的时间都贡献给了店铺。接待推销员的是她，核对发票的是她，计算税金的也是她。有些日子充斥着低沉的窃窃私语，只见她在一摞纸前坐定，小声数着账单，把手指蘸湿了点发票，这时千万不能打扰她。这样的日子显得异常安静，因为平日里，生活围绕着她噼啪作响。瓶瓶罐罐的碰撞、秤盘的震动、关于疾病和死亡的故事，唯一宁静的时刻，是她在卡门贝尔奶酪或一公斤装的糖袋子背面算一笔粗账，接着又能听到经常光顾的年轻姑娘们的故事，还有求职经历或者是更年期的那些事。世界的第一声回音是经由母亲传给我的。我从来都不知道，在有些家庭，屋内安静得只能听到缝纫机的哒哒声，母亲们只弄出很小的动静，用双手创造秩序和空白。我曾经跟同班女生一起到共和国街或克莱蒙梭大道，敲那些高档住宅的门，我们手里捏着宣传结核病防控的邮票。等了很久，门后面都毫无动静，

然后门开了一道缝，胆小的女人畏畏缩缩站在前厅，身后飘来炖菜的味道，她们躲在阴影里，让人感到压抑，见到我们之后迅速把门关上，很不高兴自己被打扰了。而我母亲，她站在乌泱泱的人群中间，人群中有只在午后来买东西的女人，她们喜欢聊自己的生活；有一小时跑三趟的孩子，就只为了买两块焦糖老鼠巧克力²或一块“壮汉”口香糖；有颤巍巍收起零钱的老人，要一只胳膊撑在柜台上才能将掉在地上的袋子捡起来。我想象不出她还能扮演其他什么角色。

妈妈大扫除做得很细致，刷子、掸子齐上阵。这卫生搞的！这鸡毛掸子飞的！在我们家，大扫除意味着周六的大型灾难现场，到处充斥着漂白水的味道，咖啡馆的椅子都放到桌面上了。母亲凌乱的头发遮住了眼睛，她双脚湿透，朝我大喊让我不要靠近。大扫除也意味着复活节前后淡淡的石膏味道，那是墙壁在被狠狠洗刷之后散发出来的，还有堆在角落里的被子，全混在一起堆成金字塔形摇摇欲坠的家具，只见

她手脚着地，用钢丝球擦洗地板，我瞥见她粉色的吊袜带，在这之后的几天，椅子面往往会黏住大腿。忙乱成这样她自己似乎受不了，我跟父亲也受不了，水和蜡泛滥成灾，简直吓人。幸运的是，我可以钻进床垫卷成的隧道里。而且这样的大扫除一年只做一次。其余时间做的是些零碎的家务，正在熨床单，门铃响了，来了位女顾客，如果傍晚时分床单和其他东西不再占用厨房的桌子，时间就卡得刚刚好。一到五点，她会喊一嗓子：“我有五分钟时间，马上去铺床！”床还没铺好，印象中这是除了周二得洗衣服之外唯一会让她坐立不安的事。周二的客流量不大，她会在周二进行大清洗。可怕的仪式从前一晚就开始准备了，水从外面的水泵引流到小木桶里，五颜六色的衣物在桶里浸泡整夜。第二天，她在洗衣间的水汽里挥汗如雨，浑身脏乱，脾气暴躁，谁都不能来看她。正午时分她重新现身了，浑身散发着洗洁剂的清甜味，一言不发，仿佛是仇恨的化身，至于仇恨什么我并不清

楚。不过，对她来说，灰尘是不存在的，确切说灰尘是某种自然的东西，不会让她感到不舒服。对我而言同样如此，那就是一种干燥的雾，蒙在沙发上，在我把书搬走时会勾勒出花边图形，会在阳光里舞动，落在花瓶或本子上用袖子擦一擦就没了。在十二到十四岁之间，我吃惊地发现灰尘居然是又丑又脏的东西，之前我甚至都见不到。那个阴险的布丽吉特，指着墙根一处说：“哟，这儿很久都没擦了嘛！”我四下寻找，问她：“什么？在哪？”她向我指了指踢脚线细长的边缘，确实变成灰色了，但那儿怎么会需要擦呢？我一直以为那点脏就跟门上的指印和灶台上方的黄色一样，是很正常的。我隐约觉得受到羞辱，觉得母亲失职了，那些地方似乎应该擦洗。再后来，我吃惊地发现还要把煤气灶的灶头、洗手池底部、冰箱和灶台背面擦亮，这些地方我们从来不看，《实用女性》或《晚安》之类的杂志却刊登了不少让家变得更明亮白净的窍门，让家逐渐成为一个时刻需要保养东西的陷

阱。而且，还让人相信做这些事速度很快，一眨眼的功夫就能做好。我在母亲身上见识过速度，喝汤吃肉用同一只盘子，这样可以少洗点盘子，轻快地说那件套衫挺耐脏的不用换，任由东西蒙尘，任其磨损。

就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她不把时间浪费在没完没了的针线活儿上。有时，在冬季的周日，她就像悔悟了一般，试着织点东西。要用平针织一件披巾，于是我们俩仔细计算针数，可织了不到二十厘米就再也没有下文。至于做饭，那是他的事，除了周四一成不变的“法俄”牌甜食，以及节日里的可丽饼和炸糕。到处洋溢着过节的欢快氛围，通常那是在初春时节，在封斋前的“油腻周二”或封斋期的狂欢日。整个下午，一张张可丽饼在锅里烙着，她把可丽饼免费送给咖啡馆的熟客品尝，我双手沾满了糖粒，胃里也填得满满的，当天我们都不再吃晚饭了。或者是把小袋包装的蛋糕送给赶时间的女人，“把你的本子从桌上拿走，别把本子弄脏了”，面粉悬崖坍塌在黄色的蛋液

海里，允许我把手指插到面团里。她把一半葡萄干都留给我，我们俩一起把盆底的奶油刮干净。接下来两周她一个鸡蛋都不舍得敲碎。无论做饭还是做家务，但凡她去做的，都非比寻常，都是随她的心意，突然想打蜡，想擦墙，想要做些糕点让人欢喜。

同样，尽管要处理一摞摞发票，招呼那么多主妇，给一件件商品拆包，她还是能挤出时间，在初晴的日子里五点起床，给玫瑰和有“画家绝望”绰号的珊瑚钟除草，等我睡醒时，她用五月的露水揉搓我的脸颊，“这样肤色更好看了”。更特别的一点是，她随时随地沉浸于阅读。正是这一点让我觉得她比他层次高，他只会在晚饭后怀着了解地区新闻的明确目的读报。我好羡慕她脸上那种奇怪的、自我封闭的、仿佛离开了我也离开了大家的神情，她沦陷于其中的寂静，以及她在一种彻底的静止中突然变得沉重的身体。下午、晚上或周日，她拿出一份报纸或市立图书馆的一本书，书偶尔是买来的。我父亲喊道：“哎，

我说，成天看小说你不觉得烦吗？”她抗议道：“让我把这故事看完！”我好想赶快学会认字，能读懂她喜欢的那些不带插图的长故事。终于有一天，她书里的词语不再是沉重和结结巴巴的。奇迹发生了，我读的不再是词语，我来到美国，十八岁，拥有黑人奴仆，我名叫斯嘉丽，句子竞相朝着结局奔跑，我却想要延迟结局的到来。那本书叫《飘》。她在女顾客们面前赞叹：“您想，她才只有九岁半！”对我说：“感觉不错吧？”我答：“是的。”再没有其他话了。她从来都不知道该怎么精妙地表达自己。但我们能相互理解。从那时起，我们俩之间就存在着那些想象出来的人物，父亲要么不理解，要么加以蔑视：“总归是把时间浪费在谎话上。”她反驳说，他这是妒忌。我把我的青少年“青葱书系”，《简·爱》和《小东西》借给她，她递给我《茅屋夜谈》周刊，我从柜子里偷出来她禁止我看的书，有莫泊桑的《一生》，法朗士的《诸神渴了》。我们一起看着比利时人广场上书店陈列

的书，她提议：“想要我给你买一本吗？”此情此景和在甜品店面对蛋白酥和牛轧糖时一样，同样的渴望，也同样感觉这不太理智。“你看这本你喜欢吗？”最终肯定是书店老板给建议，帮着挑，这是和买甜品唯一的区别，除了戴利³和英国女作家杜默里埃，她知道得并不多。那本散发着一种干燥的气息，是一种令人愉快的细腻的灰尘的味道。“把书给我女儿吧。”说完她付了钱。《愤怒的葡萄》⁴，她不想或者不懂得讲里面的情节，她向我保证以后会给我买一本漂亮的书，“等你长大的时候”。有个美好的故事等着我，这真是太棒了，等到十五岁左右才会有，如同月经，如同爱情。我之所以想长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长大了可以读任何书。街区里的包法利夫人们，闭着眼睛胡思乱想的主妇们，是个女人就有浪漫的头脑，这是人所共知的，可他们，甚至包括我父亲，为什么都这样恼怒，也包括他，晚上见我坐着什么都不弄，你干什么呢，想什么乱七八糟的呢？改作业，哄宝宝睡觉，自

已在睡前读五分钟书的时间几乎没有，还怎么胡思乱想。我确实曾感到羞耻，觉得自己若不在“做事”，就等于放任自流。不，我母亲不会混淆她的店铺和加利福尼亚海岸，熨衣服时门铃一响就塞到衣服下面的连载小说不会妨碍她算账。我知道不久以后必须追逐《繁花般的生活》里那些温柔的有教养的少女，接着还有二十卷《布丽吉特》⁵里的女孩，以及所有那些故事始于十八岁、止于二十岁婚姻的女奴或皇后⁶，甚至我的斯嘉丽，即使她拥有众多华服和情人，也是无法抵抗的。而在另一端，《知心话》上刊载的那些痛苦的讲述，粗体字印刷的亲身经历，不幸的已婚妇女，被诱惑又被抛弃的少女，一种命中注定的女性苦难有如粗重的枷锁，让十岁上下的我深深着迷。也许是因为那些女性读物，我才会有到了二十岁要么成功、要么完蛋这种奇怪的念头，才会瘫坐在蒙田咖啡馆的露天座上，才会有后来的一切。不，我相信别人看你的方式比任何书都更有力量，我恨男人的辱骂，“你在编

故事呢，我的小可怜，你想象力过于丰富了”，可以掩饰一切卑鄙伎俩、错过约会的借口，“不，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是你自己想多了”。我不可能希望有那样的母亲：面对报纸和书籍时没有愉快的脸庞；不会暂时封闭自我，远离罐头和分期付款的女顾客们，远离所有的包装好的冷食，从而充分享受每周小小的疯狂；认为阅读就是在浪费时间。她两眼放光地告诉我：“有想象力真好。”她更希望看到我在读书，边玩游戏边自言自语，在上一学年的作业本上写故事，而不是在收拾房间、没完没了地绣小桌布。我还记得她鼓励我读的那些书，仿佛阅读能带领我走向世界。

那时我还太小，无法将自己想象成十八岁的女主角，于是设想自己是女主角的亲戚或邻居，悄悄跟着她们进入城堡，来到遥远的乡间和炎热的黄种人国家，我还是我自己，对我自己这个人物我非常满意。书，既是旅行也是游戏前的预备。读完戴利的《古古诺尔的秘密》，父母的房间便成为中国小客厅，我把床单

床罩披在椅子和窗户上，让滑落在地板上的枕头扮演“纵情声色”的表兄弟们。大海波涛汹涌，我的巡洋舰即将沉没，在床上本来处于平衡状态的椅子开始危险地倾斜，我是小移民佩德罗。母亲进来了，看到床上一片狼藉，我穿着她的礼拜日连衣裙，脚后跟不停踩到裙摆，她笑着说：“你在玩吗？很好，去玩吧。”

阅读、玩耍、幻想，还有每周日，有时是周四，出门探索城市周边的街道和风景。要去探索的还有人，就好像来我们家的面孔还嫌不够多似的，母亲还想见到更多的面孔，有倒霉的、落魄的、年老体弱的，有生了病永远不会痊愈的，有脚被卷进了机器的，也有酒后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的，总之是形形色色的人。孩子应该受到保护，放在温室里，提防悬浮的微生物，呵护他们幼小敏感的心灵，对此类教育理念她满不在乎。她走到哪儿都带着我，我们去看望爱丽丝大娘，她那双失去感觉的腿裹在被子里，即使一个民间大夫告诉她会好转，我仍然怀疑她尿尿时自己没

有感觉。梅尔勒大爷住在一个单间里，床单被套都是土灰色的，几只猫围着一盘令人倒胃的馊食。街区里的产妇，经受着神秘的不为人知的身体摧残。在陌生人的房子里挺好的，总能见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像是椭圆或不规则形状、用上了漆的木头做出来的卢尔德圣母像，一座挂钟，一些在集市里赢来的布娃娃，从咖啡包装上收集来的动物画。也有各种气味。不需要通过听写“每座房子都有独特的气味”来了解这一点，其他女同学惊诧不已，怎么，房子会有臭味，在我看来她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待的时间很长，或者说太长，毕竟我有点好动，夜幕降临，我纳闷他们为什么不开灯，众人脑袋发亮。出了门，母亲紧紧牵住我的手，“这天跟黑人的屁股里一样黑！”我咯咯笑起来，没有路灯，走在路上连自己脚尖都看不清楚。济贫院也不错，有小教堂，台阶宽阔得就跟城堡里一样。最好的是一辆房车，就一辆，远远地停在城市尽头，旁边有座桥，那儿不通马路，也没有火车经过。

母亲向一个老妇人伸出手，伸了很长时间，然后她们开始打牌。返程时一切都得到了解释，这叫做奇遇，真是如梦似幻。

他很少跟我们一起出门，总是宅在家里，慢悠悠地做着点什么，从不东张西望，因为他讨厌没有目的地闲逛。而我们经常没有目的地闲逛，只是随便看看，呼吸不一样的空气，说出脑子里一闪而过的念头，那年我七岁，我们如同“钩在一起”，手挽着手出门。走过长着黄水仙的树林。走过很多路，无名小路，谜一般的没有学校的“学校路”，“地狱路”，还有穿过大片住宅区的路，成群结队的孩子停止玩耍打量着我们，经过别墅区时，别墅的一切都隐在蕾丝窗帘后面不想被人知晓。总在窥探新奇之物，建筑废墟里敞露的卧室，刷在墙上的广告，豪宅的小圆窗。走在遍布圣诞节橱窗的路上，饥肠辘辘，天寒地冻，在耶稣诞生的马槽和圣诞树前漫步，最终吃了一块带有螺旋形纹饰和精致圆顶的修女泡芙心满意足。最特别

的日子，也是绝对大开眼界：鲁昂之旅。上午，我们走进香气扑鼻的大楼，“春天”百货公司和“不二价”大卖场，下午参观一些内部黑黢黢、外面绿意盎然的教堂。在鲁昂大教堂附近，我们停在一家书店门口，店里卖一些关于魔鬼和转桌⁷的书，走在滑溜的石头路上，我第一次产生我不再是我的感觉。她说“抬头看”，一只檐口小兽伸着脖子。我们踏上圣女贞德塔楼的台阶，走进美邻博物馆的地下室，木乃伊有点令人失望，游客只有我们两个，在教堂的地下墓室，我们屏气凝神，心怀敬畏，但还是按捺不住想笑的冲动，埋在一排排墓穴里的都是我们从未听说之人。我们在餐厅点菜，菜品都不认识，人生第一次吃扇贝，焦虑地等待，要是不好吃，要是吃剩在那儿怎么办，接着用勺子和舌头探索“摇晃的岛屿”⁸，然后是恐惧，我们带的钱够不够，只见她泰然自若地拿出钞票，别担心，我们今天有钱。当我跟父亲讲述我们在大城市的见闻时，他摇着头一言不发。是什么驱

使她，到外面，闲逛，各式各样的展览，中世纪街区，为什么她要充当社工志愿者，要去拜访残疾人和穷人，难道一个女人不该安静地守着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吗，说得好像我当时能思考这些问题似的，我那时深信她完美无瑕。通过她，我知道世界是给我们投身其中纵情享用的，没有什么能对我们横加阻拦。

格兰维尔路，肯弗大道，我不断精进自己的英语，水平糟糕，但我可以行走在伦敦郊区，海格特、戈尔德斯格林这些地方，一走就是好几英里，我一个人在奶吧里喝“波夫里尔”牌牛肉汁，二十岁，爱好步行，陶醉于异国风光，我还经过图利奥，游览博尔盖塞别墅⁹的花园，然而一些粗鲁的男人突然出现，打断我的遐思，堵住我的去路，得推开他们才行。他们嘴里喊着 Fraulein¹⁰，mademoiselle¹¹，啊，mademoiselle，哎呀呀，french，francesa¹²，但前方的道路仍然是自由敞开的。正如考完试后的道路也是如此自由敞开，那一场场考试面目模糊，我以一种微妙

的荒谬感参与其中。然后是在井然有序的郊区花园之间穿行，那是为了摆脱我俩之间的第一次争吵，出门不是为了探索发现，而是为了逃避。那次可笑的逃跑只持续了几个小时，伪装成重大行程的样子，最终又回到窝里。后来，我甚至不可能突然跑出去，孩子在摇篮里呢，太可耻了，再后来，就连逃跑的念头都消失了，反正也无济于事，抱着锅碗瓢盆哭泣。一匹被驯服的小马。

不，我的小女孩岁月并不只是一场胜利之旅，记得曾因为裙子破了挨她打，我撒了谎，她火冒三丈，我气得胸闷，想象力贫乏时会感到无聊，要是我有个姐妹就好了，那些顾客罕至的夜晚会感到忧伤，顾客是个狡猾善变的物种，得时常留神。对死亡怀有各种恐惧。但当我寻找我作为少女、作为女性的价值观时，发现我的童年至少从未笼罩在一种观念的阴影下：小女孩是温柔脆弱、比男孩低一等的生物，男女

角色存在区别。很久以来我只了解一种世界秩序，那就是我父亲做饭，给我唱《墙上的一只母鸡》，我母亲带我进餐馆，给家里记账。无所谓什么男子气概、女性气质，这些词汇我是后来才知道的，而且这些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至今都弄不明白，哪怕别人试图说服我，裤裆里有无那玩意儿确实存在重大区别，我笑了，不，说真的，我是以那么不同寻常的方式被养大，无视性别差异，这让我吃了不少苦头。

得承认，我还是挺乐意做一个女孩子的。当然是因为我母亲的缘故。另外，在我周围，在咖啡馆里，男人的世界一览无余。五分之四的男人酗酒，饶舌，精疲力竭地在工地上干着脏活累活。他们指手画脚，大吵大嚷，还没沾酒的时候闷不作声，一旦喝高了就要大杀四方，消灭老板，彼此之间尽说些疯疯癫癫的胡话。差劲点的打老婆，好一点的向老婆上交工资，作为回报，老婆们在周日放手，让他们像年轻男人那样下小酒馆或踢足球。女人的世界，对我而言严

肃得多，我在店铺里注意到，她们负责采购所有食品，还要买针线、孩子开学用的铅笔和 20 厘米直尺，从来没有什么荒诞不经的举止，买一听蟹肉罐头都要思忖一番。她们细细打量着货架，再来点这个？母亲招呼着，慢慢看！在家里管钱的是她们，一大袋黄油饼干，希望能吃得久一点。管事儿的女人。至少那些打扫自家房子的女人是。无数次听到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不要把钱扔到窗外去。至少要在周日把孩子浑身擦洗干净，打发他们到店里买东西，还要管好自己的男人，防止他把工资都拿去买酒喝或随意换工作。暗地里我也觉得女人所有的不幸几乎都来自男人。但这个念头一闪而过，我的榜样是我母亲，她可完全不是受害者。

做一个小女孩首先是做自己，在同龄人中总是显得很高，尽管脸色有些苍白，幸运的是身体很结实，挺着小肚皮，直到十二岁都还没有腰身。裁缝肯定地

说，不用背带的话裙子会掉下来，要不然用根腰带紧一下。“用背带，这样她更舒服。”只有穿起来舒适的衣服，而且都很耐穿。什么花枝招展、温柔可爱、轻佻的笑容、惹人怜的泪珠，对这些我一无所知。我母亲对“制造尴尬的人”评价很苛刻，将掉眼泪视为惺惺作态，“你今天夜里不会尿那么多了。”

尽可能多地寻找快乐与幸福，不考虑对他人造成的影响，就是这样一个小女孩。周四和周日赖床不起，直到裹在被子里隐约感到一阵恶心，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光着身子走过，中午放学回家没等到开饭就先用面包片涂上热果泥，边吃边看书，在院子里没完没了地骑自行车，在紫菀花花坛和空酒瓶筐之间穿行。我的自行车，奇妙的幻想工具。轻盈地坐在车座上，身子微微摇晃，在移动的大地和静止的天空之间，我跟着双腿的节奏滔滔不绝地讲着异国情调的故事。夏天跟表姐妹和附近的女孩们玩耍，总是以亢奋的心情和快乐的尖叫开始我们的游戏，有时会暂停下来，骑

在秋千板上吃零食，有时游戏玩不下去，那是因为小姑娘们失和、争吵，做忏悔时应把争吵称作“丑恶交谈”，一边忏悔一边希望隔网后的神父不要求说出更多的细节。表演洗礼、婚礼，这类游戏的准备工作很耗精力，接下来还能玩什么，兴致全无，该跑到外面寻求新的冒险了。最刺激的无疑是偷桃子和梨，遇到男孩远远地说他们是胖小子、斜眼儿、大笨蛋，只要他们敢追过来一点，我就大声呼喊：“妈妈，他们一个劲儿烦我们！”“你只要不挑事就成！”她应道。经常喜欢滑绳子，右腿盘在绳子上，左脚放在右脚上，连衣裙飞扬，身体紧绷，我紧紧抓住秋千架顶端的圆环，然后猛地滑下来，从脚踝到大腿，绳子好像到处在燃烧。我在手掌里吐了口唾沫准备爬上去再滑下来。从来没有安静、稳重的游戏。作为一名独生女，在有玩伴的时候，我嗓门高、说话急，以此来弥补平时孤独的喃喃自语。都说小女孩天生矜持、举止谦和、胆小易惊，在自己和玩伴身上我丝毫见不到这些

印记。那些总是可可爱爱，喜欢玩做饭游戏、采小花儿的女孩，我们说她们得了公主病。学校里要求队列整齐、保持安静、适度玩耍，但学校教育不怎么能浇灭我们旺盛的精力。尖叫，藏在谁都找不到的地方，无所谓裙子会变成什么样，敢，这个重要的词，你就不敢吧，敲勒费弗尔嬷嬷的门，把这件事大声说出来，说话硬气，偷桃子。我那时并不知道，在另一套语言体系里，这股活着的欢快劲儿被称作粗鲁、低俗的教育。对小女孩而言，良好的教养应该是不能像卖鱼的女贩子那样喊叫，是说“哎呀”或“周三”¹³，是不在路上瞎晃荡。工人出没的小酒馆，在我上头的一代代农民，这些都不太能塑造出塞居尔伯爵夫人笔下的那一类小女孩¹⁴。

要光明坦荡地成长可不容易。是的，母亲送给我很多布娃娃。带着几分怜悯，就好像是因为我年纪小而让着我，但也没有勉强，毕竟是我想要这些娃娃。不过她禁止我把玩具婴儿车和布娃娃带出门，说那是

滑稽的标志。“德鲁因”，也就是方言里的布娃娃，得待在家里。在我模糊的记忆中，娃娃们总是一头卷发，眼睛直愣愣的，嘴巴张得不够大，想把我的零食喂点给它们都塞不进去，娃娃一个接一个出现，丢失了，损坏了，不断买新的。为了能骄傲地拿给小伙伴们看，漂亮的小裙子、毛线鞋都得有，它哭了！最初的欢喜劲儿过去之后，我把娃娃重新放到摇篮里，和小伙伴们去跳绳。我一直以为奇迹会发生，那个娃娃我会喜欢的，我会给它织各种东西，我不会把它丢弃在院子里。欣喜若狂、犹豫不决地给它想一个名字，为它的洗礼进行各种细致的准备。之后，对它就没什么可做的了。照顾婴儿究竟意味着什么，缝小裙子和小帽子，我并不在行，喊妈妈帮忙时她一口回绝。这个躺在摇篮车里、穿着绣花裙的冷漠小人儿让我感到忧伤。它呆滞不动，而我生机勃勃，自入冬以来第一次感到早春特有的微风拂过我光溜溜的胳膊，狂欢节可丽饼的味道还留在我指头上，我看着它，无法想象

能跟它在一起做什么事。面对一只布娃娃的孤独的孩子。我期待从它那里得到爱的回应，做梦。它的身体是僵硬的，它抹了大红唇的嘴露出傻傻的微笑。唯一能让它有点活力的方式是折磨它，让它面目全非，惨淡收场。总是从头发开始，梳辫子、裹卷发纸、洗头。剪掉。毁灭性的升级行为。由于这颗堕落的脑袋，头发被剪光的可怜姑娘，我觉得可以对它为所欲为，扔掉它，看着它摔下来时的各种奇怪姿势，撩起裙子，用橡皮筋捆住胸口，让它以胳膊为轴转动。不到两分钟它就成了独臂人了。于是我可以下手进行最后的亵渎，从它的肚子里挖出那个像盐瓶一样的东西，当我把它倒过来时，它会继续尖叫“妈妈”。塑料娃娃，那可不一样。它们太像真正的婴儿了，残酷折磨它们显然有罪。但它们也偏离了自身的功能，一个夏日午后，我敢对着一个娃娃说它是谁的仿真品，它代表缩小版的某位伙伴，那个娃娃我叫它米歇尔。

玩游戏我不会挑挑拣拣，我喜欢跳绳、跳格子、

对墙扔球、传戒指游戏，要是戒指没有传给我，我会很失望，传给我了就很开心，当戒指在我掌心滚动时，我把它视为友谊的秘密证据。把两只脚放到自行车的车把上。“俘虏球”游戏。造多米诺牌屋。爬树。周日有时在盖德区，我会跟表兄弟和街区里的男孩们混在一起，我不明白，男孩们为什么把我们这些女孩撇在一边。他们打架，在工厂院子的碎木屑里打滚，而我们在一旁观看。于是我去打、去挠痒痒、去咬他们，但他们从来没有下定决心真的要跟我玩。那天我喊了些什么，也许是他们常说的脏话，我喊出来挑衅他们。在记忆的画面中，两个十四岁男孩，大男孩，转身朝向我。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那女孩会变成什么样”。轻蔑的语气。威胁。我隐约猜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毕竟平日里耳边经常飘来大人們的谈话。我无言以对。像他们一样喜欢打架、讲脏话，怎么就能跟成为婊子扯在一起。记忆中仍烙印着自己被伤到自尊心的样子，最糟糕的是，我当时无法理解这

一切，我甚至都没有冲上去揍他的欲望。

我会变成什么样？出人头地。必须出人头地。我母亲总这样说。首先从拿到一份优秀的成绩单开始。每周六她会数我的听写和算数拿到几次满分，满分是十分，我的缝纫一直只能拿到四分，品行也只是合格，她却不会说什么。我成绩稍有下滑她就严加责备，不让父亲为我找任何借口，难道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各种词汇表，做动词变位练习吗。我写作业时他们不会来打扰我，让我去摆餐具或擦盘子，我玩游戏时也不会。“你只需要管好你自己”，他们说。噢，奉献多么伟大，做出牺牲的姐姐多么高尚，为开胃酒会带来糕点、乐于效劳的小姑娘多有魅力。在我家这些都毫无价值，甚至遭到贬低。有些小女孩一想到自己是个有用的姑娘就感到高兴，觉得只要能整理好自己的房间，“乖乖地”收拾好桌子就可以赢得家人的喜爱，我却没有过这样的想法。我只需要对我自己、对我的未来负责。少数时候也会含混地冒出这样的念

头：要想讨人喜欢，择菜，跟所有人亲亲热热的，这比在学校坚持不懈取得好成绩容易得多。只在极少数时候。九月的天空阴沉，咖啡馆那头的男人们吵吵嚷嚷，蜜蜂在紫菀花丛中嗡嗡飞舞，即将开学。我的未来。在七到十岁之间，我知道我来到世间是为了做出点什么。没有一位兄弟能用他的天生优先权来阻挡我的前景。

现在我知道母亲的态度也是一场谋划。她不属于中产阶级，但不能因此就得让她忍受一切。不愿女儿重走她的老路去工厂里打工，希望女儿敢对任何人说“该死的”，能拥有自由的生活，对她来说，教育正是这句“该死的”、这个自由。因此，她从不要求我做任何可能阻碍我成功的事，无论是帮些小忙还是帮做家务都会浪费我的精力。重要的是，没有因为我是个女孩而限制我去追求那样的成功。对我父母而言，出人头地这件事没有性别可言。

出人头地也不能通过披上新娘的面纱达到。很

早他们就耐心地反复告诉我，婚姻只不过是学习与工作之后的人生变化，男孩如此，女孩也完全一样。在跟母亲散步时，她跟我说了很多女孩的故事，告诉我千万不要学她们，有个小东西人那么好那么聪明，却因为订婚高考失利，另一个对于找个好婆家心存幻想，最终没落得什么好下场。这座城市，如果仔细去听，会发现它充满稀里糊涂上当受骗的小雀儿，我深感自己必须十分当心。而且尤其因为我所在的街区缺乏好榜样。有位杜布克小姐，一副神经质的样子，总是提着一只厚重的公文包从鲁昂来的火车下车，她是学医的。瑞安小姐，一位初中英语老师，每天在我们店里买牛奶和其他一些东西。人不多，确实不多，但她们是“小姐”，而非什么小东西或那谁。“首先要为生活武装好自己。”母亲还是天真，她以为有文化、有一份好职业就能让我抵抗一切，包括抵抗男权。

必须得说，在她的生活指南中存在一处空白。身

为小女孩的我无拘无束地长大，有着自命不凡的观念，其实并不全然如此。我独自应付那个东西，比双腿和肚皮更热，更有活力，她把那东西叫做“小玩意儿”(quat'sous)，在我头脑中，我把这个词写成catsou：下面的(dessous)、潮湿的(souillé)、脏的(Sale)、要藏起来的(cacher)。“不要再光着腿瞎转悠了，什么都叫别人看到了！”要一脸严肃地迅速洗干净。我独自一人在黑暗中跋涉，先是恐惧，后来是羞耻，以及不得不迈向让我感到舒服的东西。还有去知晓，是的知晓，暗中刺探大人们说的奇怪的话语。我仍然不无厌恶地想起自己还是小姑娘时的身体，想起我的梦想和跟其他孩子的聊天内容。从青春期的开始就完全不去想这段时期。十五岁时的执念，要把完完全全的纯洁、心灵、灵魂、生命都献给一个男孩，这个天神般的男孩将会进入我的身体就像进入一间空房子一样。要忘记孩童时期的那些摸索、游戏，相信欢愉将由他带给我。其实第一次是在梦中，那时我还不

到五岁。梦里那座教堂是大人有时会带我去看节日庆典队伍的教堂，光线昏暗，一望无际，就我自己一个人。我觉得想要尿尿，但比较特别，是一种酥麻、甜蜜的感觉。我蹲在打了蜡的讲道台下面，憋得不行。这时我瞥见神父正盯着我看，他套着两件袍子，一件黑一件白，白色那件很短，镶有花边。我的欲望变得极为强烈。夜幕降临。我想要摆脱羞耻，以胜利的口吻来谈论新发现，我也欣赏自己对大人进行掩饰的神奇本领、对天使般小女孩这一理想形象的坚决抵制、对神父先生专横盘问的顽强抵抗，是另一位神父，不是讲道台上的那位，我真的厌恶他在小屋里散发出的口臭。因为出于本能去寻找那个神秘欲望的秘密，探索关着两扇白色百叶窗的红色小屋，不会让我感到难受，小红屋光滑而脆弱，仿佛被剥过皮一般令人感到不安。隐藏的图画。后来我在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那些微微打开的三折画面前感到困惑。红色，白色。皇后刺破手指，血滴在雪地上。打开百叶窗。一次次小

小心翼翼的探访，有时玩具刀叉会派上用场，当我在其他日子看见它们时，它们似乎还记得。一年级闹哄哄的班级里，尚塔尔在热纳维耶芙面前晃来晃去，热纳维耶芙成天淌口水，是个大家用手指着太阳穴说她“有点那啥”的女孩，尚塔尔撩起裙子，把内裤往一边扯，迅速露出她的私处，然后重新把裙子放下来：“哎，热纳维耶芙，你也做一下。”热纳维耶芙直摇头，她虽然心智不全却也拒绝玩这个游戏：“不可以，会流血的。”她说的几乎是对的，我也觉得这是身体中间一个裸露的伤口，不过既不流血也不疼。我想象不出在这个没有纵深的画面后面是什么，也许直到九岁才有点明白。在好朋友和表姐妹们之间，我们会说“我的”跟“你的”，我们的从来都不怎么像。有些小姑娘会露出来给人看，有些则是看别人的，有些让别人摸，有些摸别人的。我所处的阵营不确定，比较偏向第二种，因为我经常是在场小姑娘里年纪最小的，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给别人看。布丽吉特上解剖学课

缓缓道来，扣人心弦，她两眼炯炯有神，一头卷发不停颤动，下巴尖尖的，她喜欢展示、解释：真正的红色会来的，黑的这里已经有点了。没有很多名词，我们甚至想象不出在字典里有关于这些东西的严肃的名词。所有那些东西，都叫作“那”。马上我会变得“像那样”，用大人的话说就是长成了，再往后我可以“做那个”。多么害怕正在接受教导时突然被父母撞到，哎说真的，他们会把我们关进少管所，然后我们都勇敢地笑起来。无法抵抗对我们身体的好奇心。男孩们硬说我们“没有的”那个东西在哪儿？当时我还不知道。相反，我们拥有一切。从那个部位衍生出的奇妙经历涌上心头，是些零碎的记忆片段，不容易拼凑，只是我想要拼凑吗，有一些虚幻成分我无所谓，所有那一切不可能简单，要不然成年人干嘛总是遮遮掩掩的。那些捂着嘴进行的交谈、公园里缠绵的情侣之间偷偷摸摸的游戏和彼此试探的目光不断让我进步。我身体的觉醒跟这些断续获得的知识密不可分。

后来我的那些有教养的迷人的女性朋友，她们告诉我是怎样一次性学到这方面的全部知识的，坐在妈妈腿上，听她讲花朵、种子，妈妈还画了一张漂亮的画，画上的一切都那么和谐、对称、严丝合缝，有对各个部分的描述，也有各项操作渐次进行的详细流程。并不羡慕她们，她们同样没有获得个人指南，只有这个是最重要的。最遥远的记忆，四岁，邻居家一个跟我同龄的小男孩站在我旁边对着墙撒尿，大人一见赶紧把我拉走。令人不安的两性区别已显露出来，到了八岁左右，我对这一区别感到开心，有时远远地在盖德街区臭名昭著的色狼身上瞥见，有时近距离在一些泼辣朋友的弟弟身上看到：“方弗瓦，把你的小鸡鸡掏出来。”不用恳求，无论我们想看多少次都能看到，只要我们不觉得这个游戏无聊。但一见到男孩的那东西，我们总是发笑，而看见我们自己的却比上教理课还要严肃。仅仅是命名就很有趣：那玩意儿、小亲亲，还有更简略的“一根”。把词混入一些无关痛痒

的歌曲里也很有趣，先进行挑衅：“你打赌我会说出来。”“不。”“就说。”荡着秋千，高唱：如果是些小鸡巴那就更棒了，但是他没有！奇怪的东西、游戏的道具，简直滑稽。我母亲像称呼窗边那些微小的植物一样称呼它，把它叫作“不起眼的东西”。“把您那不起眼的东西藏起来吧，米隆大爷，孩子们在呢。”很长时间以来对我来说那东西没有用处，纯粹只表明两性区别。毕竟人是用手指生宝宝的。这段历程最初的状态是进行模仿。问题在于持续时间，一分钟还是一个小时。没能解决，即使当我达到第二种状态，知道了那“不起眼的东西”是做什么用的。诸如此类神奇的疑问还有很多。上学路上一幅大型广告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一个女人躺着，一个男人把头钻进她裙子里，“《知心话》家庭周刊”。母亲在店里说这样的广告牌真是可耻。做那个的时候也要用头吗？还有膝盖，大人们开玩笑时经常说到膝盖，桌子下面碰膝盖¹⁵，即使我不觉得这有什么意思，谁知道呢。很长时间以来我

都以为一切发生在表面，从未想过会有进入的动作，进入比带有紧闭的百叶窗小通道还要深的地方。甚至月经我也以为是哪一天要把我的皮肤给封住的红色细纹。布丽吉特的课讲得应该不清楚。这段历程的下一个状态惊到我了，是我自己猜到还是别人小声告诉我的，知识的来源如今已记不清，总之我知道了是那个用来尿尿和生孩子的湿润的洞起作用，而非小红屋。不再模仿，尝试会是无用且痛苦的。我迷茫了一段时间，真没想到我那东西最重要的部分是条隧道，从来没有痛过痒过，它是个静寂的不可见的洞。性别差异现在一清二楚，合乎逻辑，却也令人困惑。一如既往地控制住惊讶。今天当我回忆遥远的往昔，没有任何东西曾让我感到气馁，在童年时代，没有任何东西曾让我感到焦虑或恶心。我必须得接受这个新事物，避免因身体里有不认识的部分而不安，相反，我只去想它以后会给我带来的欢愉。“做那个”不可能会是其他，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我自然而然、无

意识地联想到这个行为必然产生的恐怖结果：生下一个婴儿。四年级或五年级初领圣体那年，流行一首儿歌：在里昂我把禁果尝 / 在土伦我结了婚 / 在巴黎我肚子鼓起 / 在马赛我生了小孩。虽如此，一开始应该是愉悦的，我总是在想象中把接下来的事抹除。分娩，这是唯一一件让我恐惧的事，我在《飘》里读到过，绳子、热水还有死死抓住床头铁条的尖叫。折磨与恐怖。听到有人小声在说难产，用了产钳，声音含混不清，我父亲修自行车轮胎时会先用一把钳子把轮胎撬下来，也许就是父亲用的那种钳子。我一直很排斥我个人成长史中的这段时期，更喜欢关注一些较为快乐的时间节点：胸部发育、长出体毛、流出经血，我好奇地等待这一切发生，时间过得好慢啊，尤其最后一项变化，这个奇迹的发生没有任何预兆，您不知道哪一天几点钟会到来，纯粹的事件，如同所有会在我身体里突然发生的事件那样，我想象不出后续会发生什么。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有月经的小姑娘，我

将漫步在红色的荣耀里，我会带着我的新身体入睡，生命达到完美。分娩除外，分娩像是一场惩罚，对于我的一切身体变化，我都把它们当成节日一般。有些女孩每个月都疼得龇牙咧嘴，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母亲从来没有抱怨过，而且我也不能将终于“像那样”的幸福和肚子痛联系在一起。我肯定我不会为之受苦。我也喜欢“做那个”。将要发生的那件事不会简单，我对男孩们所知不多，但我觉得那件事应该是愉快的。自行车在院子里寸草不生的灰暗土路上颠簸，我穿行于酒瓶筐之间，一边踩脚踏板一边遥想印度和阿根廷，我也想象我即将拥有一具荣耀的身体，无论它做什么都可以。旅行和做爱，十岁时我觉得再没有什么比这两件事更美妙。

身体与心灵的发展路线并不一致，心灵的发展轨迹更像一条虚线。我真的曾是个坠入爱河的小女孩吗？男孩们，作为好奇的对象、梦中的必要伙伴，他

们有名字、有面孔吗？我在阅读中创造了很多。查尔斯，斯嘉丽不想要的那位查尔斯，在我以为生孩子必须也只需用手指的时期，我把查尔斯当作未婚夫。在《苏塞特的一周》¹⁶里，我找到一些十四岁的英雄，十四岁是个好年纪，我陪他们在布列塔尼庄园深处寻找宝藏。有过现实生活里的“意中人”。本子上记了很多，这个那个，还有个叫福歇的小伙子，我是多么自豪啊，我挑挑拣拣，说出自己的偏好，在头脑中发誓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愿意跟他做任何事。多好的机会。“你好，你好。”连名字都不敢叫出来，否则也许可以成为一场真正的告白。他们的名字都已经忘了。主要有一些是我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我曾试图搭讪唱诗班一个温柔的男孩子，他脸色蜡黄，在教堂右侧帮租椅子的老太太收零钱。他在念福音和高举圣体之间出现，眼帘低垂，穿一件漂亮的镶有花边的白色法衣，里面套一身略短的红袍，我能看见他的袜子。他伸出纤细潮湿的小手，我往他手里放了一枚二十法郎

的硬币。他应该找给我十法郎，我把手摊开。每逢周日，我都期待一个眼神、某种东西，可始终没能实现我的征服，上帝和圣母不来帮我。我还不知道光站在那儿不足以引起注意，必须得可爱，有几分轻佻，而且主动投怀送抱多笨啊，男孩们想要的是征服，诸如此类的策略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有些男孩是我拿来吹嘘的。一个来家里做客的高个子男生，小学刚毕业，突然他从身后死死抱住我，把嘴巴贴到我脖子上，然后逃走了。我一头雾水，在“他热烈的吻”之下我没有晕倒，我当时正在看小兔子啃食我投喂的面包干。也许因为我对该事件没有任何准备。但不管怎么说，成了，我可以告诉大家我被人吻过了。有一个男生的名字在好几年里都具有魔力：雅克。黑色的眼眸、白色的牙齿、灿烂的笑容，不，这是当时一首歌的歌词，不过他的相貌就是这样，此外他白色运动短裤下露出棕色的大腿。一整个下午我们都在一起玩轮滑，他一次也没摔倒。那是一个夏天。我们在工人新村的

马路上道别。我和父亲等大巴车来。从站台望去，我看到马路另一端，雅克就住在那里。我们等了很久，我看着柏油马路、空地上生锈的老物件，还有远方如海浪般轰鸣的工厂。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离别的场景。我以为第二年还能再来。“雅克说抬起手臂，雅克说走一步。”课间活动时这个女孩是代表他在跟我说话。¹⁷我到处写下他的姓名首字母缩写。还有一个，在记忆的更深处。我被带到比利时人广场的军乐会。眼前只有一群穿着大衣的粗汉，天空烟雾缭绕。在一片脑袋当中我注意到一名士兵的脖子，他正在吹着什么，也许是军号，有时露出些许侧面，有时一只胳膊放下去。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将眼神投向他笔直的发际线和卡其色衣领之间的那片肌肤。我没有无休止地用鞋头刮蹭地面，没有观察沙砾形成的图案，也没有在人们的双脚之间想象出一座小房子，这些往往是一直困在某地时会寻求的解脱之道。如今，当我凝视这段脖子，我才明白是什么发生在一

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这是布丽吉特的所有描述从未让我感受到的。光芒四射。不是洗手间里讲的一段故事。是第一次有男人真正在场。

假期待在院子里，天空飘着大朵白云，装满空酒瓶的筐子散发出酒窖的味道，我荡着秋千，自言自语。一位男顾客钻进咖啡馆，母亲的白罩衫在货架前不停移动。规律的敲击声，金属质感，来自一间工坊，一阵阵颤抖尖锐的声响，那是锯木厂的，火车在近旁的轨道上运行。男人们摇晃世界，让世界震颤在我的十岁周围。他们修建道路，修理发动机，而女人们只在屋内发出细碎的声音，扫帚碰到踢脚板，缝纫机轧轧作响。和每个小女孩一样，我对此毫不知情。城市的震动没有意义，对我和我父母而言，它是一个容纳我珍贵存在的空洞。男孩们的世界没有给我造成威胁。只有一场断断续续的梦，一种幸福的展望。既无阴影，也还没有绝对的光明。

那些我以为饱满的年华。幻觉。侵蚀岁月的也许是一些思索、女生矫揉造作的微笑、宗教，以及其他榜样的出现。学校里的女老师们，尽管在记忆中不如我母亲的形象那般鲜活，但也都是强大而活跃的女性，她们无所不能，会将一些费解的东西写在黑板上，也会眼神凌厉，抱着双臂等待：“请你们排好队，保持安静。”她们无所不知，虽说我不太喜欢她们，因为对她们的谈吐和克制的表情感到陌生，但我欣赏她们。对我而言，女人毫无疑问比男人更有学问。在学校看到的男人都像我外婆那样穿着黑色长袍，神父和总本堂神父，校长女士每学期都会领着他们来各班打分。神父的嘴角湿润，对着我们微笑，有几分老糊涂的样子，跟涨红了脸、怒气冲冲的女校长形成鲜明对比，她总是由于我们的懒惰和愚蠢而处于爆发的边缘。当然是她更重要。关于成绩我没什么可怕她的。必须得说，学业上的成功带给我相当自恋的良好感觉。自由，自信。必然也带来一种权力的初体

验。老师们对我的顽皮举止睁只眼闭只眼，很长时间里我都没有改变。作为独生女，拥有二十个可以陪我玩耍、聊天的小伙伴简直太幸福了，即使她们中的一半是爱显摆、稍微被打一下就哭鼻子的女生。另一半则是衣服穿得最差、最没礼貌的一群姑娘，光有这一半就已经足够幸福。亲爱的女老师们不满足于社会名流，还得招收乡巴佬的女儿，当然是交得起钱的乡巴佬，也找了一些心气颇高的雇员和工人的女儿来凑数。伊丽莎白，冬天穿着她妈妈的长筒袜来上学，袜子缝在内裤上；尚塔尔，放学后我和她兴奋地在市中心轧马路。我们一起买了《身体里的恶魔》¹⁸，冲着封面买的；了不起的贝尔纳黛特，她总是隔着刘海儿看老师，眼睛太放肆了，请你收敛一点，无动于衷。这就是我的小伙伴们。她们不经常得到漂亮的十字架铜质勋章，每周六学校会把勋章颁发给最优秀的学生，也就是最遵守宗教礼节、最乖巧的，还有那些最会装的：百米开外感觉到老师要来立马摆出天使般的

姿态。颁发勋章的是校长本人，她还会给一个吻。得看看那些女生有多么光彩照人。从周一开始，她们就戴着勋章来上学，勋章用一条系成蝴蝶结的精美绶带别在衬衫上，蝴蝶结甚至系成了双层，像一朵真正的小花。有的勋章应该就是用“镜牌”去污剂擦洗过。对我来说这是个讨厌的东西。校方坚持要发给我，“尽管你的言行举止配不上这枚勋章，亲爱的小姑娘，这是特意照顾你才给的。你要知道，”她严肃地盯着我，“一个人可以到处得满分，却得不到上帝的欢心。从前有个小女孩极有天赋，你们当中没有人能跟她相提并论。所有的考试她都考得很好，所有的。你知道她现在过得怎样吗？”缄默。我一直站在那儿等我那枚十字架勋章。“她被人推进一辆车里。她现在的思维能力不超过一名两岁的孩子。是上帝让她得的一种病。”有那么一秒钟，我希望自己位列班级倒数第一，但也就只是一秒钟时间。即使上帝明显不喜欢算数也不喜欢语法，我母亲，她，说这些很重要，而乖巧听

话，在默写本上涂涂画画，这些都不值一提。十字架勋章，一个无聊的东西。而且，我还把它弄丢了，母亲生气地在碗柜抽屉里来回地找，最终发现它被卡在几包饼干中间。没有漂亮的蝴蝶结可以戴，“我没时间给你弄！好好学习，这才是最重要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很难相信女校长所说的一切。

我很高兴可以在毫无瑕疵的诗歌背诵、性数搭配练习和正确的解题当中彻底做自己。力量。用来支撑自己面对这一赤裸裸的现实：班里一些女生比其他女生更讨老师喜欢，这些被我叫作“臭显摆”的女生，总是被母亲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头发髻曲，小宝贝模样，这里别个小发夹，那里弄个白色衣领。至于我，发辫全都盘在头顶，不能让头发扫进眼里，碍事，这是我母亲不容辩驳的原则。一些温柔的小女孩，可爱中带着几分淘气，如此优美，我相信天生如此。负责为家长举办庆祝活动、短剧和舞蹈表演的老师有时会来班里把她们接走：“我需要六朵小雏菊来跳《花之

圆舞曲》，哎你站起来，那位，很好。”几乎总是同一拨人。一开始我也满怀期待。算了，还是等明年吧。只被选中过一次，两分钟后就被退回来了。我个子太高，无论上几年级，总是太高，也太笨拙，一想到要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下摆动我的胳膊和腿就发怵。被排除在外。被选中的女孩们几个星期都保留着她们作为特殊存在的标记，上课时会有人把她们叫走排练，她们会收到一些神秘的指令：“一点钟在圣路易厅。”最终有一天晚上她们出现在灯光下，穿着洁白的芭蕾舞裙，揭示她们是有生命的玩具娃娃这一本质。如果我不是玩具娃娃，那我又是做什么呢？

快来吧，想象中的外貌，快来到我身上吧！我在班里觉得无聊时给自己创造了一副新长相：有着罗丝琳娜的金色长发，“如果剪掉这头长发简直是犯罪，”老师说，有着弗朗索瓦兹粉嫩饱满的脸蛋，还有让娜的苗条身材，她就像从前我在哪儿读到过的一尊塔纳格拉小雕像¹⁹。我自己的眼睛虽然平平无奇，但我想

保留下来。我已经偷偷在给自己编故事，用一个假想出来的、更优美、更脆弱的女孩换掉真实的自己。一点半敲钟之前，一群初二以及更高年级的女孩正在楸树下说笑，其中一个穿着红色的高帮皮鞋和蓝色罩衫。我很喜欢她，因为将来我会变成她的样子，跟她一样，我会把头枕在胳膊上说“代数真是好烦！”距离拥有她那样圆圆的脸蛋、纤细的双腿还早，但这些会跟代数一起到来。我喜欢观察她，却不容易看到，很多人在她四周奔跑，飞舞的罩衫遮住了她，突然她又出现在我视线中，对我的存在一无所知，因为年龄大一些的女孩总是对小妹妹们不屑一顾。我从不效仿那些长得像男孩、身材高大强壮或远离可爱小女孩形象的女生。跟我做了一整年同桌的罗兰德，宛若《圣经》故事书里的一个牧童。当她苍白的嘴唇挨着我的脸说悄悄话时，我真想躲到一边，有时男孩女孩的生理区别没那么大，令人感到怀疑和困惑。然而性别特征不明显的女同学在班里有很多，为什么会有这种不

适感呢，也许因为我早已抱有一个女孩必须长相甜美、曲线柔和的观念。我在所有这些面孔上寻找我自己的样子，不，十岁的我长得还不像我所期待的那样完整。

女老师们有点像是为了摧毁我们的自信与意志而存在，但并不粗暴，而是以宗教的温柔方式进行，她们仿佛拒绝给予我们她们自己曾获得的恩典：教书、靠自己生存。当时的惊慌与疑惑，我全都记得，那位老师名叫拉希尔维斯特，对我没有好感，总是指责我，嘲笑我的举止，她长得像圣女小德兰，长发用发夹卡住一直垂到背上。那天她高兴地说：“我的小姑娘们，告诉我，你们以后想做什么。农妇，好的，秘书，这些都很好。”她询问理由，给我们做出指引。轮到我时，她突然打断我：“你当然会跟你妈妈一样开食品杂货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本想说的是要当小学老师。她懂的当然比我多。算了。现在轮到玛丽-保罗了，她满面笑容，神色安宁。“你

呢？”“我想成为妈妈。”全班哄堂大笑，所有人，包括平日里扭捏作态的也全都笑出声来，不仅自己笑还看着别人笑，这样能让快乐加倍，大家笑得东倒西歪趴在桌上。拉希尔维斯特一脸阴沉地制止了我们：“闭嘴，你们这帮蠢货！”她用严肃的眼神扫过我们，同时以柔缓的语调说：“你们不知道，妈妈是世界上最美的职业！”没有人表示反对。农妇、医生，甚至有同学说的修女、食品杂货店老板娘，这些什么都不是。这一幕留在我心中，让我费解。也许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经历信仰崩塌。真能干啊，圣女拉希尔维斯特，一下子教给我两个真理：第一，食品杂货店的女儿将永远是食品杂货店的女儿；第二，哄小孩、推婴儿车，在命运秩序里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不要管这些，好好学习。”母亲的话让一切重回正轨。带有强制性，但让人安心。不过，十二年间反复被灌输要无私奉献、敢于牺牲，应该还是给我留下了烙印。身体是肮脏的，智慧有罪。最严重的倒还不

是祈祷，而是圣女故事：艾格尼丝，纯洁的羔羊，被折磨，被献给狮子，被鞭打；布朗迪娜，同样的剧情；玛利亚·葛莱蒂，一把刀插在她心脏上；还有贞德，课上我曾为她哭泣。孩子们，贝尔纳黛特几乎不识字，仁慈的上帝选中的却正是她，一个卑微、贫穷、不起眼的牧羊女，仁慈的上帝本可以去找有学问的人，你们相信他找过吗，还有法蒂玛的三个孩子²⁰，以及拉萨莱特²¹，等等。我深深着迷。简单，无知，身体毫无价值，甚至在最后的最后，身体还要饱受摧残，像圣日耳曼尼那样脖子上长满淋巴结核。她们都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再没有什么比小女孩更能取悦上帝了。欢快地吮吸焦糖老鼠巧克力，爬滑溜溜的绳子，排队的时候讲话，这些隐约都是犯错。做出牺牲，主旋律，想讲话的时候忍住，不吃甜点，帮妈妈洗碗，每当你不想做什么事的时候就去做这件事。给自己准备一本牺牲记录本，认真记录。有同学把本子记得满满的，给事件编号。相互竞争看谁更能自我否定。

也许教会男校如出一辙，男生们同样也必须服从纯洁与恐惧的制度，但肯定不像我们这样窒息，他们可以打斗，被鼓励去当首领且神父们不鄙视睾丸，“有两个”²²。我很早就相信女人比男人更虔诚，她们在周日挤满了教堂。我父亲要等到复活节后那个周日才去做忏悔，就好像他的灵魂死在复活节，他之所以去，只是为了避免引起家庭不和。她们必须更虔诚。如果一个男人不虔诚，不要紧，反正有我们女孩子在，通过我们的祈祷和我们的品行来拯救世界。幸运的是我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完全无法承担这一重任，尽管我也努力过，也做过牺牲，这些努力和牺牲并没有带给我应有的幸福。我小心翼翼地不暴露自己的可耻行为：怀着喜悦的心情收集好成绩，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从母亲那儿偷糖果。我天性中的恶。我不够整洁，这一点还是暴露出来了，作业本上有污渍，我不敢说我是在厨房的桌子上写作业的，缝纫课的方布上有手指印。“洁净是灵魂的反映，小姐！”我

被揭发。“污点”，烦人的词，玛丽没有污点。怎样才能掩饰我背负的所有暴力和欲望呢？太难，守护天使就在背后，上帝无处不在，还有良知，那是一只没有眼皮的大眼，飘荡在天花板的某个角落，道德书的第一课就是这样讲的。在冰冷的小教堂上教理课时，我和一些调皮姑娘躲在最后一排，没有用，校长把我领到神父眼皮底下。周五的忏悔证²³，恐怖的制度。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老师把纸都收走交给神父。过了一会儿，正当我们做表面积的习题时，一个女孩走进来，把一张纸递给老师，上课暂停，她大声读出名字。要让我们都知道谁为了洁白无瑕相当认真，相当接近上帝。骄傲地站起来，离开教室，二十分钟后带着另一张纸和另一个名字回来。一连串优秀小女生。一直留在座位上会隐约感到羞耻，会立刻被老师和同学们认出来。我带着厌恶感，一个月一次进入这个行列。然而进行抵制，沉默。经过通盘考虑，我宁愿做忏悔时隐瞒过错产生负罪感，也不愿在承认

过错之后经历那个残酷软弱的时刻。跪在圣塞西尔和圣罗兰的雕像之间，我讨厌自己告诉了神父我骄傲自满，偷李子干，唱下流的歌。那舔着厚嘴唇的舌头、那臭烘烘的猎奇心，我恨自己。小女孩们想获得幸福必须变得透明。算了。我觉得我最好还是把自己隐藏起来。相信这一态度能拯救我自己，于是我保存好自己的阴暗面，欲望、恶意，一种黑色的坚实的内里。出于同样的自卫反应，我生怕圣母在我面前显灵，一旦显灵我就不得不成为一名圣女，而我并不想做圣女。我想要旅行，用筷子吃木瓜和米饭，靠自己奋斗，然后成为医生或小学老师。她们的言辞，有些我听进去了，有些则抛诸脑后。

抛诸脑后的总是比自己以为的要少。尤其艰难乃至不可能做到的是，要在十岁的年龄厘清一堆错综复杂的关系，例如被反复灌输要赞美圣母玛利亚，她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教会也是我们的母亲，同时也要尊敬“你们自己的亲爱的妈妈”。我的小姑娘们，我

希望你们能够做妈妈的好帮手，无论怎么表达你们对她的感激都是不够的，打扫卫生的是她，给你们熨连衣裙的是她，还有做饭，等等。说不完道不尽。教会女校向我们揭示的母亲形象过于沉重。“当你们让自己母亲受苦时，她会暗自流泪。”圣母玛利亚脸上的两道泪痕。“要是没有妈妈，你们会变成什么样？”老师威胁着。大地变得空无一物，在梦里的大片沙漠中，我茫然前行，孤零零活在世上。感到软弱而焦虑，老师们极甜蜜又极悲惨的语调在我耳边回响。竭尽全力证明自己的感激之情。绣了花的小桌布、酒椰叶编织筐、用丝光棉线绣出来的赞美词，复活节假日一返校，每天下午放学前我们都要窸窸窣窣地忙活，为母亲节做准备。对我来说，这意味着自由，上学总算能找点乐子，我度过了一些愉快的时光，手里拿着针，每分钟绣一个针脚，讲故事给别人听，也听别人讲故事。一个声音突然冻结了那一刻的欢乐：“小姐，我看到你了，你什么也不干，看来你的编织筐无

法收工了！”我想说出真相，十一岁的我无比确信的真相，那就是我母亲完全不在乎这份礼物，母亲节那个周日，她应该一整个上午都在店里忙碌，当她看见我摆在罐头沙丁鱼和餐巾之间的小礼物，会窘迫地扭动身体：“很好看，亲一个！”然后，“收起来，别弄脏了”。结束。不可能当面赞颂她，我们两个人都会觉得太滑稽了。我永远不敢承认这类事情，尤其老师还当着全班的面说：“如果完不成编织筐，那是因为你爱你妈妈！”我把脑袋耷拉在我的手工作品上，深信自己是个怪胎，即使在我家母亲节是那么无关紧要。

在此类情景中，我隐约觉得我母亲不是一个真正的母亲，也就是说跟其他母亲不一样。她既不爱哭也不爱做饭，家务做得更少，在老师所给的关于母亲的标准描述中见不到多少我母亲的影子。默默奉献，永远保持微笑，在一家之主面前低调谦让，我多么震惊，多么疑惑，在我母亲身上看不到这样的印记，我暂时倒还不太尴尬。要是老师知道她说脏话，有时忘

了铺床，还把喝醉的客人赶到门外会怎么想。老师低声说“你妈妈”时也让我心烦，在我家，在街坊邻居家，我们说的是“姆妈”。大不相同。那个“妈妈”适用于其他母亲而非我母亲。也不适用于亲戚或街坊里的母亲，这些女人总爱发牢骚，抱怨养孩子开销大，左右开弓扇人耳光以占得上风，实在缺少老师口中“妈妈”们会有的“内在光辉”。而放学那会儿当父亲站在自行车旁等我时，我看到的那些母亲姿态优雅，妆容精致，举止有度。还有《时尚回声》杂志上那些“家庭女主人”，她们在装修高雅的房子里炖精美的菜肴，丈夫是坐办公室的。对我来说，真正的母亲是跟一种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而那种生活方式不属于我。

玛丽-让娜，她算不上是我朋友，为什么六月的那天要邀请我去她家喝汽水，她住在一个带有小花园的别墅里。我们应该是一起在她家那条街上卖彩票。昏暗的走廊挂着油画，通向一间洁白、闪亮得像是产

品宣传册上的厨房。一个穿着粉色罩衫苗条的女人，轻盈地在洗碗池和餐桌之间穿梭。也许在做一块馅饼。透过打开的窗户我瞥见一些花朵。只听到自来水冲洗沥水篮里的草莓的声音。安静，明亮。整洁。跟我母亲存在天壤之别的一种女人，在母亲节对着这样的女人大唱颂歌不会觉得像是在演戏。我觉得她是个平和、幸福的女人，因为她身边的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漂亮。晚上，玛丽-让娜会和她的兄弟们安静地享用准备好的菜肴，就像苏利·普吕多姆²⁴的诗中描写的那样，没有大吵大嚷，不会缩在桌角被尖酸地数落。秩序与和平。天堂。十年后，轮到我自己待在一间闪亮而沉默的厨房里，草莓和面粉，我进入那个画面，可我却感到窒息。

然而，直到青春期我都觉得父亲洗碗、妈妈整理货柜是很正常的。做饭、熨烫、缝纫对我而言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工作，再说对谁有价值，在学校，老师们打发那些在教室最后一排打瞌睡的女同学去读“家

政教育”，她们的学业到头了，大家都很肯定，这些女孩即使复读两次也拿不到小学毕业证。那些穿着短裙跳芭蕾舞的十岁女生让我难过了五分钟，但在院子里我荡着秋千高飞，边骑车边胡思乱想，就像母亲经常说的，我总想消耗精力。无论美丑，无论是否优雅，我都喜欢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穿小内裤和衬衫，伴着内心的音乐跳芭蕾。那是在夏天，我即将十二岁。有一次一夜无眠，我脸贴着窗户头一回目睹黎明的到来。当蓝色越来越浅，我带着一种奇特而珍贵的发现，怀着因之而来的惊奇感睡着了。仿佛做了什么被禁止的事。那一年我仍是自由和幸福的。

再过两三年我将变成一个失去自我的女孩，活在他人目光的狭小世界里，充满浪漫情怀。多少抵抗土崩瓦解。我在十二岁那年的夏天就已经发现了苗头，我对母亲的爱情小说和收音机里播放的抒情歌曲兴趣陡增，那首丝滑的《雪花》²⁵，还有红黑色天空

下吉他演奏的《波莱罗舞曲》²⁶……我发现所有男人都对“丰满”的女孩感兴趣，喜欢盯着她们短裙下的大腿。克罗蒂娜走在路上时，脚手架上的工人对着她吹口哨，而她只不过比我大两岁。我忧心忡忡，到时候别人也会觉得我丰满吗？我不想那么快地重温青春期的记忆。我已经预感到我会弄虚作假，会美化当时自己觉得丑的、无法言说的一切：我真实的身体、快感以及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味十足的女孩这一瞬间意识；会丑化当时自己觉得特别好、特别光荣的一切：被男孩们注意，表现出一种个性。上数学课时满脑子对爱情的渴望，如今我愿称之为空虚。我写我自己，想要写成什么样都可以，无论往哪个方向写都能切换自如。但如果我想弄清楚自己作为女人的成长道路究竟是怎样的，就不应该唾弃那个因为母亲禁止穿长筒袜和包臀裙而愤怒哭泣的大高个姑娘。去解释。不要说当时的我是个蠢货。那些年真的已经过去了吗，时至今日每当我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毫无准备，没

有调整好眼神、微笑，没有表现出最美的样子就会感到恐慌，这样的反应不是可以追溯到十五岁吗？我仍然期待一个想象中的身影，从青春期开始就在我眼前舞动，身材修长，比例协调，有着诱人的胸部，融优雅、神秘、叛逆和圣洁为一体的脸庞，何处安放我自己，在所有这些面具中该挑选哪一副？愿意不惜一切代价获得这样的身体。否则我永远都不会吸引任何男孩，永远不会被人爱，活着也就没什么意思。美妙的吸引力因子加上爱等于存在的目的，这个方程式比 $ax^2+bx+c=0$ 更隐蔽，轻而易举潜入我的内心。它无处不在。在我母亲阅读的报刊小说里。在她听从书店老板的建议，认为对十四岁的我精彩又健康的书里。戴利作品集，玛嘉丽²⁷的书，尤其是贝尔纳热夫人的“我女儿的书柜”丛书和她的“布丽吉特”“伊丽莎白”系列，这些作品都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也就是说，女孩从不在婚前发生性行为，这一点我很清楚。然而漂亮小姐们的命运真叫人羡慕，她们有教

养、纯洁，受过恰如其分的教育，通常有高中文凭，但之后没有职业，因为她们必须结婚。战时去做护士，一直如此。单身自由的女性是有一些，她们被称作害群之马，浓妆艳抹，作风肮脏，她们要为自己的不端行为付出悲伤、悔恨、贫穷和病痛的代价。我对她们怀有莫名的好感，这些波希米亚女人大胆奔放、稀奇古怪，但显然不像布丽吉特那样走在正道上，布丽吉特嫁了人，不贫穷，生了六个孩子还很快乐。成长道路上我发现的平庸、无趣的理想女性形象，总是跟中产阶级联系在一起，如果说我觉得乖乖女的命运好过疯女孩的命运，那是因为前者享有安全与和谐。夏日，女人们在乡下的大房子里做果酱，听小鸟歌唱，而一个自以为能为所欲为的女人却在一间保姆房里咳嗽、吐痰。我当然更喜欢幸福。

然后，在班里，在路上，一些女孩走路时扭动着腰肢，露出柔媚的微笑，摇曳着裙裾，拉扯套头衫以突显新长出来的胸部，她们自信满满的样子让我很吃

惊。而正是她们，有一个男朋友在学校附近马路上等候，因周六晚上要去参加舞会而兴奋不已，周一返校时她们会带来一些新词，bahut（中学）或 g.d.b（木头嘴）²⁸，是从男孩们那里学来的。她们也爱幻想。在我眼里她们活得相当热烈。“小姐，零分！你的地理书都没打开过！你脑袋里都装的什么！”知情的小姐妹在角落里偷笑，其他人一脸好奇。而被质问的女学生本人，面不改色心不跳，甚至引以为豪，就好像她拥有一个秘密，相较于这个秘密，全世界的石油产量不过是一个只能让小女孩感兴趣的无聊问题。她重新坐下时傲慢地用一根手指漫不经心地撩起额前一缕金发。极度自由。在我谈恋爱之前，我十分羡慕恋爱中的女孩。放学时她们中的一个人丢给我一句“再见喽”，然后穿过马路跟对面人行道上刚露面的小伙子会合，那一刻我心里多么空虚啊。我继续活在这片沙漠中。有时，我会碰到克罗蒂娜，她踩着高跟鞋摇曳生姿，简直放浪得可怕，但总有男孩子陪在她身边。

我忍不住嫉妒。晚上写作业时，我打开收音机。“看看吧，总有一天我们会相遇……”我也想成为谁的心上人。可怎么实现呢。升级行动。我花了些精力给自己打造一副迷人的形象。我是多么庸俗而认真地钻研女人味的外在特征，要能勾引人，多么顽固地想要表现自己已经长成一个十四岁姑娘。但以我当时的判断力，这些长筒袜、直筒裙、高跟鞋并非为了使我变成“性对象”，而是为了让我被人选中从而变得幸福。而且，当我走在外面，胸部挺立在套头衫下，双腿裹着长筒袜，我觉得彰显了我的自由。胸罩，心心念念之物。我母亲没考虑给我买，作为农村妇女她自己从来没戴过。我不敢跟她提，提了等于承认想让别人注意我的胸部，可是如果不展现“它”，拥有“它”又有何用，来戴上“露牌”文胸，幸运的是一个小伙伴救了我，把她的一副塞给我。终于满足。课间，甚至后来在大学城里，女孩们会谈论：“我的不够大，我敢肯定她里面塞东西了，也太大了吧，看上去跟奶牛一样，你的

像荷包蛋，合适的大小其实就是刚好能填满正人君子的一只手。”巨大的焦虑。我对着镜子欣赏自己胸前的布料“贝壳”，照一照脸、侧影，绷紧上身，举起胳膊。像是一场游戏。然而，男人们的话仿佛被提前接受了一般：“告诉我牌子就行了，白色蕾丝款最令人兴奋，能很好地托住你的胸。”为什么我感到羞辱，众多胸脯中的一个胸脯。十四岁在穿衣镜前转圈时唯独缺少他人的目光，对我自己而言我已经成为了外表。初三的作文课上，教室窗户开着，玛丽-泰莱丝对着灰暗的窗玻璃端详自己，心神不宁地做出一些难以察觉的小动作，她抬起下巴，倾斜脑袋，挺胸的同时拉了拉项链吊坠以使胸部突起得更明显。所有这些女孩，无论身处何地，哪怕是对着商店橱窗，在陈列的鞋子和模特的连衣裙之间，看自己永远看不够。她们总是随身携带镜子和梳子。梳头发，以此为借口来察看自己的脸，边看边轻柔地抚摸头发。在女厕，每个人都对着镜子调整自己的嘴型和眼神，摆出一些不堪入目的

姿势。我也如此，沉迷于自己的镜像。

借给我文胸的布丽吉特说她自己太瘦，说我有
点胖而且长得太高，男人们不喜欢高个子女人，她抱
怨自己“不得不”用垫片，她喜欢将头发缠在一根手
指上绕来绕去，因为牙不齐整，她总是笑不露齿。有
时我们会无缘无故地突然大笑起来，笑不露齿其实很
难。我跟她最后一次见面是她在洗手间给我们上指导
课，她比我大两岁，毕业之后去学速记打字。我们之
所以会成为朋友，是因为方便过周日：两个人可以一
起去看电影，看摩托车场地障碍赛，刮兑奖券。

她比我年长，小个头，性格果断，说起话来生机
勃勃，带有不容置疑的腔调，这让她成了我的启蒙导
师。周日下午将近两点钟，她风风火火地到了，“你
今天穿了百褶裙”，批评的眼神，“穿这个显得你腿
粗”。她接着说：“看出我洗过头了吗，我头发有静
电。”比较衣服、交换衣服，最爱的消遣，你觉得我
穿这个或那个怎么样。有一天我在头上扎了一条棉质

方巾，等着她给意见。她露出浅浅的微笑，接着突然用一种电影里的做作的语气说：“你属于让人无话可说的那一类女人。”五秒钟，怅然若失，我化为虚无。但在情绪低落时她也对自己不留情面，“我们不是美女，只能算是正常人吧”。身体没有哪一寸发肤能逃过她的注意，没有哪一根脚趾能随意动弹，不可以双腿交叉，不假思索地放声大笑。总是提醒我要守规矩：“腿毛不好看。你应该给趾甲涂上美甲油。你坐下时大腿露得太多了。”身体时刻被监视，被束缚，突然四分五裂成眼睛、皮肤、头发，需要分别去护理才能达到理想状态。真是艰难的事业，一个小细节就足以摧毁一切：“你见过那女的，她屁股下垂！”大多数时候布丽吉特能让我相信她有一种气质，是弗朗索瓦丝·阿诺尔²⁹那种类型，带有几分诱惑与神秘，注意，这是一种并不招摇的优美气质。令人吃惊，她怎么如此了解规矩，能让自己显得漂亮，而存心想要的话也能让自己显得性感，但千万不要让人觉得自己

是“容易到手的”，这个词是她原话。她无敌擅长鉴别“像鸡”的穿着打扮：头发烫得太卷，口红太红，高跟鞋配长裤；她也很会鉴别“土老帽”：过时的连体裤，黄配绿。她能灵活地规避这两种风险。在她身旁，我有时觉得自己像套着个麻袋，有时又太过鲜亮，我母亲还在给我选衣服，她不了解那些细微之处，我自己也很难相信一条黑裤子会给人感觉没有品位，而灰色同款就是条好裤子。现在不难猜出布丽吉特不想让自己看上去像一名女工，坐办公室的可不一样，她的梦想是带有清纯的小女孩气质，化不易察觉的淡妆，以此觅得一个靠谱的男人，最好不要是工人。对于艳遇她怀有憧憬，要是能跟路易·马里亚诺³⁰一起，她肯定不会犹豫，但艳遇总是没有好下场。正如她塞给我的小说和漫画里那样，女人总是上当受骗，人生犯下离奇大错，幸福毁于一旦。布丽吉特失败了，我不再相信她。她对无私奉献的鼓吹也不合我意，她说，爱一个男人就要接受他的全部，甚至可以吃下他的屎。

关于激情，后来我也听到其他更文明、更风雅的说法，“将自我融入另一个生命”，但说到底是一样的。

我开始使用布丽吉特那些奇怪的字眼。此前虽然经常读到，但听到从她嘴里说出来我才相信这种语言可以在生活中使用。她说到“引诱者”和“致命美人”，还有“性感的嘴唇”。她其他的兴趣爱好也没能逃过我的注意。她从《电影世界》里剪下达尼埃尔·杰兰和杰拉尔·菲利普的照片。我也剪。新歌，她一听就知道是哪首，她有个隐秘的心愿是去参加电台唱歌比赛，崭露头角，但她从没敢报名，或许因为没有把握获胜。我羡慕她能把《白色绸缎小鞋》和《这真美妙》两首歌的歌词速记下来。周日下午五点，两个女孩摇摇晃晃地从电影院走出来，在比利时人广场，世界闪烁着灰色的微光，人们的脑袋微小而丑陋。我们跟着人流缓缓拐向商业区。在连衣裙和报纸前徘徊。杰拉尔·菲利普和米歇尔·摩根继续在墨西哥的沙漠里追逐彼此。有人跟在我们后面。不要应

答，要不然你像是在鼓励他们，布丽吉特教我的生存之道，那些规矩仍然并永远要记得。取悦所有人，但不要随便让人搭讪。尤其是那些“乡下”男孩。总是在同样的橱窗前转来转去有些无聊。没有有趣的小伙子。于是我们沿着没有商店的街道走下去，有时一直走到森林边缘。三月末树林里的斜坡上可能开着迎春花，柔荑花絮也许在纷纷飘落，但和布丽吉特在一起时我从不去探索世界。大自然对她而言意味着在办公室关了一周之后，出来呼吸点新鲜空气。即使抬头看星星也跟利益相关，你连续九天每天数九颗星星，就能梦到将来要嫁的那个男人。我毫无抵抗地加入了她范围有限的散步。我们一起聊歌曲、明星和男孩。不。不止这些。

布丽吉特经常放任自己，忘了《我们俩》的教导，把循规蹈矩的小女孩外表抛到九霄云外。我们在一起谈论“那个”。而“那个”，我知道，女孩子不应该谈论。布丽吉特见多识广，说话滔滔不绝，说的内

容不仅好玩还很生猛，让我在每个周日得到解放。和她在一起，世界成了一个巨大的性器官、一股绝妙的欲望、一种经血和精液的流动。她什么都知道，男人可以和男人在一起，女人可以和女人在一起，如果不想生娃就得这么办。我将信将疑地翻遍了床头柜。什么都没找到。我从床垫下面抽出来一条皱巴巴的毛巾，沾了污渍的地方已经干硬了。可怕的物件。真正的亵渎。她用的哪个词来着，男人的那个，“汁”，“流汁”，我们不了解“精液”这个也许是博学的字眼，她曾在某个地方读到过。十三岁时听到这个词在我父母的房间里回响，为什么不能写出来。我们相互之间讲的故事足以吓到大人，随便什么都能变成淫秽之物。抬起的腿，张开或立起的性器官，色情杂志总是那些陈词滥调，我们口头编出来的故事更精彩，更快乐。没有性别歧视，在我们的技术性交谈或玩笑中男女均有份。有一天我在被单下面第一次体验到那种震颤，面对布丽吉特我不可能陷入羞耻感中，她笑着

说，我有时也弄，但不会告诉神父，这跟他没关系。

我多么得意地向她宣布我也“那样”了，不必再模仿她腹痛的样子，我舒适地进入我的新状态。

不，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平静地把百褶裙撩起来，褪下内裤，坐下来，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大腿根被松紧带勒得很紧。绝对惊讶。见到我还从来没见过的东西，我自己的血，那个。一种状态终结了。我像那些用咖啡残渣进行占卜的人一样，一直盯着看。就是这样了。五分钟后我母亲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就是这样成为少女的。”和昨天相比，我没有更像少女或没那么像少女，只是发生了一起神奇事件。无法告诉母亲我有多满意，只能分享给唯一一个理解我心情的人——布丽吉特。我已经在脑海里构思怎么来讲这件事，你想，周一我就要跟往常一样去上学。同时也要告诉她我害怕这个东西突然不来了，我本来希望它是美丽清澈的泉水，没想到却是沼泽般的渗水，而她呢？

对她而言，什么都可以拿来说。说起话来百无

禁忌，这点确实将我和她联系在一起，日后却让我感到羞耻。没有在校时那种矫揉造作，没有不可告人之事。“我很喜欢在电影院看女人的胸脯！”我又听到她自信的语调，夏天的周日，她嚼着一根草，时不时吐出来再嚼，“女人们不喜欢做那个，我母亲告诉我的”，然后她忽闪着猫一样的眼睛笑起来，“算了，反正我会喜欢的！”谈论身体且笑个不停。但我十分肯定这样做不对。理想的女孩：另一位布丽吉特，少女故事丛书里的主角，去看画展，从不说一句脏话。我的这位布丽吉特，并没有忘记真正的少女应守的规矩。“我会喜欢做那个的！”但她站起来，优雅地轻轻拍了拍裙子，抬起下巴，带有尊严感地微微撇嘴。这一切，只发生在我俩之间，在其他人面前不能有这样的表现，否则会被当成淫荡、没有教养的婊子。甚至，规矩就潜伏在我们的秘密交谈中。不能犯错，从布丽吉特那里我了解到关于童贞的一切，那是一扇在疼痛中由男人打开的门，是良好品行的标志，若标志

缺失是不可能瞒得住的，除非注射几针柠檬汁，但也不准。跟布丽吉特同在一个办公室的勒内，沉醉的表情，头往后倾，半闭着眼，做完弥撒出来时说：“他跟我说，新婚之夜如果你不是处女，听好了，我会勒死你。”当时他们正在一家售卖家用电器和行李箱的商店门口。真叫人瑟瑟发抖。那些未婚母亲，没什么好流泪惋惜的。而男人可以尽情做爱，和女人相反，他们最好能有性经验，知道怎么“引导”我们。尽管我度过了一个积极的童年，充满好奇心，我还是接受自己低人一等，要被献给别人的必然事实。带着这种消极的想法，我仍然乐于去想象，一张大床或面朝天空的草地，一张脸逐渐靠近，双手，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从来由不得我做主。要承认，我们敢于描述自己的月经和欲望，但受她影响我开始觉得婚姻是必要且神圣的。当我们谈论我们的性，我们都心照不宣，觉得自己无法得到彻底的体验。

很难探寻自由和外界影响各自所占的分量，我曾以为我的女孩之路笔直向前，实际却通向四面八方。有一点可以肯定，布丽吉特时期对我母亲而言是致命的，她的光辉形象突然蒙上了一层滑稽的色彩。都是些细枝末节，家具蒙着灰尘，床没有整理，还有腰围问题。我把布丽吉特带到我的家庭私密空间，她让我见到一些我此前有所感知但并未加以重视的东西。不，我母亲不会做饭，甚至不会做蛋黄酱，她对做家务不感兴趣，她没有“女人味”。有一天吵架，这句恐怖的话：“你母亲是匹母马。”大多数时候，没那么直接，只是笑，一些“嗯呃那个”。“嗯呃那个，你的梳子，该好好洗一下。碱水你不知道，太一好一用一了。”省钱的手段：“我母亲给我做连衣裙，我所有的连衣裙都是她做的，算起来没那么贵。”我总是回答说母亲没时间，确实如此，但为什么要找借口并羞愧地说她更愿意在店里招呼客人、埋头计算收益，我羞于承认她不会缝制连衣裙。最糟糕的莫过于布丽吉

特第一次撞见我父亲在压土豆泥时好奇的眼神，噢，多么古怪的场景，她尖锐的问题透露出可怕的震惊：“这是您做的？”另一个星球，动物园的兽类。削土豆皮的居然是您！洗碗的居然是您！后来其他一些更有礼貌的小伙伴也忍不住惊讶，虽加以掩饰，我还是能感觉得到。是你父亲他……，可怕的反常，可笑的事，《巴黎竞赛画报》上的幽默漫画，窝囊废男人。要是我母亲能有一些特殊状况，比如身体不太好或生了一堆孩子，那还能减轻这件事的可笑程度。可她什么状况都没有。仿佛他们故意选择用一种反常的方式生活。我无法说服布丽吉特，说他俩的分工无关紧要，对做生意来说其实还挺实用的。那他就是个家庭煮夫呗。突然他俩都显得滑稽可笑，父亲的和蔼变成了软弱，母亲的活力变成了凶悍。他在灶台洗洗涮涮，她口无遮拦吵吵嚷嚷，我感到羞耻。我多么向往一个忙碌却低调的母亲形象，要是她能像萨克森陶瓷人像那样，而不像现在这样经常发脾气，那该多好。

他们两个都令人尴尬，不合秩序，就是存在于良好家庭或那些想要获得尊重的家庭里的秩序。一个大男人择菜并不光彩，他要是能稍微像其他男人就好了：对体育感兴趣，孩子成绩稍微下降一点就责骂，禁止出去玩，把食物摔在地上。那种威风凛凛的父亲，在学校很受欢迎，一些女孩自鸣得意地讲述自己父亲的功绩：他把我关在屋里，直到复活节前都禁止我去参加舞会。父亲是敌人，但她们似乎喜欢这样的父亲。至于母亲的威严，给人的观感就没那么好了，似乎含有某种低俗意味。再加上初四³¹学的《女学究》³²，他俩只能显得滑稽可笑，您想那可是莫里哀，应该唾弃菲拉曼特，为克里沙尔的慷慨陈词鼓掌，尽管私底下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笑。

正常的父母，我尤其在布丽吉特家见过。黛芬丹夫人一直在家，要么在厨房里忙，要么洗点小东西，做些小针线活，她不让我们进餐厅：你们会把自己弄脏的。一个小宇宙，在我眼中这个小宇宙里的人做着

擦门把手这样的小事情，真滑稽，该做面条还是焗土豆牛肉糜怎么会需要严肃地考虑五分钟。一个慢速宇宙，对我而言太安静了，我从早到晚生活在一个声音的熔炉里。午后厨房的这种寂静。空洞，压迫感，跟学校的寂静不同，学生们学习时的寂静如此饱满，随时准备爆发成室外的欢笑与叫喊。一种令人麻痹的寂静。我迫不及待要出去。正是在那儿，我发现了母女间关于家务令人惊讶的默契，此前我毫无概念。“看看你的套头衫，我用肥皂片洗过了，跟新的一样。我马上用印花布给你做个床罩，很清新……”布丽吉特帮着给蔬果去皮，帮着做饭，自负的样子让我觉得我什么都不会。确实，我不知道怎么调蛋黄酱，也不知道怎么把胡萝卜皮削得又快又薄，但我可以辩解说我在学校的成绩还不错。不，这不足以弥补。对一个女孩而言，什么都不会，所有人都理解为：不会熨烫、做饭、好好打扫卫生。以后你嫁人了可怎么办呢？好一句话，无可辩驳的逻辑，说出来就是要刺激你，鸡

蛋要把壳剥掉，好的好的，到时你就会知道你丈夫喜不喜欢喝石头汤！我笑了，结婚听起来好遥远，我眼神涣散地看着布丽吉特使劲拍打床单，床上一个褶子都没有，她不像我那样铺床。不管怎样，我开始相信我“缺少某样东西”。既然所有的小姑娘，所有的女人都必须负责家务，那我就必须在未来职业之外再学点东西。青春期的一个夏天，尽管母亲耸耸肩，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儿，骑自行车去吧，我还是每天早晨打扫房间，甚至把她的房间也打扫干净，我变得一见到脏乱就浑身不自在。熨抹布、熨手帕，我从一些简单的东西开始，逐渐让自己习惯。我把洗好的衣物拿去晾晒，一条毛巾、一个夹子，一件衬衫、一个夹子，慢吞吞地把绳子挂满，九月的热风拂过我的双腿，女孩温柔天真的消遣。那个周日，我做了一份巧克力慕斯。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也会。八月十五日家族聚餐时，我自尊心得到了极大满足，他们所有人都品尝了，说“比糕点店的好吃”，想必没人再说“那

女孩会变成什么样”，他们欢快地把我的巧克力慕斯塞进嘴里。终于成为完整的女孩，我欣喜若狂，再也不缺少什么了。但不要夸大其词，这只是娱乐和游戏，熨烫和烘焙都只是阅读之后的放松、假期末尾打发时间的消遣，以烘焙为借口我可以不受惩罚地随意品尝甜得发腻的糖蛋混合物，还有已经化开的暖融融的巧克力，整勺挖着吃。很快新学期开始了，永别了家务和娱乐，要把严肃的事放在首位。

母亲和老师们反复讲的话。我相信她们，但未来似乎晦暗不明。做小学老师足够了。已经听说“小学老师都不结婚”。我对目前的学业感到难以忍受。沉滞期已经开始。从初三开始，课上再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真正感兴趣。沙勒度量关系或欧几里得公设，我漠不关心，您丧失了一直以来坚持的目标，说说怎么回事。法国大革命、广岛、几篇课文讲解，能听得进去的充其量就这些。关于学习，我只能说勉力维持，昨日的好奇心已荡然无存，残留的不过是成绩不要下

滑的顽强意志、一点骄傲，再无其他。或者说我对自己魅力没有信心，做两手准备，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更愿意认为当时我没有完全摆脱关于自己的某种看法，用母亲的话说便是：如果我什么都不做，那我就什么都不是。但在那段岁月，为了成绩不下滑，我花了多少精力啊。一些夜晚，我磨蹭三小时完成几何测验，手里画着直线和垂直线，脑子里回响的却是阿兹纳武尔³³的一首歌。我在班里的姿势，瘫坐着，胳膊肘支在桌上，两手托着下巴，眼睛看似盯着课本或黑板。安静的做梦姿势。我很快养成了只听老师前几句讲解的习惯，四年期间没有哪节课是从头听到尾的，晚上我努力自己照着课本学习。有些老师照本宣科，上课更加乏味，不过稍加习惯之后，我们就能边写字边想其他东西：男孩、编出来的爱情故事、歌曲、欲望，坐着是最理想的姿势，我陷在一个巨大的软绵绵的梦里，痛苦地从中抽身去做拉丁文翻译练习。有时，周日从电影院回来，想到还有作业在

等着我，再看看身边的布丽吉特正小碎步迈进她甜蜜的夜晚，去准备周一要穿的衣服，洗头发取悦男会计，一瞬间，我好羡慕这种没有冲突和焦虑的生活。我要准备第二天老师提问的内容，学那么多东西，写那么多作业，参加那么多考试。去拥有一份不起眼的工作，使用打字机很有趣，用自己挣的钞票买衣服，随意出门，做大多数女孩做的事，让生命只是琐碎与等待。正是在这一时期，顾客们、我父母的熟人们，开始以一种狡黠的神情说：“你们的女儿，很快就要不在你们身边了，嘿嘿！”我母亲有点恼火：“她还早着呢，先好好享受青春。”但有时她也会接着说：“婚铁定是要结的。”要是我成了一个老姑娘她会十分痛心。那些年我有时会产生不负责任的渴望，向往安逸，有时又会从实际出发觉得学习是一种等待方案，谁知道呢，在遇到真命天子前总得想办法生活。被人牵起手，金色厨房，自来水欢快地冲洗着草莓，我的孩子我的姐妹，你会看到，有一天我们会相遇的。想

要被人爱，被选中，为此要去取悦别人，对于这种混杂的情绪，学校里没有任何东西能与之抗衡。修女们宣扬“质朴”，痛斥能激起男人欲望的长裤，穿长裤的理由又多了一条，还敦促我们阅读《克里斯蒂安娜》，这份报纸上的女孩都面露微笑，洋溢着一种基督信徒的傻乎乎的喜悦，身穿难以置信的老土衣服。修女们颂扬正直的生活、与男生的坦率纯洁的同伴关系。她们让我们传阅《你已经成为女人了》，这本身心指南散发着约束和无聊的气息。尽是一些要加以避免之事，文笔隐晦，首先要当心男孩子，他们“在生理反应上跟你大不相同”，是一种“粗鲁、急迫的冲动”的牺牲品，“他们身不由己”。而我们似乎并没有太多感觉，如果我们被占有，那是因为我们想要被占有，微妙区别。这些给圣母玛利亚的孩子的建议，我们女生忍不住咒骂，相较而言我更喜欢阅读让肌肤充满光泽的建议以及《时尚回声》上的小说。十五岁那年唯一能让我心动的宗教是爱情教。我什么都愿意做，只

要你向我提出要求，皮雅芙³⁴说的没错。我饶有兴致地读《熙德》这部戏，荣誉与爱情，故事荒唐，但不管怎么说比奥地利王位继承战有趣。班里其他女孩都跟我一样发呆走神吗，我记得她们说自己在法语课、数学课上“睡得迷迷糊糊！”表面上都在用功学习，从没有未完成的作业，从没有反抗，只有一些笑声和窃窃私语。我们只想维持现状，一群没有野心的小羔羊。例外总还是有的，比如刻苦至极的勒盖，她是为数不多肯定能走得很远的女同学，但没办法欣赏她，瞧她那样子，阴沉着脸，衣服穿得像黑桃 A，我们并不会因为她聪明而羡慕她，反倒因为其他方面可怜她。为了拿到初中毕业证短暂发力之后，到了高一人彻底松懈了。数学老师，一个有着庞大身躯的女人，格子衫上套一件黑色披肩，她怒吼：“小姐们，你们缺少激情！一个个昏昏欲睡！萎靡不振！请拿出点激情来！”不知所云。年复一年，班里的面孔有所变化。剪枝。首先被剪除的是家境最不宽裕的，去做了

速记打字员或售货员，然后是商人的女儿，也去卖东西但神色不一样，农家女则最终消失在自家田地里。另一些女孩进来，学校里满是流星：被开除的疯疯癫癫的姑娘、在入学后第一个假期结婚的漂亮而惆怅的女孩，还有需要严加管教的心不在焉的学生，最后总是请来一位具有权威的父亲。所有那些家境优越的女孩，除了跳舞，生活没有其他目标。家庭舞会和布拉桑³⁵的歌。很快她们将我吸引到她们的圈子里，我在数学文件夹里贴詹姆斯·迪恩³⁶而不是让·马莱³⁷的照片，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种进步，我抛弃了马里亚诺转而拥抱派特斯合唱团³⁸，我不觉得这是同样的崇拜。要是跟她们谈论未来，如同跟布丽吉特一样，我们总爱谈论被称作“调情”的爱情。歌手、调情、穿衣打扮、彼此之间的八卦，这些构成我们最牢固的聊天话题。我觉得自己真的成了一个更加自由的女孩。

坎坷的历史开始了，哦，美妙的历险³⁹，并不太

美妙，我面目全非地从中抽身。羞辱与反抗。我如同出门旅行一般接近男孩们。既害怕又好奇。我不了解他们。从前，夏天他们在街角朝我扔栗子，冬天在校门口朝我丢雪球，我都由着他们。有时他们在人行道对面辱骂我们，我便骂回去，视情形骂他们是一帮白痴或蠢货，无论是否有成年人在场。那些躁动的家伙，有几分滑稽。要愉快地玩一下午轮滑才能对一个男孩改观。他们应该跟我一样发生了变化。我走向他们时带着我小小的行囊，里面装着女孩之间的聊天、一些小说、《时尚回声》里的建议、一些歌曲、几首缪塞的诗和过量的幻想。包法利我的姐姐。在内心深处，还隐藏着似乎不该有的对一种欢愉的渴望，我已独自发现了通往这一欢愉的路径。世界的另一半对我而言当然是神秘的，但我相信，那一定会是一场节日。男孩们和我之间存在不平等以及生理以外的差异，对此我缺乏真正的了解，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是一场灾难。

想象中的节日，迟迟未来。一个高个子女孩，穿着稳重，几乎没有那种能引诱男孩尾随自己的衣服，自初领圣体以来，五月例行把头发烫直，用男人的话来说，“丑女”一枚。很多女孩知道如何“凭直觉行事”。我不知道。一天，出于绝望，我朝镜子里的自己吐口水。周日下午变得越来越灰暗，布丽吉特总是害怕被搭讪，过了很久我才明白她在寻找结婚对象，她渴望做爱，但要等到婚后。总是唾弃周日尾随她的男人，而我对这些人也不感兴趣。“嗨，我们在哪儿见过，小美女你们好吗？”没用，乡巴佬的喜欢毫无价值。我无视他们的存在，这再自然不过，同样不公平的是，那些我确信会讨我喜欢的家伙，他们无视我的存在。可要在哪里以及如何才能遇见他们。布丽吉特只有一位男同事，此人与一位女理发师在认真地“交往”。可以参加家庭舞会，但谁会邀请我呢，只有牙医、大商人和工程师的女儿，也就是从前那些娇娇女会在家里办舞会，她们不是我的朋友。在一座只有

八千居民的小城我们不会混淆自己的身份。周六晚的集体舞会，开玩笑，只有女佣和女工参加。要是我有个兄长，他会带我出门，他有哥们儿。那些女孩张口闭口都是自家哥哥如何如何，他刚参加完高考，他休军假过来的，他说小摩托糟糕透顶。神一般的兄长。可惜我没有。有时，谋划旅行并不容易。还剩下偶遇，形式并不丰富。

来一场艳遇吧，那次曾是一场艳遇。他熟悉自己的角色，也许有些操之过急。身材高大，像“阳光琥珀”牌防晒霜广告上的古铜色肌肤，声音温暖明亮，连载小说男主人公类型，他说了些费解的话，又加了一句“出自拉辛，我觉得”，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嘲笑我们，关于拉辛我只知道一部《讼棍》。在城外的一块草地边，布丽吉特翻着杂志，我吃着桃子。说完拉辛之后，他把“韦士柏”牌小摩托放倒在砾石路上，漫不经心地走过来坐下，双手抱膝，摆弄他的墨镜，

自在地讲着话。一切都恰到好处，跟“我从前在哪儿见过你”截然不同，像是经过巧妙编排。跟电影里一模一样，少了音乐而已。然而糟糕透顶。我从没有如此慌乱过，剥桃子皮时我的手在发抖，汁水沿着我的手腕往下滴。惊恐与羞耻交织。要是只有我自己，我就逃走了。我恨他说的话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除了时不时的“是”“不”“这要看”，十四岁，读初四的我更喜欢杰拉尔·菲利普⁴⁰、作为歌手的贝科⁴¹。他在墨镜后面窥视着我们。布丽吉特吮着一根草，时不时咯咯笑两声，从嗓子眼里挤出来。他穿着短裤，没穿衬衫，我看到他的肌肉、皮肤，一个英俊的小伙。真可怕。在那一刻我告别了童年，对这一半投向我、一半投向我朋友的目光感到羞耻，对这毫无区别地说给一个人、也说给另一个人听的花言巧语感到羞耻。就此打住，让对方意识到这个游戏让我反感。错，因为我留下来了。不管怎么说，被人戴着墨镜打量也是一桩乐事。他俯身去看布丽吉特的杂志，轮流盯着我

们：“您应该换这个发型。”他指着《我们俩》封面上的一个女孩对我说。“至于您，布丽吉特，适合这个。”他不说我们长得漂亮，但以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更妙。他们怎么说来着，我们会被驯服，受惊的年轻小姑娘，多疑的小母猫，古铜色肌肤的帅小伙对你们没有恶意。男人们那样对女孩讲话也许是正常的，我被驯服了。我逐渐相信，那次相遇近似一桩风流韵事，一个有趣的家伙，二十三岁，他说他是化学家。我甚至斗胆问他住在哪儿。然而，尽管这位假期引诱者手法娴熟，始终没能将我们这对连体姐妹剥离开，我们之所以形影不离，一方面出于害怕，更多的是出于嫉妒，坐他的“韦士柏”兜风，必须轮流去坐。他对我们说“Ciao⁴²，明天见！”Ciao，一个新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人生第一次，我陷入一场关于男孩和感情的奇怪聊天，绕来绕去讲不清楚，可我们觉得能将一切搞明白，你一句我一句说个没完。你知道吗，他是化

学家。你听说了吗，他二十三岁，我没看出来。我也没看出来。笑，我们看见了他肚子上的毛，再笑，他的毛真多啊。开黄腔没能拯救我们。真是一个特别棒的家伙，他应该能得到任何他想得到的女孩。他看中了我们，真是受宠若惊，有很多比我们好太多的女孩。奴隶的絮叨，向神进香。只是聊着天，我就爱上他了。对于明天，我暗下决心，我咄咄逼人肯定已经让他有些不悦了，明天一定不能这样。我们争论谁第一个坐他的“韦士柏”。布丽吉特哼唱着“夜晚我用双手描绘，一个希望的形状”。我们的自行车靠在一个斜坡上，正是三小时前停放的位置。多么奇妙的经历。后来，我二十岁那年，在舞台遥远的灯光下，唐·璜轮流勾引农妇玛杜丽娜和夏洛特，我为之着迷，却也感到恶心。我们没那么蠢，也没那么土。被骗，倒是一模一样的。

第二天，我仿照《亲密》封面照扎了马尾辫。我们还去了那个地方，白跑一趟，后面几天同样如此，

直到布丽吉特假期结束，他都没有再露面。我们一会儿猜测他有急事返回勒阿弗尔了，一会儿又想他是不是觉得我们长得丑或放不开。太晚了。没有丝毫愤怒或蔑视，我们不怪他。十四岁时完美的服从。后来，在沙勒度量关系和引导虚拟式的动词之间，我坐“韦士柏”兜风不下百次，我的第一个爱情故事，经过一番改造，尤其是将布丽吉特撇在一边，进一步扩充了班级言情小说的容量，这样的小说，班里每个女生都会编造一二。现在的我可以说，那是个没能忍受两个蠢女人的肮脏的勾引者。我在少女时代说不出这样的句子。杰拉尔我爱你，我在草稿本上这样写着，而在我脑海里的字眼是“初恋”。问题出在语言上，当时我没有其他可用的词汇。

说实话，他没有“活过”圣诞节。我觉得他有点老，二十三岁，年龄上的差距，我看到了，很容易反感。而且我还想遇到其他“韦士柏”。“在我身上还会发生什么呢？”就是这了，这唯一的、重大的问

题，直到十七岁构成我的整个形而上学。走出教室，漫不经心，大衣像麻袋一样从脖子裹到脚踝，当季潮流，努力打造的一种“风格”，有点笨拙，过于严实，那也只好算了。噢，我外表上的胜利多么脆弱，随便什么，一个眼神、一个意见，足以摧毁它。而布丽吉特和班里的女同学，她们都很擅长挖苦别人。但需要取悦的并非她们。母亲，你的话我已经听够了，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听我自己的声音，微弱而坚定，跟你的不一样。当我说弗朗索瓦兹跟某某人走在一起，玛丽-琼每周六都去参加家庭舞会，你什么都听不出来，真让我恼火。我过分宣扬别人的自由，为的是能谋一点来给我自己。对于我做的那些比较，她无动于衷，“幸好你不像她们”。不，我像她们。十六岁，在你抛给我的正直、倔强的形象中，我再也认不出自己了。

小城里温和的勾引，更像是一时兴起的结伴，要么认识，要么总有一天会认识，从没有粗暴的言行。在纹丝不动的窗户下，总是同样几个老人、同样几个

商贩从自家门口投来的目光，会觉得被窥视但依然有安全感，跟大城市的猎捕截然不同，令人不安的猎捕者，性或者刀刃。被勾引的女人，爱勾引的女人，在那个时期我分不太清楚。跟很多女孩一样，我喜欢“绕圈圈”，在一排排商店门前走过来又走过去，一些男孩子也是走过来又走过去，用余光打量，有些还不错，有些则很糟糕。有时停下来。办公室职员，商科学校的学生，周六周日会有几个鲁昂的高中生。对于我的同龄男生，我发现得比较迟。首先我觉得他们好玩，大部分都挺有趣的，各种文字游戏真让我感到快乐，当然我们女孩子不像他们那么擅长，比不上男生的才智，我的生活怎么能没有“你好吗排烟管”⁴³和“我在哪国游荡”⁴⁴。我没有接受过一种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式的教育，并不抵制丑恶的文字游戏，也没有年轻女孩的纯洁耳朵，不会对粗俗的影射嗤之以鼻。我当然会笑。但我必须立刻承认，他们玩的花样太少，我不是您想象中的那种处女，令人厌倦，那些

黄色故事，布丽吉特早就跟我讲过了。他们在我眼中几乎跟扔雪球时期一样的躁动和可笑。我还发现，他们总是喜欢谈论自己：他们的喜好、他们学的功课和受的惩罚、他们的摩托车和胆量。倾听男人，集中注意力听，这就开始。一直让他们说或笑。除非说些蠢话，故作天真，让他们哈哈大笑，露出自负嘲讽的表情，“她真可爱！”装出没头脑和幼稚的样子。总是要把我们拖进他们的世界里，你来打台球，打保龄球吗，我今天有一场跑步，是比赛，好的，好的，我去看你比赛。他们无法想象我们也有自己的世界，我有我的故事，班级、闺蜜，无法跟他们多说，啊！你那些好姐妹全都是女同性恋，话题立刻终结。想告诉他们数学对我来说好难，我喜欢法语，比如卢梭的作品，他们对此感到无聊，女生的代数问题不像男生的那么重要。无论在我家还是在学校，女孩们学业上的成功都受到鼓励，和他们在一起时，好成绩却给我带来坏处，他们有戒备心，又来一个惹人厌的，女书呆

子他们反感得很，会让他们失去热情，没有心机的完美女孩万岁！我想回家学习时他们嘲笑我。一直到很久以后都必须习惯，除了我父亲，没有哪个男孩，没有哪个男人会重视我所做的事。毫不动容地听着，小学老师？你会变成老姑娘的，做律师，你过于膨胀了吧？一些人感到厌烦，而这位温柔的金发男孩，如此甜蜜、情意绵绵，亲爱的，我担心学习让你太累了，你为什么不找一份秘书的工作。也许对他们而言，一旦拥有头脑我们就不再是真正的女人。一天，我们在路上遇见她了，那位勒盖，尖子生，我向她打了声招呼，当时我跟一些男性朋友在一起。他们尖叫起来，令人窒息：“这个恶心的家伙，这个讨厌鬼是谁？”我表示抗议，她是个很厉害的女生，因为我自身比较懒散，在内心深处有点羡慕她。如果听到别人像背后议论她那样来议论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像她那样，无视别人的目光，放弃所有我仍懵懂期待的东西——爱情、肌肤、他人，我简直无法想象。

我的悲剧已经来临，这个可怕的缺陷我不知道该如何摆脱。我需要男孩子，但为了讨好他们我必须真的变得温柔可人，承认他们是对的，学会利用“女性武器”。消灭仍在顽抗的东西——征服欲、做真正的自己的欲望。若非如此便是孤独。若非如此便是看着自己的嘴唇和胸脯心想这些毫无用处。那当然要如此。我没有采取正确的手段。对于吹牛皮的，我毫不留情地反驳、取笑。我仍执意谈论我的喜好，书籍、诗歌，住嘴，哦住嘴吧，为什么，我可以听他们聊足球，听一个未来的兽医讲给患口蹄疫的母牛打针，高中男生淋浴房里互相比较生殖器长短粗细的惯常玩笑我也能忍。微妙区别，我的姑娘，微妙区别，不要搞混，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啊！啊！不要惹恼男孩子，你难道不知道？我不知道的是，应该向一个男孩子隐瞒我喜欢他。男人喜欢主动选择，亲爱的。我才不管，我也喜欢主动选择，我总是无法理解男女之间的区别。犯傻，将角色颠倒，则立刻被说成轻浮女孩，

唾手可得。不存在轻浮男孩。那天是我自己无意识地、兴高采烈地去勾引，我来到商科学校门口，他应该会从里面出来。没见到人。杵在原地可不是我的习惯，他在哪儿，诺尔路，环岛，这就去。突然，一群人，一个声音：“又是她！”混蛋。我背着书包赶紧走了，气得胸闷。我不知道该如何表现，要么过火要么不够，浑身带刺而又喜欢主动追求，可爱的微笑，疯狂的崇拜，然后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感到厌倦，对坐小摩托兜风失去兴趣。我只怪我自己，因为男生永远是男生。Boys will be boys，英语语法这样说，普遍真理的范例。

旅行，我在等什么……如果倾听内心的声音，我相信我还会等待。伟大的爱，那一定很美。但环顾四周，班里同学，还有布丽吉特，她们都“知道”，而我不知道。终结现状的最好办法，不动感情地为自己选择一个搭档。他跟我一样在邮局柜台排队，躲躲闪

闪的眼神，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一直持续到环岛。这人挺无聊的，而且嘴唇很厚，看上去比较斯文，像数学很好但不属于学得最好的，我对他没有任何感觉。就是他了。表情、微笑赶紧到位，好的周一见。不不，这并不悲伤，即使跟小说里的不一样，即使温柔乡地图⁴⁵我草草了事。为什么总是要有糖水，要将两颗心刻在树上以保留美好回忆。在这多风的三月末，三天的等待，如同初领圣体前的三日隐修，同样的缓慢，同样的迟钝。我做着准备，头脑的准备要多于身体的准备。我想象着，规划线路，计算我能支配的时间，母亲把我看得很牢。海蓝色套头衫、白色衣领、流苏，我提前一小时准备就绪。自由的行动，是庆典还是牺牲，哪种意义，我觉得我仍是以一种坚定的步伐走向环岛。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这件事是我自己推动的。当我看到他穿着连帽呢子大衣，笑容满面地走来时，我想逃跑。既来之则安之，毕竟是我自己想要的。懒洋洋地说几句话，并肩走在周一空荡荡

的人行道上，四分之三的店铺都关着门。周日电影海报还张贴着，是罗密·施耐德主演的《一个女王的少女时代》。感到有些无聊。自由，但不多，行动的指挥权不在我手里，我顶多有权建议：“嘿，咱们走这条路怎么样？”他以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赶紧扮演傻乎乎的没头脑的姑娘，“我喜欢黄水仙，那边花圃里有很多，是的，很多！”首先是胳膊，在肩上，沉，受不了。声音突然变得如此低沉与温柔。好了。成了。异性有着粗糙的脸庞、坚实的身体和强有力的呼吸。既没有肉体上的快感，也没有情感上强烈的冲击，哪方面的恩典都没有降临，我相当吃惊。天空阴沉，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像在做梦，而像是在超意识里进入不眠之夜后的黎明，一切涌入眼睛和耳朵里但说不出话来。一个老太太隔着栅栏跟邻居聊天，她看着我们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时光，这就是生活。”他把我搂得太紧了，我走路走成了剪刀步，每十米就要停一下，自己觉得很滑稽。我想到高考，以

及高考后的夏天。一个阶段已跨越过去，我感到终于摆脱了一种好奇。回家路上我满心欢喜。“你在牙医那儿待了很久！”“是啊，人太多了。”母亲从秤上抬眼看着我。她在“小玩意儿”和其他事上保持沉默，我也对她回以沉默。上楼来到自己房间，我想起其他女生跟我说过的：“我事后洗澡了，无论如何我都必须洗澡，心脏一直跳一直跳。”我照了镜子，吃惊地发现镜子里还是从前那个自己。

旅行还不错，我渴望继续前行。只相逢一次便表现出一种默契，始终让我震撼不已。他的目光中没有闪现权力之光，我占有了你，要不就是那时我还不懂得辨认。我见到的只是一个不苟言笑的男生，一副已让我感到亲切的面孔。几个月里，我们在一起总共度过了四十多个小时，我把时长加起来，仿佛这是一座有待扩充的宝库，里面装着珍贵的时光。阳光温暖着我的脸，但背下的土地仍有些凉。以前和母亲在乡下散步时，我经常远远瞥见轮廓模糊的人群。成双

成对。我无法转移视线，他们到底会做些什么。现在轮到我了。惊愕。孩提时代的重要梦想，想象过也扮演过无数次的亲吻和拥抱的画面，我终于经历了。我以为会有的负罪感在哪儿。爱情在哪儿。跟男生约会是种成就，这一信念已死，几近可笑。我们俩的书包紧挨着放在草地上，但一种共同生活，简直荒谬。结婚的念头第一次使我感到害怕。我如梦初醒，如卸重负。那些愚蠢的想法、连载小说、生命中唯一的男人，全都结束了。除了雷米的肌肤还会有其他男人的肌肤。我以一种崭新的面貌不遗余力地投入学习，通过高考第一部分⁴⁶之后，我在哲学中找到了扰乱我内心的诸多问题的答案，而爱情和男人对我来说似乎已成为一件简单的事。我大量阅读。自然是读萨特、加缪。裙子和失败的约会，这些问题显得多么琐碎。解放思想的阅读让我彻底远离了以女性为目标读者的连载文章和长篇小说。我无所谓手里读的书是男人写的，主人公也都是男人，罗冈丹⁴⁷也好，默尔索⁴⁸

也好，我都能与之共鸣。生命应当如何度过，这个问题没有性别之分，其答案也没有，高考那年我天真地这样以为。我带着一条座右铭前行：以从不产生遗憾的方式行动。是谁给我灌输了这一原则，应该不是纪德，那时还没读到他，我甚至不知道对一个女生而言这条原则很难贯彻。很快就知道了。跟父母还是跟雷米出门，什么是我将来会感到遗憾没做成的，轻松给出答案，那就找些借口，绞尽脑汁撒谎，欧耶！溜出去了。可是跟夏天的裙子和搂抱一同而至的欲望，我该拿它怎么办，才眉来眼去两个月，照理说不该那么快就紧紧搂在一起。我总是渴求更进一步。像他一样。他的手第一次抚摸我的背，这令人陶醉的专注，我屏住了呼吸，搭扣咔哒一声松开了。但如同我过去读的书上所说，“我猛地推开了他”。我想起了那些写给女孩的建议，将我的自由原则抛之脑后，“轻易到手的男孩得不到尊重”，“一旦开始便再也停不下来”，致命的下坡路，《知心话》上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所

描述的下坡路。我要是跟玛丽娜一样会怎么样，每个男孩都说她是公交车。当她的马尾辫灿烂地摇曳在比利时人广场的一角时，他们放声大笑，看呐，破鞋来了！女孩们也放声大笑。接下来好多年，我从没见到任何人捍卫女孩子的性自由，尤其不见女孩们自己。玛丽娜至少跟三个男的睡过了，她是个婊子。我忧心忡忡，用他们的话来说，我不会有点婊里婊气吧？自由，下贱。我觉得自己没有勇气选择成为一个贱女人。安全期，可爱的计算，无可挑剔，我们每个人都有，认真抄在一个本子上，但我不太放心，这小小的日历，怎么能制服这不可见的无声的东西，子宫和卵巢似乎不存在，但像雏鸟的嘴巴一样总是张开着。无法准确测量这一恐惧的强度。所有的古希腊悲剧和拉丁悲剧，全都潜伏在我肚子里。荒谬至极的命运。往往是在阳光明媚的一天，生命突然完蛋，要么披上婚纱，要么带着小行李箱和小孩，独自悲惨地生活。面对这样的命运，加缪的反抗精神以及自由的哲学追求

显得无足轻重。他是个安静的同伴，我挺喜欢他，有时跟他一起玩，我渴望跟他做爱。不，不希望我的未来在每月的第二十八天停止。后来我再没有比十七岁那年更接近性自由与一种引以为荣的感官体验。而我立刻发现不可能拥有。我清楚意识到的第一个性别差异让我深感绝望，我不相信哪一天能被消除。男生可以随心所欲，姑娘你不可以，得抵制，这就是规矩。要抵制，就得采取通常的防御策略，把我的身体从头到脚分成若干区域：通行区、模棱两可的实时演习区、禁区。只能逐寸退让。每一份快感对我而言叫作失败，对他而言叫作胜利。我从来没有想到，对异性的体验要以堕落的词汇来描述，这并不愉快。在女生之间，我们羞耻地互相吐露自身的“懦弱”，从来不提快感或自豪。我宁愿再次孤身一人。

得救了。我的少女成长史充满一些能帮助我生活、概括一切的字眼，它们构成一种实用的道德准则。得救了。童贞一词不怎么算数，对这无声的、讨

厌的膜，我从未能真正相信它的价值，顶多有一个用处，作为最后的抵制、用来拒绝的虚假理由，不，谢谢，我是处女。多么幸福啊，我真的独自走在街上，毫无犯罪感地看其他男人，在教室里笑，真正的开怀大笑，而不是悄悄吐露的秘密、课桌底下传来传去的小纸条，所有那些在女生中发酵的关于男孩的情感。放眼望去，几周都没有例行约会，视野变得开阔。从我不知不觉陷入的一种依赖关系中得救了。我有了新的欲望，获得高中文凭，甩开修女们去公立高中读哲学，我期待那一年、那个班如同期待一个新大陆，不能让宗教把它毁了。而且我也很向往大城市，古老高楼间的无名石子路。鲁昂，孩提时代的奖赏之城、节庆之城，它终将变成我的日常之城。我会离开店铺和墙壁弥漫的咖啡味，离开那些召唤时间的声音，离开什么都嫌贵的生活与死气沉沉的一切。我足够强大吗。父亲缄默不语，母亲思考了一番，感叹道：“你要是想去就去吧。一个女孩子，总不能永远待在母亲

裙子底下！”

我拿到了高中文凭，开始收拾东西，准备住在鲁昂修道院女生宿舍。布丽吉特结婚了。两口子都在，坐在咖啡馆一张桌旁，肩并肩，他们结束蜜月旅行来看我。我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仿佛一个单身女孩和一对夫妻之间再无任何共同语言。再说，我们从前的聊天内容无非就是爱情和男孩，现在她都得到了，只需要满意地微笑就行，我俩之间还能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看着她坐立不安的样子，我们找到了一间公寓，为了置办家具，我打算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学了那么多柠檬汁和鲸油的食谱，会唱那么多马利亚诺的歌，拥有那么多梦想，最终走到这一步，找了这么个男的，在她身边笨手笨脚，我问他想喝点什么，他说“一杯雨伞液”⁴⁹。多不公平。她是女生中的第一个背叛者，我也说不清楚究竟背叛了什么，是孩提时代的憧憬，还是冒险精神。某种东西在她身上熄灭了，谨小慎微、自我检点的小女人，小心不要说未经许可的

傻话，他在听，新婚妻子的收敛表情。每次见到她这个样子，我都觉得她似乎已经死了，而我还活着。

但我还没有彻底得救。要想彻底得救，必须以空洞的眼神去看所有男孩，忘却一具身体靠近时的温暖，谢谢雷米曾带给我这份礼物。在他之后的三个月，我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同样的依赖感。沿着自由的直线向前，我欣赏这一点，但我从来做不到。多年的摇摆与妥协在前方等着我。我们看到很多女孩几个月都是独自一人，那么严肃，甚至有些傲慢，突然有一天和一个男的在一个阴暗的角落，失声尖叫，厉声指责，怎么都想不到她们会是这副模样，接着她们又变成独自一人。一群神经病。我曾是个神经病。

那所高中，进之前我以为是平等、博爱、自由之地。然而，那二十六个穿粉色罩衫的女孩对我而言实在太陌生了，比我从前在自家小城遇到的任何男孩都要陌生。她们中的一些看上去像发育迟缓的小女孩，

一点都不打扮，但把罩衫脱掉之后，她们便会穿上柔软的麂皮外套，是用真正的麂皮做的，裁剪精致。另一些女孩会化妆，穿短裙，充满时髦气息，但总是带几分低调。教会学校里的那些无脑、疯疯癫癫的女生，这里几乎没有。在这个哲学班，是拥有健康的身心、率直的眼神，穿海蓝色西装外套的一类女孩占上风。二十六个“少女时代的布丽吉特”⁵⁰，来自鲁昂的优美街区，比约雷尔、圣埃尼昂山这些地方，但我不是立刻就认出来的。她们在一切事情上都表现得游刃有余，让我相形见绌，对老师吹毛求疵，取笑一个来自迪耶普农村、说诺曼底土话、靠奖学金上学的女生，谈论性、弗洛伊德时一本正经，从不发笑或带有淫秽色彩，对男孩以及上床的欲望，似乎从未体验。跟她们相比，我觉得自己不干净、轻佻。还被她们的自信震慑住，她们似乎从来不用功读书，你知道吗我得了十五分⁵¹，我在夜里十点才打开课本看了会儿，天才，无需努力就那么厉害，我简直不敢相信，

在我家和我家所属的阶层，懒惰是不受待见的。所有那些志向，精神病医生、巴黎政治学院、文科预科一年级，我闻所未闻。在锋芒毕露、对成功自信满满的她们面前，我把我的疑惑、以最低限度完成工作的习惯视为真的低人一等的迹象。在圣女贞德高中的毕业班，我们属于同一性别但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那些女孩是我的姐妹，如此荒唐的想法我从来都不会有。她们比男孩们更能使我的未来暗淡。母亲对我的所有鼓励，你以后想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都土崩瓦解了，来自比约雷尔的小姐们让我志气全无。每周六回家，我发现店里的人影似乎少了很多，超市偷走了我们的顾客，我有权利怀有雄心壮志吗，我觉得我需要为货架上积尘的食品罐头负责。去做中学老师、图书管理员，多么漫长，多么冒险。做小学老师，我很快就能挣到钱。大学，班里女生清脆地说出这个词时就好像她们在大学的位置已经预留好了，而我没有。伊波喀涅⁵²，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安尼克以怜悯的眼

神盯着我，如果我连这都不知道的话……我清楚地知道有些女孩比其他女孩更自由。没有朋友。

我沿着伊瑟大道回到修道院女生宿舍，每月一百一十三法郎含伙食费，只有一件麂皮外套三分之一的价格。高中生、技校生、理发学徒分桌吃饭，彼此之间既无蔑视也无敌意，彻头彻尾的冷漠。女孩们显然不太有姐妹之情，首先是社会阶层的区分。在我的小隔间里，我听到右边的女生在咀嚼饼干，左边那位把抽屉拉得砰砰直响，口哨吹着《桂河桥》。夜晚，在厕所里，我经常踩着瓷砖爬到气窗口。鲁昂的轰鸣，如此响亮，有时传来港口的汽笛声，万家灯火。对孤独感到焦虑，我将来会面临的孤独。就在我们楼下的街道上，家家户户都在吃晚饭，看着像一幅幅油画。一个女人放下了百叶窗，我猜屋里有绿植、扶手椅和温暖。而我要去读《纯粹理性批判》。晚上十点钟，一股沮丧之情如蟑螂一般出没，对一个十八岁男孩它会悄悄说些什么，对我这样一个女孩，它在康德

的句子之间，老调重弹，低声说最好放弃学业，找一份小学教师的安逸工作，然后迟早有一天，成家，真正的家，不是我现在住的地方。在那样的时刻，绝对命令⁵³、存在主义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所有书都变得无足轻重。不管怎么说哲学老师她也结婚了，因此这件事在某一天对她来说是“合理”的。第二天，我怀有负罪感，何必遨游在哲学的精妙空间，写着灵魂永恒的论文却沉浸在《时尚回声》上的理想相貌中不能自拔，说到底想嫁出去，不比布丽吉特好多少。到了白天，当我头脑清醒地站在伊瑟大道时，对于夜晚在厕所气窗中瞥见的命运却并不是很渴望了。我吃惊地看着路上几乎跟我同龄的女孩推着婴儿车，对小宝宝我感到彻底的恶心，这些尚未发育的黏人的小东西。五月的一个下午，我和母亲在商品交易会的帐篷下闲逛，一个个摊位逛过去。她什么都不买，我觉得很无聊。走了几分钟我们都沉默不语。我在这儿干什么，面对排成几公里的餐厅、房间、吸尘器、打蛋

器、搅拌机，到处都有推销员在擦胡萝卜丝，在各式神奇的平底锅上煎鸡蛋。这一切跟我毫无关系。母亲突然转身朝向我，她的粉底开裂了，累得脸色煞白，但眼睛炯炯有神，她对我微笑着说：“别担心，这些你以后都会有的！”一开始我没明白。“这些”，粉色的浴室、电视机、搅拌器。“这些”，从不会单独出现，必然意味着一个丈夫，以及随之而来的孩子。看来她也为我考虑到了，只不过要等我工作以后。我的悲伤。我们继续在尘土和产品宣传册中逛了一会儿，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一出戏的后台，巨大的空间里充斥着各式道具，虽然过些时候才登台表演，我已感到厌恶。内心充满矛盾。

住女生宿舍的高中生们，有时晚上三四个人挤在一个隔间，一起吃糖果、闲聊，聊老师、穿衣打扮、假期、调情。也有激动疯狂的时刻，翻越隔板耍杂技，为了一块巧克力争来抢去。身子紧挨着大笑。薇

薇安和我一起摔倒在她床上，她笑个不停，把眼睛都挤小了，脸蛋涨得通红，像从前在洗手间里布丽吉特的样子，但那时我不仅不觉得尴尬，还很想触摸。这会儿我尽可能自然地下床，没有后续。对一具跟我相似的身体不再有好奇心，垃圾桶里的卫生巾让我恶心。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失去了这份好奇。也许仅仅因为害怕自己成为异类。波德莱尔，他笔下那些被诅咒的女人，让十五岁的我惊恐不已。

萦绕不去的男孩们。《第二性》给我迎头一击。立刻下定决心，不婚，也不跟将你视为客体的人谈情说爱。多么光辉的计划，是去上学的路上想出来的。但这个我称之为兄弟的男人，他在哪儿，我愿意跟他做爱，彼此之间没有来自肉体的欺骗，没有“你的头发好美，你的胸像这像那”，有的只是欢笑与交流。不再害怕被蔑视，不再有“那女的我上过”，信任，平等。一只珍禽，毫无疑问，属于非常规系列。那一年，我坚守立场，等待，然后乱七八糟的事情又

开始了，之后发生的，不必细说，总是同样的故事。我以为找到他了，我的兄弟，持续一晚、八天或一个月。实际上，我总是掉进最一目了然的陷阱，相像的话术：你有某种安尼特·索伦伯格的气质，你有点像米琳娜·德蒙若，不胜枚举；名字的话术：你是不是叫莫妮卡，你长着一张让人忍不住喊你莫妮卡的脸；诗歌的话术：“当天空低垂……”⁵⁴，波德莱尔、魏尔伦或普莱维尔⁵⁵，围猎女孩的三大话术，我都了解。我努力保持友善，不遗余力去理解他，分享他的爱好。为了能真正跟他、跟他们交流，我狼吞虎咽地吸收新知识，爵士乐、现代绘画，甚至还去了解鸟类学家的仿鸟叫声，去了解沙特尔朝圣、天主教徒的祈祷和磨破的脚皮。取悦别人。不管怎么说，去看《落日余晖》⁵⁶而不是《去年在马里昂巴德》⁵⁷，这有什么关系呢？他有权喜欢西部片，我自己去看雷乃。因为双向奔赴，不存在的。我迎合他们的喜好来塑造我的身体：我喜欢你穿黑衣服的样子，给我盘一个发髻吧，你穿紫色

连衣裙会很好看。顺从、笨拙，但还是太喜欢争论了，太咄咄逼人，我想让他们知道我不是那么好骗的，我可以成为你想要的样子，盘发髻，等等，但这些让我厌恶，你的那些西部片真的很无聊。再没有比这更神经质的行为了。和假兄弟的关系总是苦涩收尾。

高中最后一年，我没有把很多精力放在男孩子的世界里。相较于取悦男生，找到一个“男朋友”——穿海蓝色西装外套来自圣埃尼昂山的姑娘们的用词，我有更重要的事要考虑，它引起我更严重的焦虑。校园里的热闹、打铃声或专横或亲切的老师，这一切行将结束，学校的管束虽然沉重，却使人安心，到这时我还不太清楚以后想从事什么职业。环顾四周，有毫不在意的，等我高考完再说，可能读法学，只需要背诵，或文理学院预科⁵⁸，语言类，总之上一个大学。也有的心意已定，又是那个“伊波喀涅”，这个希腊词总是会吓到我，医学，当然了那个女孩她父亲是外科医生。政治学院，啊！出来能做什么？做什么

都可以，你不知道吗？她们对职业满不在乎，感兴趣的只是学业。而我查遍了资料中心，怎样才能成为大学和中学老师、小学教师、社会工作者，需要读几年，出路怎么样。在各种可能性面前摇摆不定，快要急哭了。六月底，伊尔达，无忧无虑的伊尔达，坐在“大都会”咖啡馆露天座位。她像一个矮胖的玩具娃娃，眼神天真，属于假亲热的那类女生，喜欢贴着别人，陪别人去买唱片或围巾。几周以来，我跟她建立起一种模糊的朋友关系。她对所有人露出调皮的微笑，用蓝釉色的眼睛打量着别人，她为自己在高考中的成绩和即将在蔚蓝海岸⁵⁹度过的假期感到高兴，剪得像珍·茜宝⁶⁰那样的短发，让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个小孩子。“你知道吗，”她开心地说，“别人肯定想不到我高考两部分都通过了！”她同意我的看法，选择职业很重要，但这跟她伸着脖子、挺起胸脯，搜寻他人目光的样子并不吻合。我当时感觉学业和事业上的成功，于她而言只是额外收获。集万千宠

爱于一身，稚气而可爱的伊尔达本身已足够幸福，她很可能为了什么，比如嫁给心爱的人，而轻易放弃那种成功。她隐约瞥见的大学，是为了帮她节约时间。当时是什么最大程度地将我和伊尔达，和她快乐的慵懒区分开来，是我们有不一样的母亲还是我们的社会出身不同。兼而有之。我母亲，伊尔达说，她熨起衣服来，那叫一个妥帖。一个在自己的女儿、自己的玩偶面前心醉神迷的家庭主妇。一座位于鲁昂郊区的别墅，舒适的生活。我那干劲十足的母亲，她说的话，你不能是个没用的人，以及帮我度过拮据月末的杂货铺，还不算姨婆姑娘们，她们眼镜被铜绿腐蚀——醋厂隐秘的魔力之一。一切都将我们对立起来。

一整个夏天痛苦的纠结。不能学医，这个志愿，学习周期太长，成本太高，而且到时候哪有钱开诊所。法学出路在哪儿，没有人脉。到了七月中旬，我开始遐想去做社会工作者，做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是时候走向他人了，去他妈的个人主义，哲学班一年

的所有残存记忆将我淹没。我仿佛看见自己从一间简陋的预制小屋里跑出来，和十二个孩子蹦蹦跳跳，是啊是啊，我遇见了割麦人的女儿。在宿舍的小隔间里，听着四周行李箱砰砰作响，我高涨的自我牺牲精神达到了顶点。接着热情消退，我志趣不在于此，令人气馁的发现。在商场买一条跟芭铎同款的方格连衣裙时，我看到穿粉色罩衫的售货员们，她们笑着，心不在焉地把裙子递给我，无忧无虑。她们可能没有选择。像伊尔达一样，但她们位于底层。拥有一个清晰的命运，无论是怎样的，我疲惫地沿着圣女贞德路往前走，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陷入的情绪叫作抑郁。

十月，伊尔达读了文学院，我也是。统计学上一个真正属于女孩的选择，主要生源来自小资产阶级。自然我又见到了她们，有教养的圣埃尼昂山的女学生们，在阶梯教室前叽叽喳喳，她们还是那么自信，男大学生们的放荡言行会让她们感到震惊，在这方面成为我对付她们的秘密同盟。但我不是纯粹因为冒失

才读了文学院，不是为了以一种有学问又不太累的方式，悠闲地打发时间。上大学，对伊尔达而言，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对我却是一场冒险。在还没开门的阶梯教室前，装有文件夹的书包从容摇晃着，掩盖了无产者的轻微颤抖，害怕野心大过头脑。不管了，既然已经开始，已经打算从事我唯一熟知的职业——教师，那就应该一路走到底。教师（prof），这个词就像一块小石头掉进水洼里发出啪嗒声（plouf），骄傲的女性，班里的女王，无论被人喜爱还是憎恨，从来都不是无足轻重的，我还没有去想将来会变成怎样的老师。坐在阶梯教室中间的长椅上，面对新生活，我胸口怦怦直跳。这场冒险，我的机遇，我的自由。不可辜负。

男生们最终来到了身边，跟我们读同一篇关于《费德尔》的评论，他们也在做笔记。不比我们更出色、更优秀。其中一些更叛逆，喜欢在课前哗众取

宠，但不敢当着助理教授的面胡来，即使他们声称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在餐厅、咖啡馆、阶梯教室前，他们随时能兴风作浪，但上课时很老实，这让我感到吃惊。从前我见过在我家咖啡馆高谈阔论的男孩，开着小摩托神气活现的男孩，实际都是一些胆小鬼，没想到在大学里也能看到，天真。哲学课上，一位金发老师神情庄严地扫视了一遍全体学生，接着开始讲人称与时态，坐在我旁边的几个男生一直很安静，奋笔疾书，认真得无以复加，一次提问都没有。历史课也同样安静，在走廊喧哗的那群男生中，没有谁发出声音来打断弗洛伊努教授的胜利独白，被教授当作白痴时，他们跟女生一样泰然自若。除非他们害怕引人注意，考试要紧。就顺从和被动而言，大学里的性别平等贯彻得很彻底。但我发现存在适合女性的学业和适合男性的学业，“文学、语言，女生扎堆的地方”，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见这样的说法。“对一个男人来说最好还是读科学”，跟我如此断言的是个女孩。我不明

白为什么。去承认一些我无法感受到的性别差异，总是让我非常难受。我听到一些令我震惊的句子，“文学创作就像射精”，文学教授，一堂关于诗人佩吉的课，“所有的评论家都是阳痿”，哲学课助教，写作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同阴茎活动类比，但我没有特别在意，我进行了诠释，更准确地说，这些话传到我耳边时已被诠释过，文学创作是不分男女的性高潮，当我读到艾吕雅的诗句“我走向生活，我有人的外表”，我想到的是我自己。男人把我们叫作妞儿或肥婆，带有侮辱性，但我自己说话也不是太干净，我经常把男孩子分成豆芽、傻狗和小鸡鸡，我和伊尔达都没把这些词当作下流话。不得不承认小鸡鸡跟肥婆很登对，一个无聊的家伙，没有调情的价值。阶梯教室里的同学、聚餐时的伙伴、火车上两眼无神的乘客，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让我依附超过三周。他们是我自由风景的组成部分。

四年。之后是另一种生活。

是超市小推车，“今晚吃什么”，为了买一个沙发、一套高保真音响、一套公寓而精打细算。是换尿布，沙滩上的小桶和小铲子，再也见不到各色男人，为了避免受骗而翻阅的各种消费者杂志，他最爱吃的羊后腿，清点彼此失去的自由。而在那四年，晚餐可以只吃一盒酸奶，半小时就能收拾好行李去过临时安排的周末，聊天聊一整夜。周日从早到晚窝在被窝里看书。百无聊赖地坐在咖啡馆里，看陌生人进进出出，感觉自己漂浮在这些无名的生命中。不开心时毫不迟疑地甩脸色。在那一时期，我们觉得已成家立业的成年人之间的谈话像是来自一个肤浅的、近乎滑稽的宇宙，圣灵降临节那个周末的交通大拥堵和事故死亡人员、牛排的价格和天气预报，这些我们通通不关心。那时还没有人黏在你身上。所有女孩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或长或短，或热烈或平淡，却不允许怀念。多么可耻！胆敢惋惜那段自私自利的时光，要知

道那时只为自己负责，怀疑一切，孩子气。女孩的青春岁月无需埋葬，没有歌曲或民俗以它为主题，它压根就不存在。一段无用的时期。

对我而言，那是我对一切如饥似渴的四年，渴望相遇、交谈、书籍和知识。上大学，即使是靠奖学金上的学，也意味着梦寐以求的自由与自私。一间远离家的房间，松散的课表，三餐规律或不规律，去大学食堂吃饭或更愿意躺在床上边读卡夫卡边喝茶。愉快地跟母亲和解，我现在不在乎她大嗓门、没有女人味，我已经打开了眼界，像伊尔达母亲那样的温柔母亲，动不动就哭，多么沉重的负担，要时刻注意不能让她们烦心、难过。我母亲热切而天真地询问我的新生活，默契地往我手里塞了二十法郎，要是你需要什么，书、咖啡……当然没有其他需要。买、拥有，这些词汇在当时不属于我。布格路，我抬头眺望中产阶级缀有古老窗帘的高屋大宅。秩序与静止，但这只是个纯粹的背景，跟我无关，永远跟我无关。我去的都

是变动不居、生机盎然的地方，教室、车站咖啡馆、图书馆、电影院，然后回到房间绝对的寂静中。美妙的交替。早晨，我看见女人们抖动着抹布，在窗户上发出无尽的信号，收回垃圾桶。我没有产生疑问，那些姿势属于一种跟我的生活无关的仪式。当我和男同学边笑边讨论不慌不忙地去上课时，那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漠不关心，在人行道上机械地给她让路，怜悯。她，以及其他所有围着丈夫和孩子转的女人属于一个死气沉沉的世界。有时候中午，我会在火车站后面的杂货店买半升牛奶、两罐酸奶和一根法棍。不自在，害羞。出自我母亲柜台的直接经验，我知道像我这样的顾客，人家可以忽略不计，挣不了几个钱。我把买的东西塞在大衣和文件夹之间，然后赶紧把位置让给家庭主妇和她们的大宗采购，出了门愉快地呼吸外面的空气。我准备发誓，普遍的女性生存状况将永远不会落在我身上。

往日时光里探索与自由的画面，我随意采撷，像

是一个外景拍摄的视频，有街道、广场和海景，有时也在室内拍摄。没有厨房和餐厅。我躺在床上。书，《海浪》。同样的场景，书变了，《罪与罚》。六月，考完试，我沿着圣女贞德路一直往前走，夏日咖啡馆的迷人气息，在维德雷尔广场，我和伊尔达聊天，那些狂热的勾引者属于春天，也属于我们不再有功课要做的幸福。还有，我从一辆驶向鲁昂郊外的大巴车上下来，那里都是独门独院，我挨家挨户敲门，做一项关于住宅的调查，女人们解下围裙，推开孩子，把我请进整洁的客厅。这几间房够住吗？您使用封闭式阳台吗？注意力高度集中，我把所有答案都记下来了，至于问题本身，我并不清楚其重要性所在，实用，不实用，她们犹豫不决，一边摩挲桌面的清漆一边思量着。我心里涌起一丝悲哀，她们怎么能活成这样。然后，耶，又有五十法郎到手了。问心无愧。夫人，您对封闭式阳台和厨房设施的回答帮我挣到了钱，拿着这笔钱我可以跟朋友游览西班牙，或一个人逛罗

马。在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一些德国人亲吻唐·胡安⁶¹的坟墓。在毗邻修道院的大街小巷里，我都能遇见他，他有着蓝色的眼眸。之后那一晚，在马德里一家没有星级的旅馆，在旅馆走廊尽头的厕所里，像从前在女生宿舍那样，我踩着瓷砖往上爬。有一小块天空，在院子黑黢黢的围墙和城市的喧嚣之间，但那种喧嚣再也不会引发我的焦虑了，永别了胡安，也许明年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再会。在罗马，每个早晨我都越过房子的最后三个台阶一口气跳下来，看门太太坐在拱门下呼吸新鲜空气，旁边坐着她的小孙女，buon giorno（早上好），然后我奔向特雷维喷泉、纳沃内广场。她，她来自另一头，具体来自哪儿我说不上来，面对那些跳下台阶冲向马路的女孩，她只能坐在那儿回应“早上好”。

诗意化，诗意化吧，将你从前的自由剪辑成伟大的影片。真的，我当时那么热爱生活，憧憬未来时心中没有一丝绝望。我不感到无聊。晚上在我房间

里，跟我的女同学们在一起时，我曾表示我对婚姻不抱幻想，蠢事一桩，自取灭亡，只要看看餐馆里已婚夫妇的脸就知道了，他们面对面狼吞虎咽，彼此没有交流，眼神呆滞。哲学专业的伊莱娜总结说，婚姻总归是一种必要之恶，结婚才能有小孩，我觉得她的想法可笑，给出的理由很荒唐。我自己从来没想过有小孩，无论结婚与否。几乎所有女同学都自诩缝纫技术一流，熨衣服不留皱痕，很高兴自己不只是头脑聪明，每当听到她们这样说我就很恼火，我做成一块巧克力慕斯的骄傲之情已经随布丽吉特一同消失了，她们在这方面的骄傲真使我烦躁。是的，我跟一个同龄男孩、一个男大学生以同样的方式生活，靠国家发的钱、父母给的微薄的生活费、帮人照看孩子和做调查这样的兼职打工过日子，看电影、睡觉、跳舞，为了通过考试努力学习，将婚姻视为一个滑稽的念头。一样，但不完全一样。我知道我不是那种强大到可以为自己的小小命运灵活谈判的女生。和男人在一起时总

是有几分神经质。童子军式的伙伴关系，眼神清澈坦诚的同学友谊，这些还是留给其他人吧，对于我，有时几乎不需要什么交往，仅仅一起讨论过几次，图书馆台灯下一个眼神放电，就能让作为风景的男人变成一个美妙的欲望对象。深入思考，必须要去讨好，总是过度，得“让那些家伙行动起来”，像伊尔达一样，挑逗别人却从不意乱情迷，但这要付出多少手段啊，而且要坚持不懈，培养女性的神秘感我觉得太累了，大概再也没有时间去考虑其他事了。我肯定太“容易到手”，但我半途而废。医学院的那个纪尧姆，他房间墙上贴满了莫迪利亚尼⁶²的女人画，在这间房里他从容、自然地跟我解释，女孩分成两种，一种是放松的，一种是放不开的，前者跟人睡，后者不跟人睡，从放不开的女孩变成放松的女孩只能靠我自己，不要做一个“禁欲者”，童贞我们都知道不健康，该死的，去好好享受吧。保不保留妨碍塞卫生棉条的那张膜，我根本不在乎，但这种说话语气……口耳相传一个秘

密，有种东西比安全期还要可靠，子宫帽。很好，但是听听那个法学生，他在咖啡馆里讥笑着说，我女人晚上鼓起她的橡胶圈，早晨拿去喷泉下面冲洗。性自由真刺激。从环岛开小摩托的男孩到男大学生，没有太多区别。不得不经常换人，懊悔地想，这对一个女孩来说不“好”，最好找到“正确的”，但要怎么找，那个人在哪儿……我，还有其他女孩，我们都无法解脱。大学城里的女生状况，比《我们俩》情感专栏来信中的还要糟糕。熟练掌握哲学概念的伊莱娜，游弋在失恋与失败的约会之间。伊莎贝尔疯狂爱上了一个连正眼都不瞧她一眼的男人，她在大马路上哭，甚至都不能去上预科的课。所有女生都被胡编乱造的小说欺骗了，在布雷尔、费里、阿兹纳武尔，甚至让-克洛德·帕斯卡尔的歌声里寻找安慰，心思全部放在感情上。无论出身如何，同样的浪漫主义，同样的幼稚轻信。他说我“真实”，多么骄傲。此外，女生们相互妒忌、怀疑，那女的我们不邀请了，她太好。当然

是指身材太好，还能是什么。刻苦学习，头脑聪慧，可千万不要，这样反而碍事，在校内校外能说会道，这是有吸引力的。天真可爱也很管用，来看看我买的睫毛夹，甚至还有扮小女孩样的，上课嚼口香糖，懒洋洋地晃动手提包，故意惹恼男孩子，收集马苏比拉米⁶³和佩奈的玩具娃娃⁶⁴。学习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人称与时态，很好，成为教师，可以，但要一直有女人味，那你说我的发型好看吗，没喷定型胶我有点不自在，你的衬衫借我一下，我穿去参加可丽饼派对。我们就这样随波逐流，任由自己扮演一个理智上觉得尴尬的角色。不这样就只能陷入孤独，还是这个老问题。现实的丑陋，我们绝口不谈，受到侮辱自己咽下去，仿佛犯错的是我们，仿佛我们就该受到这样的侮辱，我们要对一切负责，对不成功的初夜，对那些暧昧不清的夜晚负责，这叫作“睡”吗，用他们的脏话而言。顶多羞愧地委婉提及：“你都不知道他对我提了什么建议。”一些可怕的小道消息有时会吹到我

们耳边：红棕色头发的米歇尔，之前一直跟马辛在一起的那个米歇尔，吞安眠药自杀了；让内特流了一桶血，可能是双胞胎兄弟干的，大家不厌其烦地小声谈论着细节，说当时用了肥皂水。宿命。男人，自由、混蛋、无所谓，干那事多让他快活，我们所有女生都知情同意。

同时，荒谬地期待某处有个男人，跟一般的烂泥不一样，可以想见的陷阱，噢，疯狂的爱情，超现实主义的既定命运，我一路走到底，会有那么一个男人的，他甚至能让我避开所有的陷阱与侮辱。在博尔盖塞别墅，几个疯子在雕像后面对我做出滑稽的姿势；在威尼斯广场，那个勾引女游客的男人辱骂我，你为什么不要，你来月经了吗；还有在普拉多花园的那些男人，像狗一样尾随着我和我的女伴。时光流逝，预科，本科第一年、第二年，不久的将来当老师。一些女生公开和男生手牵着手散步，从课堂消失，有时会返回，脸上带着我们所熟悉的疏远和不可一世的表

情，她们都结婚了。我的蔑视之情少了一些。在我家，别人会问，还没有未婚夫？我父母反驳说，我的学业还没完成，有时他们会补充说我现在这样更幸福。但这是一句从来没有解释透彻的套话，更像是以防卫的姿态，为一个奇怪的行为进行辩护。总有人冲我来一句：“你不会一直想做个老姑娘吧！”阴险的施压。我不是一个独自生活的女孩，我是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女孩，一个还未定型的生命。你在做什么有意思的事呢，你假期去哪儿，你裙子真好看，跟一个单身女孩不知道能说什么，而如果她已婚，丈夫、孩子、公寓、洗衣机，这些可以无穷无尽地填充谈话内容。我在多大程度上不在乎这些呢。我的生命在我自己看来也莫名其妙地缺少重量。晚上十点的焦虑，从大学城顶楼俯瞰停车场的黑洞。或者在“大都会”，和一些差劲的男生围坐在桌旁，霓虹灯下的他们，才二十二岁仿佛已经衰老。孤独很容易带来悲惨的感觉。那些不眠之夜和黎明时分塞纳河畔的洋葱汤，兼

职带孩子和住青年旅馆，远离秩序的生活真的很美好。但也会觉得这种无拘无束像是空虚。我在餐厅门口发传单，去参加反秘密军队组织⁶⁵的会议，但有点像在跑龙套。我“飘浮”着，这个词女生之间常用，用来指自己有时晕头晕脑的状态，仿佛生命不坚固、不真实。圣女贞德路上车水马龙，我在人流中穿梭前进，陷落在一片并不真正包含我的嘈杂声中。不再飘浮，跟世界产生联结，我有时会想，身边要是有个男人，我所有的举动，甚至最不起眼的举动，比如上闹钟、准备早餐，都会具有分量和趣味。

我前一晚才认识他。一些女生，甚至一个男性朋友后来都跟我说，我的策略不对，应该让他再等一等。不行。去爱那些永远见不到第二次的事物，无论这句话是否适用于女性，从我少女时期就跟着我了。第二天我要去意大利，没时间纠结。在我看来，做爱是跟他共度一个完美夜晚的绝对条件。真正发生了关

系。一个乱伦的兄弟。夺去处子之身 (défloration), 使失去童贞 (dépuçelage), 这些带有否定前缀 (dé-) 的词, 令人难以忍受。笑容与默契, 自由自在的交谈, 终于等到这一天。在阿尔卑斯山的那间旅馆, 木制天花板上的灯亮了一整夜。早晨下雨了。意大利古迹之间绝望的几周。当那夜我穿的套头衫上的汗味和烟草味消失时, 我哭了。

后来, 一列火车凌晨五点停在了博洛尼亚, 那是个悲怆的黎明, 跟我十二岁那年的一样。我在世间感觉良好。一众厂房浮现于蓝色中, 喧嚣。我孤身一人, 逍遥自在, 我要跟他重逢, 在我看来这并不矛盾。再后来, 我们来到中央火车站旁的一间布满雾玻璃的房间。在高速路上搭顺风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们从来没有连续两次在同样的地点相聚。我们约在火车站小吃店、公园门口。旅馆房间, 二十法郎一晚, 已经太贵。露营式的爱情, 没有比这更让我心动的了, 即使包含了忧伤。又

一个终将在未来成为回忆的房间，而这个未来我并不确定能否实现。一天又一天，我不断告诉自己，我们可能会说再见，自由的一切表象都得到了保全。我正在准备一篇关于超现实主义的论文。爱情，自由。我兴奋地感到我的生活也是超现实主义的。我们在相距六百公里的两座城市结束各自的学业。除了这些仿佛总是艳遇般的相聚，他的生活没有改变，我的也没有。巴黎—波尔多的夜间火车，没有卧铺的车厢，背疼，对我而言这是节日序曲。嘈杂的十月清晨，“纽约”咖啡馆老板把露天座椅一一摆好，大咖啡壶的气味，对着一大杯奶油咖啡和黄油面包我们终于醒过来了。散步。看电影。圣马修所说的“激情”，两个人躺在床上。现在总是同一个房间。是他的房间，不是我们的，我是作为旅客过来的。这是假日时光，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在一起时不学习，他只需要去政治学院上几节必修课。他上课时，我四处闲逛，一个人都不认识。这是我的快乐之城，只有快乐，我的考

试是在鲁昂进行的。爱之城波尔多，奖赏之城波尔多，我流连在枫多岱日路、三-科尼尔路的陌生风景里，等坐上返程的列车，围绕他的脸庞我已经有了一幅地图。嫉妒、生气、塞了一半的行李箱，这些常有，但我们不会糟蹋一个持续几天的节日，我想要带走美好的回忆。

怎么说呢，一切可谓完美。往昔的画面多么美好，像是给开放女性读的杂志、时尚广告，今天的女孩们厌恶束缚，她们喝可口可乐，用X牌卫生棉条，充分享受生活。不准确。要看到软弱和恐惧的存在。

他在圣·让火车站旁的一家咖啡馆里牵着我的手。雷·查尔斯⁶⁶浅吟低唱《给我自由》。当然。这是唯一的道德准则。我看着路人，一些女孩从眼前经过。我们丝毫没有给对方设限，人群中会有一些狡黠的女孩不那么喜欢自由，她们会试图捕捉他。我讨厌火车站。

镜子里的我。令人满意。但在二十二岁的年纪，在这张真实的面庞后面，已经存在另一张脸的威胁，

那是一张想象中的、可怕的脸，皮肤干枯，线条僵硬。衰老等于丑陋，等于孤独。

还有那些总是自然而然抛给我，表面看来无足轻重的问题：和他关系还挺好的吧？你打算结婚吗？我父母对于不明朗的情形感到沮丧，“我们很想知道眼下这一切会把你引到哪儿去”。爱情必须把人引到某个地方。还有他们没有明说的痛苦。对他们而言，看着事情按照惯常的方式发展会让他们更愉快安宁，报纸上的结婚告示，带着自豪回答的问题，一个波尔多的年轻人，马上要当老师，教堂，市政厅，“组建”家庭，孙子孙女。我剥夺了他们的传统期望。当我母亲知道实情时陷入了恐慌，你跟他睡了，要继续这样下去，你的人生就毁了。在她看来，我正在被男人欺骗，成堆的小说从她记忆里涌现，将女孩引诱到手却不肯娶她，抛弃她和孩子。我们俩每周都在进行一场烦人的斗争。我还不知道，就在我被逼迫放弃自由时，他的父母正在给他表演同样传统但相反的情节，

“你不用这么早就被家室拖累，不要让人牵制你！”男性的自由多么受到呵护。

维克多·雨果大街上淡蓝色、温柔的空气。十月的考试季刚结束，我们像往常一样，在蒙田咖啡馆喝果汁。他看着街道、汽车，不断地拉直、捋平他的金色胡须。突然，他说：“加缪曾经说过，爱一个人就是愿意和他一起变老。这话说得挺对的，你不觉得吗？”我屏住呼吸。“我们应该结婚，你觉得怎么样？”我突然感到身体瘫软，仿佛要融化在藤椅上，我无法承认自己很开心，掩饰说“我们需要考虑一下”，我还记得那个场景。未来，甚至衰老，都像那个金色的日子。加缪的小句子闪耀着遥远、精致的诗意。一起变老，就像一场恩典突然降临在我身上，脑子里没有任何明确的想法。

婚姻，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晚上，我们一起想象了一番。我们会完成各自的学业，我会在一所高中找

到教职，他去某家公司，我们先租房生活一段时间，同时努力攒钱。我们的想象到此为止。这个计划普普通通，不会彻底颠覆我们的生活，或者说几乎不会，每个人都会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的是音乐，我的是文学。我们能想到的唯一问题，忠诚与否，因为我们已经面对过了。还有，讨厌的持久性，总是面对同一张脸，总之就是与婚姻有关的陈词滥调。最后，另一个老掉牙的观点，来吧，必须试一把，这是一次“必要的冒险”，尽管我们觉得自己并不特别擅长。

很快，双方都有了疑虑。有一瞬间，觉得婚姻只是计划一下就足够了，一时兴起，就跟计划搭顺风车去丹麦旅行一样，但如果不实现这个计划，说真的根本无所谓。我们想要万分确信彼此是命中注定的另一半，确信没有出差错。在其他时候，相信我们的困扰来自不确定性本身，为了消除它，帕斯卡赌注⁶⁷，冲进婚姻，之后再看。我的超级怯懦，难以启齿，在爱情的最后阶段，我渴望我的肚子变成陷阱，代替我做

选择。像抽牌一样做爱，以知晓未来。

但是我将要面临的真正困境的迹象，全被我忽视了。我在鲁昂图书馆写关于超现实主义的毕业论文，出门，穿过维德雷尔广场，天气温和，水池里的天鹅又出现了，突然我意识到我可能正在度过最后几周单身时光，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中午不想吃饭就不吃，可以不受打扰地在房间里学习。我将永远失去孤独。一套租来的小公寓，两个人住，能轻易获得独处空间吗？还有他每天要吃两顿饭。各种各样的画面在脑海中闪现。一种归根结底并不好玩的生活。但我压抑住了，我感到羞愧，这些都是独生女才会有的想法，以自我为中心，只关心自己那些小事，说到底是没有教养的。有一天，他功课很多，有点累，我们在房间里吃饭就不去食堂了吧。傍晚六点的维克多·雨果大街，一些女人冲向道克斯超市，就在蒙田咖啡馆对面，她们毫不犹豫地拿这拿那，仿佛她们的脑子里已经计划好了今晚怎么吃，也许连明天的也计划好了，

为四人乃至更多人分别准备不同口味的菜肴。她们是怎么做到的？也许是因为人多，天热，尤其是女人们在货架间自动采购的情景，我从一排逛到另一排，不知道该拿什么。除了牛排、鸡蛋和速溶汤，我不会做其他快手菜。要在今晚为他准备他喜欢的黄瓜、薯条和巧克力慕斯，我需要花好几个小时。面对所有陈列在眼前的食品，我一点灵感都没有，几乎要哭了。我永远无法胜任。我不想要这种以购物和烹饪为节奏的生活。为什么他不跟我一起来超市。最后我买了洛林派、奶酪和梨。他正在听音乐。他像孩子一样开心地解开了所有东西的包装。梨子已经熟透，“你被坑了”。我恨他。我不会结婚。第二天，我们回到了学校食堂，于是我什么都忘了。所有的担忧和不祥的预感，都被我压制住。加以升华。好吧，当我们一起生活，我不会有这么多的自由和消遣，我会负责购物、做饭，搞一点卫生。怎么？你还哼哼唧唧不乐意，你不够勇敢，很多女孩都能“适应”一切，笑容满面，

不像你这么小题大做。相反，她们过的是真正的生活。我以为婚后我将摆脱这个总是围着自身打转、疑虑重重的自我，一个无用的自我。我等着达到平衡。男人，坚实的臂膀，反形而上的，能消除各种恼人的念头，让她结婚吧，这样她就会平静下来，甚至你的痘痘也会消失，我当然笑了，隐隐约约相信这一点。婚姻，“成就”，我向前进。有时，我觉得他挺自私的，对我的事情他并不怎么感兴趣，我读他的社会学书，而我的书，布勒东或阿拉贡⁶⁸，他却从来没翻过。于是女性的智慧帮助了我：“所有的男人都是自私的。”另外还有道德原则：“接受他者的他性”，只要愿意，怎么样都能说得通。

他表达犹豫的方式，应该是他突如其来的坏脾气，那些带有攻击性的发飙简直让我们濒临分手。一个小时。和好了。我们在蒙田咖啡馆要了一杯果汁，把事情敲定。他微笑着对我说：“我们能做到的，加油。”

最后几周各种琐事纷至沓来，卷走了所有的疑虑。登报、婚戒、婚检、婚纱、锅碗瓢盆、咖啡研磨器。挺有趣的，但我将没有时间在六月的毕业典礼上展示我的学位证书。然而，这次结婚只是走个程序，没有花费，没有庆祝活动，只有父母和证人，我们一致认为，装腔作势、花里胡哨的打扮、冷餐会、拖地长裙，这些应该留给傻瓜和自命不凡的家伙。我们俩结婚会速战速决，这是我们对社会和父母的让步，甚至请了牧师，也是为了父母才请的，“否则他们会非常难过”，还有一份在公证员面前公证的结婚契约。但要注意，我们并不受这场戏的愚弄，我们以此取乐，让整件事没那么烦人。出于这种心态，我们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把结婚视同儿戏，感觉真是太棒了。确实这一切并不令人难过：看着市政厅周六一个上午连续不断举办多场婚礼，十五分钟一场，听着那些像戏词一样的陈词滥调，你愿意嫁给他吗，然后赶紧去教堂，在那里又是乌泱泱扎堆结婚的人，我们的婚礼

被挤到一个小礼拜堂里举办，只有十个人，我们甚至可以被安排在圣器室。婚戒太紧，他给我戴在无名指上时戒指卡住了，神父的仪式主持工作被打断，有点不耐烦。手的游戏仍在持续，实在戴不上去，算了戴在小拇指上吧。在餐厅吃饭不那么有趣，一群互不相识的人在一起大吃一顿有什么意思呢。彼此太不一样了。我父亲吃龙虾时似乎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我母亲在讲话。对面则相反，他父亲那么自在，个性那么强势，自然而然的权威，单位高管，无可争议地主导着对话，而他母亲，戴着首饰，精致动人，没在胡思乱想，而是在倾听她的丈夫，他讲风趣话她便扑哧一笑。他事先告诉我，你会看到，我母亲很迷人。这是我经常听到的关于母亲的一句话，现在眼前就有这样一位，一个肯定不会惹任何人生气的女人，懂得拿捏分寸，跟丈夫悄悄说一句，罗伯特，也许你夸大其词了。在她面前，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粗俗的女人，甚至觉得我们不属于同一个性别。对这对夫妇我

只感到轻微不适，没想到其形象会渗入我们的婚姻生活中。

我们在塞纳河畔，餐厅露台上，花坛周围的影子逐渐变长。对面，布罗顿森林，一片黑暗。从前，我和妈妈有时来这里，来到科德贝克散步。晚上等车时，我见到河对岸的同一片森林，还有渡船码头，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就这样到今天，事成。无论是开玩笑还是认真，我已经结婚了。他在我身边抽烟。我有点晕。月经、做爱，这些都是必然会发生的，但结婚呢？刚经历的这一切，就像是一堆我既没有真正渴望也没有真正拒绝的事情，弥漫着一种浪漫的甜蜜。像这样的日子，我知道，它的意义只有在以后才会变得清晰。

我们开着一辆老旧的汽车南下波尔多。冒险重新开始了。当然，是他开车，一个细节，你真的想开车吗，他把方向盘让给我，就像是在满足一个固执

的小孩古怪任性的愿望。我放弃让自己显得聪明。一开始婚姻对我来说并不沉重。相反，轻松得难以置信。说，“我的丈夫”，听，“我的妻子”，滑稽，不适，我避免使用“丈夫”这个词，而他经常说“我的队友”⁶⁹，含有兄弟、伙伴的意味，更好。我的姓氏，那个我慢慢学会书写的姓氏，也许是我父母要求我正确拼写的第一个单词，它让我无论身处何地都是我自己，它在我受到惩罚时噼啪作响，在成绩单上、在我所爱之人的信件上熠熠生辉，突然间，它消失了。当我听到另一个更低沉、更短促的姓氏时，我犹豫了几秒钟才接受它。一个月内，我在两个姓氏之间游荡，但没有痛苦，只有一种陌生感。

我将住在哪种房子里呢，洞穴、小屋、宫殿、城堡，绳子嗖嗖作响忽然脚被绊住，宫殿！我们可没有钱。我们要住的是改造过的小屋，也就是不太贵的带家具的出租房。七月酷暑中的波尔多，汽车在石头路上颠簸着，我们所有的财产都在后座上，被子、锅碗

瓢盆、电唱机和打字机。我们疾驰在阴凉的街巷，然后穿过阳光暴晒下的广场，就这样在阴影和光线中飙车，为了给自己找到一个住处。婚姻游戏已经不再那么有趣。恐怖的租金，恶心的住所。混蛋们。但我们才二十岁出头，汗流浹背地穿越大街小巷，在那些黑黢黢的大楼中，面对破烂出租房脸色苍白的房东，我们感到胜利和结盟。最终，我们在郊区一座带花园的房子里结束了租房之旅，有点遗憾，我更喜欢住在市中心，从前的世界，大学、图书馆、咖啡馆，一下子远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寂静与花丛。安置新家真令人兴奋，黄麻布铺在那儿，电唱机放这里，第一张唱片，探索厨房，试用煤气。那座房子很好笑，它摆满了各种不协调的废旧家具，没有风格可言，等明年最后几场考试结束，我们就会搬离这里。婚后最初几个月，仿佛童年再现。我模仿着已婚妇女的言行举止。“两块牛排”，肉要嫩一点，我补充道，因为我似乎经常听到这句话，我尽量表现得自信，不让别人看出我

其实对肉类一无所知。我努力在商店里褪去少女时期的笨拙。还有迷人的二人晚餐。番茄裹在油里闪闪发光，土豆烤得金黄，散发出绵软的香气，围着小小的桌子，爱化为柔情，出租屋的这间厨房，荷兰风格的装修，平静而和谐。数量很少的餐具和厨具，两只盘子、两副刀叉、两只玻璃杯和一口锅，比白雪公主在小矮人家里用的还要少，它们会在洗涤槽上晾干，直到下一餐再用。灶台被煤气火焰烤成焦糖色，因为锅里的东西经常溢出来，还有家具底下的灰尘，没铺好的床，这些都只能算了。我们时不时向房东借吸尘器，结果是他自己不厌其烦地帮我们吸尘。我们一起去超市，一起挑选，手里没什么钱，一只羊后腿，简直疯狂，缺钱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共同经历的一切让我们产生同甘共苦的感觉。谁还在这里谈论奴役？我觉得从前的生活仍在继续，而且彼此变得更亲密了。《第二性》完全过时了！

结婚已有一个月，三个月，我们回到学校，我

教拉丁语。夜幕降临得更早，我们一起在大教室里工作。我们是多么认真而脆弱啊，一对现代知识分子年轻夫妇，此情此景令人动容。如果我放任自己，不去反思自己是如何逐渐身陷泥潭的，这幅景象就还能继续感动我。总是怯懦地表示同意。好的，我研读拉布吕耶尔或魏尔伦的作品时和他待在同一个房间里，彼此相距两米。结婚时别人送的压力锅，你看多么实用，正在灶头上哼着小曲。我们和睦，相似。计时器发出刺耳的响声，那是另一个结婚礼物。相似性消失了。其中一个人站起来，关了火，等待疯狂旋转的排气阀减速，打开高压锅，倒出汤，然后回到书本前，思忖刚才读到哪里了。这个人是我。性别差异，已起动。

由二人晚餐开始。大学食堂在夏季关闭。中午和晚上，我独自面对锅碗瓢盆。我不比他更懂得做饭，我只会炸肉排，做巧克力慕斯，这些都是节日里吃的，不是日常餐食。我们两个都没有在妈妈围裙旁

帮她一起做饭的经验。为什么两个人当中只有我需要去摸索，鸡要煮多久，黄瓜是否要去籽，只有我需要研究烹饪书，削胡萝卜皮，吃完饭还要洗碗，与此同时，他却在埋头学习宪法。凭什么。我眼前浮现出父亲在厨房里的身影。他笑了：“你能想象我戴着围裙的样子吗？像你父亲那样，我可做不到！”我受到了羞辱。我的父母，不正常，一对滑稽可笑的夫妻。确实，我没见过多少男人削土豆皮。我的榜样不对，他让我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的榜样开始在地平线升起，他父亲让妻子照料家中的一切，他如此健谈，有学问，想象他打扫卫生的样子，那简直太可笑了，荒唐至极，好了就这样吧。要学做家务的是你，小老妹。面对出租屋里那座橄榄黄的餐橱，我感到焦虑和沮丧，鸡蛋、面条、苦苣，所有的食物都在那里，需要处理、烹饪。我童年时代的装饰性食物已经结束了，码成梅花形的罐头、五颜六色的玻璃瓶，还有从前廉价中餐馆的惊喜美食。现在尽些些麻烦的食物。

我没有反抗、大喊大叫或冷冰冰地宣布今天轮到你了，我要研读拉布吕耶尔。只有一些含沙射影、尖刻的意见、含糊不清的怨恨的泡沫。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不想成为一个制造麻烦的人，这一切真的重要吗，为了削土豆皮这样的小事，就要把笑声、默契都毁了吗，这些琐事属于自由的问题范畴吗，我开始怀疑起来。更糟糕的是，我觉得自己比别的女人笨、懒，居然怀念过去坐享其成的时光，一个迷失的知识分子，连干净利索地打个鸡蛋都不会。必须做出改变。十月，在学校里，我试着去了解已婚的女同学们是如何做到的，一些人甚至已经有了孩子。多么含蓄，多么神秘，她们只说“不容易”，但带着一种骄傲的神情，好像忙得不可开交很光荣。已婚女性的充实感。再没有时间去质疑，去无谓地纠结细枝末节，现实就是这样，一个男人，而且胃口很大，不是两盒酸奶和一杯茶就能打发的，可不能再跟从前一样任性了。于是，日复一日，从烧焦的豌豆到过咸的馅饼，

我努力成为一个厨娘，没有感到任何快乐，但也从不抱怨什么。“你知道，我更喜欢在家而不是在学校食堂吃饭，家里的饭好吃多了！”他真诚地说，以为能使我心花怒放。而我却觉得自己正在沉沦。

英译法，土豆泥，历史哲学，快，快，超市要关门了，零碎的学习比较让人放松，但渐渐地学习本身成了消遣。我兴致索然地勉强完成了一篇关于超现实主义的论文，一年前我兴致盎然地定了这个选题。第一个学期我没有时间交任何作业，我肯定不会通过中学教师资格考试，太难了。以前的目标在一片奇怪的模糊中迷失了方向。意志力下降。我第一次对自己可预见的失败满不在乎，把成功的希望押在他身上，跟我相反，他比从前更加努力，决心在六月结束本科，拿到政治学学位，实现自己的计划。他在集中精力，而我却在分散精力，日趋麻木。柜子的某个角落躺着一些短篇小说，他读过了，不错，你应该继续写。是的，他鼓励我，希望我能通过中学教师资格考试，就

像他一样，自我“实现”。聊天时，我们总是会谈及平等。在阿尔卑斯山相遇时，我们一起讨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尔及利亚革命。他不会天真地以为洗他的袜子会让我感到幸福，他告诉我并反复强调他厌恶家庭主妇。在思想上，他支持我的自由，为购物、吸尘制定分工计划，我怎么能抱怨呢。当他像个有教养的孩子一样露出内疚的表情，手指放在嘴唇上笑着说：“亲爱的，我忘了去擦盘子了……”我又怎么能责怪他呢。所有的冲突都变小了，陷入共同生活初期的体贴氛围和一些童言稚语中，从“我的小母鸡”到“小可可”，这些孩子气的话具有奇特的感染力，温柔地、天真地抚慰着我们。

并没有彻底麻木。有一天，吵架，我发泄不满，不是条分缕析，而是喊叫、眼泪和零碎的指责，指责他不帮我，什么都是他说了算。突然间，我听到我的这位朋友，昨天还在跟我讨论政治和社会学，还带我去坐帆船，现在却冲我喊道：“你真的烦死我了，你

不是个男人呀，不是！男女之间是有点不同的！等你什么时候能站着尿尿了，再来跟我说这些！”我想笑，不可能，从他嘴里说出这样的话而且他没有笑。在郊区寂静的街道上，在一栋又一栋花园别墅前，我走了几个小时。超现实主义生活，这就是了。所有当下能帮我解脱的方案对我来说都好像难以攀越的高山。结婚才三个月就离开的女人，多么丢脸，肯定是她的错，要走也得过一段时间。再耐心等等。他那些话也许只是随口一说，不必当真。自愈机器正在启动。我回来了，没把行李箱装满，甚至没装满一半。

一些事实，同样也是一些标志性事件。有一天他带给我一本《她》或《玛丽-法兰西》。给我买这样的杂志，意味着他看我的眼光不同于往日，他相信我可能对“一百种沙拉创意”或“低成本的优雅室内设计”感兴趣。或者说我已经改变了，他觉得这能让我高兴。我现在不是在控诉他，而是想知道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开始养成一些习惯，让人感觉生

活已经安定下来，今天还很温馨，明天则变成例行公事。下午一点的新闻，每周三的《鸭鸣报》⁷⁰，星期六晚上看电影，星期天铺桌布。只在夜里做爱。收音机里，一个沙哑的声音唱着“海边的女孩们真美……”我正在择四季豆，透过厨房的窗户，我瞥见花园和别墅。此刻，在拉卡诺或比拉的沙滩上，女孩们光彩照人，肌肤晒成了古铜色，自由自在。当然，这只是艳丽的防晒产品广告带来的印象。但我觉得自己再也不会是一个海边的女孩，我会滑入另一个形象中，那就是家居产品广告中永远微笑着的年轻女性，永远在擦洗着什么，修补着什么。从一个形象到另一个形象，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被重塑。

家人悄悄出现，另一个家庭的家人，模范家庭。他们住得不远。不介入我们的生活，受过良好教育，简短的看望，轻量的餐食，一对迷人的夫妇。父亲先生，一直那么健谈，妙语连珠，不断有各种文字游

戏，妻子一脸宽容地看着他。请注意，这并非滑稽表演，在那些玩笑话背后，始终有他的威严，从他的眼神、嗓音、点菜的方式中流露出来，对于葡萄酒品鉴和桥牌，没人比他更精通。母亲夫人，永远一副快活的样子，手脚不停，从不坐下，她带我走开，让男人们聊天吧，我们去弄晚饭，不，不，儿子，我们去弄就行了，你去反而碍手碍脚。立刻穿上围裙，劲头十足地给蔬菜削皮，在冷餐肉上撒一些香芹，把一只番茄做成玫瑰形的装饰，顶呱呱，沙拉上撒一些鸡蛋碎，滴沥嗒啦。身姿灵巧，嘴里念念有词，百洁布你不知道真的很好用。当她不小心烫到自己，她说“星期三”⁷¹。有时，一些知心话：我读完了本科，读的是自然科学，我甚至在一个机构里授课，然后遇到了你公公，笑，孩子们来了，三个，全是男孩，你可以想象，又笑。就这样。她叹息着对我吐露心声，同时敏捷地用抹布抹了一下水槽，男人啊男人，他们并不总是那么好相处，但她同时微笑着，几乎引以为

豪，仿佛他们是孩子，需要包容他们的任性，“你知道我们无法改变他们！”她像母亲一样同情我，体谅我，学习会不会太累，你没有时间彻底打扫屋子这很正常。我讨厌这种暗戳戳关心我的方式。她一以贯之的亲切让我很不自在，我仿佛陷入泥沙一般，被迫做出同样的回应，糖和蜜，幼稚和虚伪混在一起。我怎敢说什么。有一天他对我说，像她这样性情温和的女人，真让人感到放松。关心他人。仿佛对一个女人来说世上真的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女性完美品质的清单，我不了解，我开始学习其中的条目。“咖啡！”父亲先生吼道，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来了，来了！”母亲夫人匆忙应答。噢，别担心亲爱的，这是他们之间的游戏，他大喊大叫，她忙前忙后，但他们相爱，我向你保证，你没必要愤慨。夜幕降临，我公公坐在“谛艾仕”轿车的驾驶座上，她腿脚灵活地上了车，戴着手套向我们挥手道别，再见。每次我都感到忧伤。没有人觉得她念念有词的样子和她做家务的劲

头滑稽可笑，她的儿子们、媳妇们，所有人都钦佩她全身心投入孩子的教育中，致力于带给丈夫幸福，没有人想过她本来可以活成另一副模样。

要，还是不要。避孕手段总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即使已成既定事实，也可能并不想要。那个戴着双光镜的小老太太同意以四百法郎的价格来做，她并不比我的爱丽丝姨奶奶更脏，像爱丽丝一样，她也穿着黑色长裙，脸色土黄。为什么要选择同意。在所有可能的意义中，我为我们俩选择了这一个：避免分手，将只不过是偶然的东西转化为命运。对他而言，最不济也能证明男性气概，每个人都会看到他在某些方面拥有男性特征，最好的情况是满足好奇心，父亲究竟是什么。而我，渴望了解一切，就像从前每当思及男女关系时心跳加速一样，我的渴望如此急切。同样我也模糊地认为，必须要经历女性该经历的一切才能做个“完整”的女人，才能获得幸福。或

许，这还是一种卑劣、难以启齿的报复形式……他听巴赫的音乐，我也听，他投入学习，我也学习，但花的时间没有他多，做饭洗碗把我的时间占用了，所以我打算给他一些责任、一些烦恼，再没有什么比一个小毛孩子更好的了。同意中包含着一切。从那一刻开始，我知道一个人可以同时想要某个事物及其对立面。我们才刚刚谈妥，我就开始怀疑了。我看到自己将要在尿布和奶瓶中度过几个月的封闭式生活，中学教师资格证肯定拜拜了，再也没有片刻时间留给自己，至于梦想，天大的笑话。无论对他还是对我，小老太太都会是负责任的解决方案。我耻于将这个信息告诉母亲，她会觉得我放任自流，会立刻想象出我包襁褓、哄婴儿的场景，对此她不会感到高兴。实际上，她几乎把我宣布怀孕的消息当成宣布一件对我来说很不光彩的事，而父亲对我们摊上这样一件麻烦事感到难过。另一面却传来截然不同的声音。这将是我的第三个孙子，我公公推算着。我无法理解他的骄

傲，甚至感到恶心，我的肚子属于整个家族。

早晨煮沸的牛奶的气味让我胃里翻江倒海，很多食物在嘴里都变味了。我寻找着能保持先前味道的水果、蛋糕。在世界和我之间隔着一摊油污，残留着甜美腐败的气息。我感到自己四分五裂，乏软无力。我读到一种说法：恶心是个坏兆头，说明在内心最深处，我可能不太想要这个孩子，对他存有顾虑。这个说法不能让我信服，我觉得身体有反抗是正常的，它不会连一声“哎哟”都没有就任由自己被占据。最初几个月更像是得了胃溃疡而不是一个生命正在形成。然后，孩子在腹中颤抖，《圣经》中的老伊丽莎白⁷²，两百万个宏大的词语⁷³，被吐字不清的助产士轻松转化：“怎”爸爸们在晚上感觉到胎儿“森”胳膊蹬腿儿“增”的很开心⁷⁴，你们等着看吧。而我感到惊讶，看到鼓起的肚子我想笑，我觉得他很尴尬，我想这对男人来说应该是可怕的画面。光荣的怀孕，灵魂和身体的圆满，对此我并不相信，即使怀孕的母狗也

会无缘无故地露出牙齿或者一脸凶相地昏睡。真正的母性，并不是通过感受晚上的胎动，也不是通过挺着大肚子走路而降临在我身上，这份自豪并不比男人对于勃起的自豪更有价值。在九个月里，有许多忧郁的理由。我们不能像之前计划的那样去非洲了。对孕检越来越心不在焉，一堆担忧，谁来照顾孩子，要花多少钱。我暗地里希望孕期尽可能久一些，最好永远不生出来。我想留住自己只作为女性的最后时光，还不是母亲，还不需要面对每日六次哺乳、六次换尿布和婴儿啼哭。产后的日子让我害怕，我尽量不去想。我所有的想象都停留在分娩上，在助产士兴奋的描述中，那是一种乐趣，证明便是在唱片上我们听到一个产妇节奏平稳的呼吸，没有哪个单词的音量高过另一个单词，突然，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简直令人感动得要流泪，童年时期关于分娩的恐怖画面彻底被埋葬，产钳和鲜血，《乱世佳人》中的酷刑场景，绳子、热水和尖叫。为了缓解焦虑，我囤积各种婴儿用的小

物件儿。我们两个人第一次走进叫孕什么的店里，那里充斥着色彩缤纷的迷你衣物、精美的装饰品、绣花围嘴、连体裤和闪亮的摇铃，一切都是为了摆弄这个活生生的玩具娃娃。从装糊状食品的盘子到婴儿罩衫，到处都有米奇和唐老鸭。这个小人国的世界如此不真实。他和我都有一种可怕的退化的感觉。尿布、新生儿衬衣、六月龄至一岁衬衣、婴儿车。之后会有婴儿餐椅、游戏围栏。您知道，生第一个孩子最贵，这些东西弟弟妹妹还能再用，售货员说。在婴儿服的柔和色调中，我感到自己正悄无声息地被卷入一个新的命运齿轮里，这种感觉比结婚那天还要强烈，说到底，结婚的日子无足轻重。

那一晚该如何谈起呢。恐怖，不至于，但撕裂的身体所蕴含的抒情与诗意还是留给其他人吧。我很痛，这该死的助产士，我是一头蜷缩的野兽，喘息不止，宁愿身处黑暗也不愿暴露在微弱的灯光下，没必

要看到她眼中的同情，毫无用处。这份痛苦的体验既不丰富也没有变化，六个小时贯穿着相同的画面。我置身于波涛汹涌的大海，数着疼痛浪潮间隔的秒数，这些浪潮要把我吞没，必须喘着气全力与之周旋。两匹马无休止地把我的髋部往两边拉。一扇打不开的门。只有一个清晰且固定的想法，女王们坐着分娩，她们是对的，我幻想坐在一张开了洞的大椅子上，我敢肯定很容易就生出来了。这自然伴随着疼痛，从午夜开始，孩子消失在了浪潮中。没有大椅子，只有硬桌子、聚光灯和从我肚子另一头发出的指令。最糟糕的是，我的身体成了公众场所，这回倒是跟女王一样。水、血、粪便，在所有人面前扩张的性器官。看吧，此刻那儿变得无关紧要，不算数，只不过是给孩子用的一段纯洁的通道。甚至。他必须看到这崩溃的一幕，必须目瞪口呆地见证我的痛苦。他得了解，得“参与”，像医生一样穿着白大褂、戴着医护帽立在身旁。但在他面前成为这样一个扭曲的东西，奄奄

一息，他会忘记这个画面吗？说到底他在这里对我有什么用。和其他人一样，他重复着“用力，呼吸，别慌”，当我不再表现得像是个坚忍的 mater dolorosa⁷⁵（痛苦圣母），开始尖叫起来，他陷入了恐慌。“夫人，您把一切都搞砸了！”而他，“闭嘴！振作起来！”于是我咬紧牙关，不是为了取悦他们，只是为了结束一切。我用尽全力，就像把足球踢进云中一般。突然间，所有的疼痛都从我体内消失了，医生对我嘟囔，会阴撕裂了，是个男孩。惊现一只光溜溜的小兔子，一声啼哭。后来，我经常追忆这段经历，寻找这一刻的意义。当时我饱受煎熬，孤独无助，突然出现了那只小兔子，那声啼哭，在一分钟前都难以想象。一直没有意义，仅仅是之前没有人，然后出现一个人。半小时后，我在诊所的房间里重新见到他，他穿着衣服，覆着黑发的脑袋枕在枕头中间，被子一直盖到肩膀，出奇地像个文明人，我还以为诊所的人会把赤身裸体裹在襁褓中像小耶稣一样递给我。

我自豪地、不加掩饰地遵从社保手册上的规定，最好的奶就是母乳，您应该用母乳喂养，但在他咬紧牙床，像贪婪的吸盘一样吸空我的乳房时，我从未能克服恐惧。母性没有在那一刻进入我的内心，而是在诊所的某些寂静时刻降临。他在窗边读着《卡拉马佐夫兄弟》，我翻阅笔记，时不时停下来，弯腰查看我床边的小床，心中怀有一种惊愕和焦虑的情绪。开始留意他的呼吸，担心孩子可能的死亡。每天早晨，我半睡半醒地走向婴儿车。一些婴儿窒息的故事，由于被子、胸罩或宿命。后来，我在晚上出门去看电影，银幕前似乎总有一个模糊的身影，一个孩子在空荡荡的公寓里疼得尖叫。也有快乐，尚未定型的温暖柔软的肌肤，说话之前的歌声，以及所有的第一次，第一次微笑，那时还没出牙，第一次趴着颤抖地抬起头，第一次用手抓住计数器。完美的时刻。我还经历过其他完美的时刻，一些书和风景，做老师时教室里的热情。所有这些完美时刻并不对立。

剩下的事情是养育。好好照顾孩子，房东太太和我婆婆这样说。温柔地照顾，玩玩具咯，来笑一个，宝宝睡吧。工作量大得难以置信。我发现一天要换六次尿布，喂六次奶，我自己的奶水才过了十天就没了，实属有心无力。清晨五点，我盯着正在加热的奶锅。眼神呆滞。轮班的工人在这时出门上班，环卫工也在这时将垃圾倒进垃圾车，但这并不能安慰我，我觉得他们跟我不在同一个秩序中。食物和排泄，无休无止。此外，还得时刻警惕微生物和身体不适。当然可以使这卑微的任务变得崇高，视其为主动选择的需要倾注爱心的事业，总之，美化你所厌烦的东西。在流淌的奶迹和脏衣服中寻找诗意，也许可以做到。阳光明媚的早晨，当我在浴室里清洗白色和蓝色的小羊毛衣服，将它们挂在晾衣绳上时，我觉得爱这一切是可能的，我对自己说，这就是生活，莉赛特。永远不。如果我开始去爱，我将迷失自我。

好在，他是大学生，能经常陪在身边，能看到

尿布和奶瓶，听到晚上六点的哭声。再也不能耍我，只动动嘴皮子来减轻我的负担，碗你不要洗了，来听《马太受难曲》，向我提出美妙的安排。对他来说一目了然：如果只是我一个人照顾皮克，我的学业就完了，从前那个满脑子计划的女孩就此消亡。他不想让那个女孩死去。他既不残忍也不狭隘，不愿意我一夜之间变成一个推婴儿车的女人。他需要相信我跟他同样自由，无法忍受一个抹布女人的粗鲁形象。而且我还在坚持。消灭童年的希望——拥有一份职业，消灭有时模糊但从来没有被扼杀的“做成点什么事”的志向，我做不到。驴皮公主⁷⁶，可笑，执着于一场考试没有意义，不考试也能过得很幸福，真搞不懂，有了孩子却立刻想着泡图书馆，您日子还长着呢，随时可以再开始，而孩子现在正是最需要您的时候，铺天盖地的议论和指责。幸好，在这里我是聋的。哪个男人会丢下课程和笔记本去做家务给娃喂奶呢？所以我也不能。驴皮只要想要总归能找到，考试就是那张能

让我摆脱锅碗瓢盆和尿布的驴皮，是我独立的终极标志，我的幸运星。

我们一起养孩子。晚上的奶你喂，早上的我来，在淋浴喷头下洗尿布的有时是他，有时是我，两个人轮流去学校上课。不可能一下子达到圆满状态，大笑着搬运依云矿泉水，来回踱步耐心地等着孩子打嗝，但这些都可以忍受，有时还挺有趣的。从未埋怨过自己一个人喂奶擦屁股，一起分担的麻烦就不怎么是麻烦了。有时感觉像是爱情。他小心翼翼地在办公桌和衣柜之间走动，停在窗前，再继续。他的肩膀上有一只白色的包裹，里面露出一个摇晃的小脑袋。世界正是它所应是的样子。他能像我一样轻柔地把皮克放进小推车里，细致地拭去孩子嘴上黏糊糊的奶渍，也能像我一样滴几滴奶在裸露的胳膊上以测试奶的温度。养孩子我们都一窍不通，我们一起学习。我对他的动作有着无限的信任。俯身逗弄皮克的房东太太，以及地球上所有育儿嫂，谁都比不上他。这种家务分工，

我自然而然地经历着，没有想过要日夜感谢他，就好像他做出了什么英雄举动，为了“允许”我有份职业而做出了牺牲，我没有因为洗碗和做饭而要求他崇拜我，这两件家务已经彻底落到我头上了。

我还心存很多幻想。我没想到，他不久便觉得代替我给孩子喂米糊不值得，再之后，不，他没有后悔给孩子喂吃的、换尿布，但他觉得那只是因为我们的钱，还处在不确定的学生状态，所以才出现了这样一个有点离奇的插曲。

确实我们还没有在社会上安顿下来。家教不像是份正儿八经的工作，当我累得不想做饭时我们有廉价的大学食堂可去，窗帘可以脏兮兮的，家具不用打蜡，这些东西不属于我们。那天阴雨绵绵，阿尔布雷大街上全是家具店，我们一家家逛，为了避开水洼在街上跳来跳去，手牵着手。我们想买一把扶手椅。那把，布料太艳了，现代风真丑。这将是我们一起买的第一件家具，第一件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具。很有趣。

那位女士以透露机密、近似尊重的神情说，桃花心木的，纯正英式，然后用手抚过座椅上的皮革和扶手。提高音量，问我们，你们的家具是什么风格？我们犹豫片刻，没有家具，就是这样。一把英式扶手椅哪儿都能放，绝对哪儿都能。我穿着一件旧的蓝色连帽风衣，他的头发被雨打湿粘在一起。当然，你们可以分期付款。愚蠢的年轻夫妇，她瞧不起我们，却想要把她的烂扶手椅推销给我们。结束这场闹剧，我们对视了一眼。我们要考虑一下，再见。外面，笑声，雨声，快点，皮克一个人在家，他记得在一家叫“法国制造”的店里见过一把三百法郎的乡村扶手椅，明天去买。循规蹈矩，给自己添置家具的小资产阶级。这完全不是我当时的感受，我看到我们在面对社会齿轮时手无寸铁，无足轻重，这把扶手椅只是一个比唱片稍微疯狂一点点的消费，而非老派夫妇的物品。我仍然相信自己正在经历一段冒险，这足以让我想象未来一起走下去而不会彼此厌倦。不久我们将离开出租房，

搬离波尔多郊区，去哪个城市呢？他刚考完试，《世界报》上的招聘启事像旅行社的度假广告一样迷人，至少第一个月如此。布尔日的人事主管，芳泉罗兹的社会文化活动组织员，刚毕业的大学生，马蒂格，凡尔赛，艾克斯。地图上的名字一个个消失，希望也随之湮灭，找到一份真正的工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最后只剩下一个行政职位，那座城市在我的想象中是一片洁白，一汪藏青色的湖水荡漾在群山之间，山上光芒闪烁。激动地合上行李箱，波尔多再见，安纳西万岁。中学教师资格考试我当然没能通过，意料之中的事，所有人都这样跟我说，甚至尝试去考，竭尽全力要考过，这本身就太疯狂了。没关系，“他成功了，这是最重要的”，我也这样认为。我依赖他，不再完全对自己负责。然而我却坚信，我几乎没有失去从前的自由，失去的只不过是一些也许不值得哭泣的个人主义糟粕。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半。

安纳西，湖光山色，白雪，阳光，游泳，滑雪。游客的天堂。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我们没有遇到游客，他们早就离开了。街上空荡荡的，只有墓地周围还有些人。我们住的地方离城门口不远。二楼，打开行李时，透过两居室的窗户，我看到几辆汽车停在花商前面，他正在摆放上百盆菊花。还有一些戴着风雪帽，穿着褪色的黄夹克的北非人经过，他们拎着袋子或正在搬运食品筐。公寓楼下，花商的对面有一个混凝土小便池和几张长椅。刚到一个小时我就去购物了，因为这是首要任务，得吃饭。寻找一家杂货店，一家肉铺，一家面包房。我没时间欣赏街景。我对安纳西的第一个记忆是我在“阿尔卑斯之星”排队，我是否忘买了什么，黄油、盐，我觉得什么都比波尔多的贵，商贩们似乎都板着脸。我拎着大大小小的袋子，穿过捧着菊花的人群回来了。牛排很硬，他对我说需要换一家肉店。到了下午我们才开车去湖边。岸边有天鹅，就像明信片上的一样，但是山上光秃秃

的，没有积雪。一座打着石膏的大赌场，看上去已经停业了，占着湖边草地的右侧。你可以带着皮克到这里散步，晴天应该很美。

我讨厌安纳西。正是在这里我陷入了泥潭，日复一日地经历我和他之间的差异，沉没在一个狭隘的女性世界里，浑浑噩噩地面对鸡毛蒜皮的烦恼。还有孤独。我成了一个看家的女人，负责照料全家人的衣食起居，保养家中物品。安纳西，角色学习的终极阶段，此前还只是小打小闹。实打实的几年，没有任何东西来帮你减轻负担：有一位照看孩子的祖母，父母时不时请客让你不用烧那么多饭，有足够的钱雇用一个小全天都为你干活的家政工，我，什么都没有，赤条条，只有一个丈夫、一个婴儿和一套两居室，让我体会到纯粹的两性差异。家、食物、教育、工作这些词对他和对我已经不再具有相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它们从此只意味着一些沉重、纠缠不休的东西，我每年

只能在几天、最多几周的时间里暂时摆脱它们。“送给妻子十五天不用做饭洗碗的假期，俱乐部等着您。”而自由，这个词从此意味着什么。啊，那些高尚的灵魂冷笑两声，如果不想承受婚姻的后果就不要结婚，男人也会付出一些结婚的代价，看看您身边，那些只领最低工资的人，那些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整天加工螺丝的人，不，用全世界所有的苦难来堵住一个女人的嘴也太容易了，正是由于这种论调的存在我才保持沉默。

记得第一个早晨。八点钟，我独自在家带皮克，他哭个不停，厨房的桌子上堆满了早餐用过的餐具，床上乱七八糟，浴室的洗脸池里散落着成片的黑色胡楂。爸爸去上班，妈妈收拾屋子，哄宝宝入睡，还要准备一顿美味的饭菜。要知道我以前觉得小学一年级的这句课文永远都跟我没关系。在此之前，我们白天有很多时间在一起，他虽然不削土豆皮，但他在我身边，削土豆皮也会变得愉快些。我看着乱糟糟的碗，

满满的烟灰缸，有待清理的早餐剩食。当皮克停止唱歌时，屋内多么寂静啊。我在肮脏的洗脸池上方的镜子里照见自己。二十五岁。我之前怎么能觉得这样的生活就是圆满呢。

最低限度，只做到最低限度。我不会乖乖就范的。把脏盘子扔进水槽里，抹一遍桌子，整理被褥，喂饱皮克，给他洗澡。绝不扫地，更别提掸灰了，也许关于《第二性》我记得的就这些，书里叙述了跟灰尘作斗争是多么荒谬，而且注定失败。无论如何，家具还很少，只够用来坐和睡觉。要勇往直前，我重新翻开书，并不敢估量考试成功的机会，也不去想皮克很快就会到处乱爬乱摸，而且除了午睡时间白天再也不睡了。我沉浸在法语语音学中，像那些背诵九行祷告诗的人一样，带着实现非凡愿望的热情诵读动词变位表。

我没有坚持多久。

“怎么什么都没弄好！已经十二点二十了！你该

把时间安排得更好些！我到家时孩子应该已经吃完饭了，中午我想得到一点安宁。我上着班，你明白吗，生活跟以前不同了！”那对我来说生活就跟以前一样吗？没办法再去上课，要照顾皮克，烧饭……一场普通的家庭争吵。稍后我们一言不发地吃着牛排和意大利面，打开收音机，填补寂静。接二连三的听众，给出一个个动词，真够愚蠢的，这个叫作“拉力波”的猜动词游戏。我去洗碗。他坐在桌旁，嘀咕一声，“怎么会这样”，带着一种非常疲惫的语气。是啊，婚前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时刻。我不会原谅他，我不想掉进这样的陷阱：要持续不断地体谅他，要有负罪感，因为我没有准备好热腾腾的饭菜，将烦人的婴儿藏起来，微笑着迎接他。日后当我去“外面”工作时，他要求享有的这些特权，我甚至连暗示一下都不可能。但他说得对，不再是同样的生活了，他被卷进这一工作制度中：上午八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到六点，甚至还要加班，坚守岗位，表现出自己是不可或

缺的，工作能力强，是一个“有价值的管理者”。在这个秩序里，根本容不下皮克的米糊菜糊，更不用说清理洗手池了。在这个秩序里，最好是餐桌已经摆好，妻子笑脸相迎，一家之主得到休息和放松，然后在一点三刻恢复精神重新出门上班。是他还是这个秩序，我不知道究竟是哪一個将我抛进了两性差异中。

他中午回家时，发现餐桌已经摆好，皮克在床上可爱地睡着，收音机搁在他盘子旁边。洗手池打扫过了，烟灰缸被清空，床铺得整整齐齐。本来只是最低限度的家务量开始膨胀。要取悦他，避免他的责备，尽量。比起我正养成的观念这都不算什么，而且这一观念很快变得毋庸置疑：不该忽视一个如此漂亮的小家。

社会运转得很好，猜一猜一对年轻夫妇会用他们的第一笔钱做什么。一个西班牙风格的木制落地灯，一面古老的镜子，一张牌桌，一架旧钢琴，纱帘。物品一件件进入我们的生活，逐个安置在我们周围。我

们还是手牵着手，再次站在商店橱窗前。客厅，卧室全套，三十个月的分期付款。我们其实更喜欢逛二手市场，不太昂贵的古董，有些许风格，慢慢淘，就像《玛丽-克莱尔家居》中的情景。周六，我们不紧不慢地走着，花几个小时摸索、比较、讨论，不够大，这颜色不行，要古铜色再明显一点，更有岁月感的，没有流苏，单色调的，太贵了。看看这盏灯。你也看到价格了。下个月再说。你觉得下个月东西还会在这儿吗。但是这盏灯跟我们家客厅真的很搭。我们小心翼翼地吧灯带回家。他立刻试用了一下。一个彩虹色的灯罩，天花板上轻盈的阴影，桃花心木桌面上出现一个明亮的光斑。他把一本精装书放在光圈里，微微挪动一下，然后拿开，换成一个烟灰缸。完美。我们相视而笑。当然我们知道幸福并不等同于物质拥有，存在和占有的不同我们都学过，而根据马尔库塞的说法，物质这种肮脏玩意儿会使人异化。但不管怎么说，住在空无一物的两居室里也太傻了，而且我们买

的东西又不是随便什么垃圾，经过了我们的思考，体现了我们的品位，简直是一门艺术，我觉得我们通过自己的审美态度摆脱了消费狂热，让自己得到了净化。

与此同时，纤尘不染的炉灶简直让人不敢在上面煎鸡蛋，明亮的冰箱配有脚踏，方便腾不出双手时用脚来打开。旧煤气灶被打入冷宫。面对这些新设备，我感到陌生，但也觉得很有趣，带玻璃门的烤箱，黄油温度控制钮，强烤，弱烤，“女士，不管您家人喜欢吃什么，您的罗拉都可以帮您做出来。”炉灶居然还有个名字。哦，真是荒唐，但我还是很高兴看到人生中第一个舒芙蕾在烤箱里膨胀起来，而他惊叹不已，做得很成功，太棒了。幼稚，但是无关紧要，我觉得。甚至有什么东西正在微妙地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开心吃下去的舒芙蕾，刚买的镜子，他小心翼翼地把那面镜子挂在墙上，把锤子拿过来，把挂钩递给我。属于我们三个人的迷人的小窝。和去年那个

没有风格的租住房相比，简直天壤之别，当时我们怎么能忍受的。天真的喜悦。但糟糕的是，意想不到的陷阱设在商店橱窗前。我们被卷入其中的秩序有着不可动摇的内在逻辑。纱帘，掏空家底负债买给自己的家具，怎么能不“保养”它们呢，怎么能让它们蒙尘失去光泽，怎么能让它们沾染污垢变脏变丑。尘絮在床底下跳舞，溢出的牛奶干掉形成棕红色的图案，从前这都没关系。现在必须保持我们生活环境的美观。保持和谐。我不是有一台全新的吸尘器吗，有一堆配件，甚至可以吸走看不见的灰尘。我会努力的，即使从柜子里拿出设备、组装、更换配件、重新放好，比用扫帚打扫要多花三倍的时间。不，我不喜欢，我烦躁地从一个房间穿梭到另一个房间，从一个插座换到另一个插座。我觉得自己是被迫的。要不然该以另一种方式生活，一种我无法想象的截然不同的方式。安纳西，那是一种“有前景的处境”。

好，中午见，走啦，晚上见。孤独。不是十八岁那年晚上十点从卫生间窗户望去体验到的孤独，也不是当他刚离开后我在旅馆房间里感受到的孤独，在意大利，在鲁昂。而是待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身边只有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娃娃，要完成一些彼此没有关联的琐碎任务，是这样的一种孤独。我不习惯。就好像我突然被社会淘汰了。他将迎接路上寒冷的空气，刚开门的店铺的气味，他会走进办公室，工作开始有些艰难，但处理完一份文件后会感到满足。是的，我嫉妒，为什么不呢，面对困难的焦虑，战胜困难的乐趣，我也喜欢啊。在这个温暖的屋子中，有怎样的困难，怎样的胜利，做蛋黄酱没有失手或者让皮克转哭为笑。我开始活在另一种时间里。在咖啡馆露天座上度过的那些悬停的、慵懒温柔的时光终结了，十月的“蒙田”早已远去。读书一口气读到最后一章不知今夕何夕，跟伙伴们谈天说地，这样的时光终结了。对我来说，孩提时代和前面几年的生活节奏：紧

张充实地投入一件事，另一件事，然后身心突然放空、敞开，休息，这样的节奏已经消亡。他可没有。中午、晚上、周六和周日，他重新找回了放松的时间，阅读《世界报》，听唱片，核对支票簿，甚至无聊发呆。他的业余消遣。我度过的仅是充斥着各类乱七八糟任务的时间。衣服要分类送去洗衣房，有颗衬衫纽扣要缝，要跟儿科医生约时间，家里没有糖了。盘点这一切，从未引起任何人的感动或笑声。西西弗斯和他不断推上山的巨石，至少还有点意思，天空中勾勒出一个男人立在山上的身影，一个女人在厨房每年三百六十五次把黄油丢到锅里，既不美也不荒谬，这就是生活，朱莉。有人说那是你不知道如何统筹安排。统筹安排，这个对女性使用的美妙动词，所有杂志都充斥着建议，要节约时间，我婆婆建议说，如果我是你，要想快点就得这样做那样做，实际上这些都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干尽可能多的活儿而不感到痛苦或沮丧，因为痛苦或沮丧会让身边的人不舒服。我

也相信这些做法：提前整理好购物清单，在橱柜里储存一些食品，冷冻兔肉以防有客人突然来访，醋瓶时刻准备好，晚上把第二天早餐要用的碗摆好。在一个不断吞噬当下的系统里，我们从未停止向前，就像在学校里一样，但我们永远看不到尽头。我的信条可以说是速度。绝对不要轻盈的步伐、饱含爱意的抹布、切成小花状的西红柿，而要突击行动，一路奔袭，以便在早晨挤出一个小时的时间，这往往只是美好的幻想，尤其要冲向一天当中的大缺口，那终于找回但随时可能丧失的个人时间：我儿子的午睡。

正值花样年华，两年光阴，我生活的全部自由维系在孩子下午能否睡着的悬念中。首先观察，均匀的呼吸，一片宁静。他睡着了吗，为什么今天不睡，心生烦躁。终于睡了，暂时可以喘口气，一段脆弱的时光，提心吊胆，生怕他醒得过早，汽车喇叭声、电话铃声、楼梯口的说话声，我真想给他的床周围塞满棉花球。我有两个小时可以扑在备考上。尖叫声、积

木哗啦啦倒塌的声音、玩具熊的吱吱声，每一次我都觉得自己举步维艰。但是刚醒来的宝贝那么漂亮，那么纯真，我知道，他活得很幸福。我也欢快地卷起窗帘，变换嗓音说，宝宝觉觉睡得真好，去尿个尿吧，然后我们俩一起去公园遛弯，给天鹅喂面包，我哈哈大笑，哼唱小曲，给皮克挠胳肢窝，以此来增加做母亲的喜悦。将他留在围栏里然后自己塞上耳塞继续工作的可耻念头远离了我。首先，我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母亲，皮克一醒我就立刻冲向他的房间，仔细检查尿布，闻闻味道，做好婴儿车出门的准备，但要慢慢来，要依着孩子的节奏。但我为什么非如此不可。我小时候那些屁股没擦干净的娃娃，浑身散发着刺鼻的酸味，在一个疲惫不堪的邻居大妈或糊涂的祖父眼皮底下独自成长，几乎受不到什么教育，难道我可以以他们为榜样吗？这些宝宝的母亲都很穷，对育儿方法一无所知。而我住在一套漂亮的公寓里，有充气浴缸、婴儿秤和涂在红屁屁上的软膏，完全不同，还有

心理分析的这条诅咒：“三岁之前决定一切”，我烂熟于心。这句话无时无刻不压在我的心头，当然只压着我，因为是我一个人在照顾孩子。做事井井有条，讲究卫生的现代母亲，她们的男人在“办公室”，从来不在工厂，男人上班时她们打理家务，有一本写给她们的“圣经”叫作《我如何抚养孩子》，我，显然，是这样一位母亲。四百多页，卖了十万本，内容全都关于“妈妈这份职业”，我们抵达安纳西没多久，有一天他把这本指南带回来，作为礼物送给我。书里的女士，权威口吻，如何测量体温，如何给孩子洗澡，同时像儿歌一样低语，“爸爸是首领，是英雄，是他指挥，这很正常，因为他最高大，最强壮，是他开车，他能把车开得飞快。妈妈是仙女，她会哄我，安慰我，对我微笑，让我吃饱喝足。什么时候喊她她都在”，第四百二十五页。书里尽说些鬼话，说没有人能像我那样好地照顾皮克，即使是做父亲的也不行，他没有父爱本能，只偶尔拨动“心弦”。令人窒息。

而且以阴险的方式制造恐惧，让人产生负罪感，“他在喊您……您充耳不闻……几年后，您会不惜一切代价让自己还能听到他说：妈妈不要走。”

于是每个下午，我带皮克出门，让自己成为一个无可指摘的母亲。出门，把这个称之为出门，跟从前同样的字眼。对我来说外面的世界已不复存在，所谓的外面不过是屋内的延伸，要操心的还是那些——孩子、回来时要买的黄油和尿布。不再有好奇心，不再有探索发现，一切围绕着生活所需。天空的颜色在哪里，墙头的日光在何处。跟狗一样，我对于安纳西的了解一开始仅限于人行道。总是低头观察路面，路缘石的高度、宽度，可以过，过不了，穿越各种障碍曲折前行，五花八门的柱子，《法兰西晚报》和《法兰西周日报》的广告牌，鲁莽地撞到婴儿车的行人。

在公园里，带孩子的都是女人，要么安静地坐在长椅上，要么在午后沿着小径懒洋洋地散步。消磨时间，等待孩子长大。她们向我打听皮克的年龄，跟她

们自己的孩子作比较，出牙情况，走路，干净程度。然后，当皮克自己走路，跟其他孩子一起玩耍时，得盯牢，女人们会不动声色地使心眼，也会达成默契一致反对在周边拉屎的脏狗，以及在小径上骑车的满十二岁的大孩子，这些应该禁止。聊天没有或几乎没有其他内容。我仍记得从前女生们之间的聊天，并不久远，距今甚至不到三年，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完全不同于对孩子无聊的品头论足。但是，“我今晚要和马尚约会该穿哪条裙子”与“赶紧出门，爸爸一会儿就回来了”，这两者有很大区别吗，后一句我也经常说。我们每个人都被孤立在众所周知的已婚女性的光环中，无奈地围着孩子转，没有危险，因为我们不敢任性，不敢倾诉，就好像丈夫的阴影始终横亘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周围，风光旖旎，湖泊，蓝灰色的山脉。六月，赌场的乐队为游客们进行露天表演。布鲁斯和斗牛士舞曲一直传到孩子们玩耍的沙池边。生活，世界之美。一切都跟我无关。再没有什么可探索

发现的。回家，烧饭，洗碗，用来看书学习的脆弱的两小时，睡觉，周而复始。也许还有做爱，但这也已经成了屋内之事，无需等待，没有意外。回家时我从市中心走，因为路比较宽。一家又一家咖啡馆，进去一些单身的女孩子，一些男人。而在这个城市我只有一个去处，只有在那儿我带着一个幼儿才不显得突兀，一个属于女人的地方，从售货员到顾客清一色的女性，把食物和宝宝放到购物车里一起推着，这样不太累：逛超市，每次出门的奖赏。

是的，我知道，皮克对着天鹅咯咯直笑，在草地上爬来爬去，然后开始扔球，看到三轮车一脸不可思议，带着严肃的表情滑滑梯。可我自己。要是说感到束缚，窒息，立刻会引来质疑，又是一个只考虑自己的女人，夫人，看着孩子，看着您的孩子醒来，喂养他，哄他睡觉，带他迈出人生最初的脚步，回答他人生最初的“为什么”，如果您感受不到这项任务的伟大——语调越来越高，然后突然下坠——那就不该生

孩子。这人世间最美的工作，要么做要么不做，不要斤斤计较。我从来没觉得这份工作有什么伟大。至于幸福，无需《我如何抚养孩子》的指导，我从来不会错过那些总是突如其来的幸福。九月的一个午后，我给他买了一辆红色的小汽车。只见他迈着十八个月的腿脚，一步一步走下“不二价”超市的台阶，两只手紧紧地胸前抱住小车，迫不及待，怯生生的。还有之前，有一天，他第一次尝试挪动身躯，站着，从扶手椅到我的椅子，小脸紧绷，过来之后立刻笑了，一趟，很多趟。我不需要回忆一切来证明我“也”是个真正的母亲，就跟从前是个真正的女人一样。我也不想加入那种充满比较、对立的秩序，您难道不觉得跟孩子度过的时光比在机器上打字、生产轴承更充实，甚至比一切书籍都更有价值吗，生活就是这样，而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生活最美好的馈赠，这套说辞我已经听过了，正是它让我最终没有去找戴眼镜的小老太太。如今我要说那是我在十八岁时完全没想

到，也根本想象不出的，一种存在于米糊、四联疫苗接种、要用肥皂擦洗的塑料内裤、涂在牙龈上的“德拉巴尔”牌止痛糖浆之间的生活。绝对、彻底地承担起照料一个生命的重任。注意，不是责任！我独自抚养皮克，但受人监督。医生说什么了，他指甲太长，你该给他剪了，他膝盖上怎么了，摔倒了吗？所以你当时不在他身边？一直要做汇报，他的语气并不专横，而是故作温柔的、正常的。晚上当他抱起已经吃饱喝足、洗过澡、换上过夜的干净内裤、喜笑颜开的皮克，就好像我忙碌了一整天就为了能在这十分钟把孩子交给父亲过目。他把皮克抛到空中，挠他胳肢窝，一个劲儿亲他。我看着父子俩，笑了起来，怀着一种疲惫的满足。那么多时辰的看管、照料、对自我的放弃。如同他的母亲一样。你有什么好抱怨的，那些未婚妈妈和离婚女人都没有男人可奉献自己。然而有时，在公园里，推着婴儿车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手里推着的是他的孩子，而不是我的，仿佛

我是一个洁净、和谐的系统里一块活跃、顺从的部件，这个系统围绕着他这个丈夫和父亲转，让他感到安心。现代女性，穿长裤和皮草外套，带着孩子走在小径上。再加上湖面浮着几只天鹅，或者飞来一大群鸽子。要是他遇见我，眼前的画面应该很讨他欢心。

他从来没有推着婴儿车穿过安纳西，小心地与人群拉开距离，嘴里不停说“对不起，对不起”。他从来没有坐在一张长凳上等着午后时光流逝，等着孩子长大。安纳西，他是在下班后两手插在口袋里，安静地去熟悉的，所有的空间都自由展现在他面前。而我只知道推婴儿车和购物时走的路，肉店、药房、熨衣店所在的路，一些实用的路。到了晚上，当我跟医生、理发师有约，或者要买点什么，一个人出门而他留在家里看皮克，我像只半死不活的苍蝇一样疯狂地冲向人行道，一个女人独自走路该怎么走，我必须重新学会。家、公寓，对他来说是游离在他身外的一个避风港的形象，而不是一个总是需要重新恢复秩序的

地方，一进门就跃入眼帘，大包小包的东西要整理，小家伙的饭要准备，要给他洗澡。说到底我们住的不是同一套公寓。他点燃一支烟，上下打量着温柔的落地灯和泛着光泽的家具，他在亮闪闪的陶瓷马桶里尿尿，在每天都清理得一尘不染的洗手池里洗手，他穿过走廊干净的瓷砖地面，来到客厅读《世界报》。他能体验到家庭生活的一切温暖，在其中感到舒适自在，待在家里多么幸福啊。他没有清洗过，擦拭过，像食粪昆虫一样在墙角杳晃忙活过。只有愉悦。尤其不能乱放抹布、清洁剂或拖把，这像什么样子，他用指头把“这个”捏着拿到我面前，就好像一件荒谬的、无法忍受的东西出现在了装潢中。只有美与秩序。下午两个小时。厨房里，午餐的痕迹都被抹去了，水槽锃亮如镜。我把那口乡村风格的炖锅放回到桌子上，蓝色锅身印着几个吹芦笛的牧童。隐隐约约的“雪松”牌清洁剂的味道。皮克睡着了。为了谁、为了什么要维持这种整洁，只是为了有人来时，我不

必像我的姑姑婶婶们那样说，屋子这个样子不要在意。我从早晨七点开始忙忙碌碌，最终得到的是这样一场虚空。这个时间应该会有些女人吞下药片，给自己倒一小杯酒或者乘火车去马赛。世界停滞了。

他饿了。不用去决定吃什么，去准备、搅拌、把握火候，从食材到食物转变的每个步骤都不曾闻到气味，把餐巾铺在膝盖上，看着崭新的食物端到面前是怎样的感觉。我已经不记得了。当然有时会下馆子，极少，需要请人看孩子，真是非比寻常，菜肴散发着金钱的香味以及“亲爱的，今晚我带你出门”。不是他的节日，一天两顿，气定神闲，没必要说谢谢，芹菜沙拉，五分熟的牛排，在平底锅里快要融化的煎土豆。当我给自己盛了一份土豆坐在他对面，我已经闻了半小时了，几乎提前咀嚼过了，总是要尝一下，看看盐放够了没，土豆熟没熟，没了胃口，真正的胃口，即食欲和口水。而他，至少他该吃下去，回报我

的努力，这已经够难对付的了，他也该洗盘子，我讨厌剩菜，那意味着白费功夫，浪费精力，一想到要把剩菜弄进冰箱里，要重新品尝，重新端上桌，重新加工，我就已经反胃了。吃饭的快乐和好奇心，我不想让它们彻底湮灭。女人们爱吃零食，总是被揭穿，都是些沮丧的、幼稚的女人，偷偷摸摸地满足口腹之欲，啊呸，可恶的举止。而我相信，偷偷吃几口巧克力或奶酪，胡乱来几口面条乃至生菜叶子都曾拯救了我的饥饿。零食，这是属于我的预制菜，不需要盘子、刀叉这些让人想到餐桌礼仪的东西，这是对永远要计划、购买、准备的吃食的报复。三百六十五顿乘以二，灶头上九百次煎炒和炖煮，成千上万枚要打碎的鸡蛋，要翻面的肉片，要倒空的牛奶瓶。所有女人天生的工作。不久以后，像他一样拥有一份职业，还是难以逃脱，还得做饭。有什么工作是一个男人仅仅因为他是个男人，每天两次，每天都要做的吗。少女时代每个月做的巧克力慕斯小蛋糕早已远去，那时候

我快乐地把这个当成证据，证明我也跟其他女孩一样能用自己的十根手指做出东西来。几公斤的食物炖煮好，立刻被吞进肚子里，给生命供给能量，这取决于一个人站在哪个角度，从我的角度来看，这像是一步步迈向死亡。

我已经习惯了，在厨房里扎着小红结的便签上写下购物清单，平时做点简餐，周日和家族聚会时做大餐。不要客气，再来点。真美味，我亲爱的姑娘，这真美味。让他们吃到撑喝到顶，以欢快的表情看着我，她做饭真有一手，没想到啊，原先看着不像是会做家务的，多么意外的惊喜。我不再跟往昔时光进行比较，好像做饭这件事不值一提，把它看得就像每日洗漱一样自然，试着从中获得满足感，翻阅菜谱时，感觉可以创造出无穷的菜式，每天都不重样。然而有时还是会泄气。

晚上七点，我打开冰箱。鸡蛋、奶油、生菜，食物整齐排列在搁板上。丝毫没有做晚饭的欲望，更糟

糕的是，完全不知道做什么菜。厨娘的崩溃，头脑一片空白。我似乎什么都不知道了。一分钟浑浑噩噩，直到听见冰箱发出声音，一种恢复条理的提醒。做点吃的，随便什么都行，把日子过下去。于是我选择了最熟悉的食谱，机械地做起意面加煎鸡蛋。

最糟糕的是超市里的精神分裂症，难以预料。我推着购物车走在货架之间，面粉、油、鲭鱼罐头。犹豫不决。总是这样的先兆。在我旁边，一些女人如蜜蜂采蜜般快乐地采购着，都是行家里手。另一些则停在罐头、饼干前，翻来覆去地看，仔细钻研包装上的文字。我也许需要为明天、接下来几天采购很多东西。可我什么都不想买。我在食品货架之间的通道晃荡，眼前的食物越来越没有区分度。音乐、光线和其他女人的决断力，一切都让我反感。我突然得了厨娘失忆症。如果放任自己，我会立刻离开那里。努力一把，盲目地丢进去包装好的熟食、奶酪，平静地在收银台等待，前面那些胜利的购物车里食物堆积如山，

被女顾客们用双手拿到面前。只有在外面我才觉得解脱。在冰箱前或购物车后产生的对于存在本身的恶心，简直是个大笑话，会让他取笑一番。在学做主妇的那些年里，一切都显得那么渺小卑微，不值一提，难以说出口，除了几声轻微的抱怨，几缕哀叹的尘埃，我累了，我没有四只手，你还是自己做吧，家务怨曲自然而然从我这里流露出来，他充耳不闻。仿佛那是一种正常的语言。或一种普通工人的抗议，老板在内心将这样的抗议声视为愚钝的老调重弹，可以忽略不计。

确实有不断的计算，我给他准备午餐，刷洗西装，他就应该疏通下水道，倒垃圾。你给自己买了一张唱片，那我就给自己买本书。该死的，很好我回答混蛋。这可不太像互相交换的自由。我曾经试过这种方法。斤斤计较的细节，令人精疲力竭，我算计着自己买本书，或任由垃圾桶被塞满，既不快乐，也不是真正的反抗，而是出于报复心理。从结婚开始，我

觉得自己一直在追求一种怎么也得不到的平等。剩下吵架，激烈的吵架，表演一切，反抗、离婚，取代思考与讨论，持续一个小时的毁灭，我的苍白生活中的红日。感到体温上升，气得发抖，脱口而出第一个反常的句子，破坏和谐：“我受够了当保姆！”等待他戴上面具，等待有力的辩驳，那些辩驳将会刺激我，帮助我重新找回一种失去的语言，带有暴力与对其他东西的渴望。用让他反感的粗鲁方式，语无伦次地说这种生活太蠢了，宁愿死掉也不愿像他母亲那样，要攻击当然最好是攻击他心中的神圣之处。对于被异化的命运可以咆哮，没有被他居高临下微笑着制止，“请你不要夸大其词”，这是一种幸福。但后来我忍住，不吵，“为了小家伙”，在他面前，你不感到羞耻吗，尊严，其实意味着服从。一个坚定的父亲和一个一言不发的母亲，十分有利于孩子的安宁。

也许是一个阴沉的周日。旅游淡季常见的一个死

气沉沉的午后。我肯定已经让皮克吃完饭了，轮到我们自己吃午饭，烤牛肉、四季豆，也许还有布丁。洗碗收尾。突然，轻松的语气，自然而然说出的句子：“丽兹在上映褒曼的最新一部电影。”另一句：“如果我今天下午去看，你会生气吗？”还有最后一句，因为我的沉默。“干嘛要两个人都守着小家伙？”我没有崩溃，也没有吼叫。一个无耻而合乎逻辑的结论：这就是婚姻，要么一个人抑郁，要么另一个人抑郁，两个人都抑郁那就属于浪费了。同样明显的是，我的位置是在孩子身边，他的是在电影院，而非相反。他去看了电影。后来，夏天他去打网球，冬天去滑雪。而我要一直守着皮克，带皮克溜达。噢，美好的周日……三点钟升起宝宝屋子里的窗帘，街道空无一人，公园，天鹅。有时心里会有嫉妒。从公寓里或从婴儿车后面看过去，世界分成两半：他可能拥有的女人，我永远都不会再有的男人。晚上，他一边讲他白天的活动，一边狼吞虎咽，滑雪让人饥饿。“我家

那个，每周日都去打猎”，“我家那个的爱好是帆船”。钓鱼、徒步、桥牌、单簧管、滚球和台球，他们爱好广泛，而女人们，总是善解人意，“他整天在合唱团，玩滚球”，简直为之自豪。那您的妻子，她的爱好是什么？她想要重新开始打网球，但我不确定她是否真的渴望。各种渴望必然是一个接一个地，自行消失。别再烦我了，你去滑雪啊，说到底你是自由的！当然，在烧饭、带孩子、做家务之外，在形而上学上，我是自由的。

阻止他把皮克留给我一个人照顾。强迫他。他真是好意思把我从前的原则甩给我，要彼此独立，不要一直捆绑在一起互相束缚，等等。来吧，把我当成黏人精，或更刺激一点，当成母螳螂，被阉割的女人。他那套弗洛伊德理论，我跟他说对我不起作用，不，我才不想做被阉割的女人，被阉割，多么丑陋的画面。而且，什么才是更值得热爱的，是一个人在公园带娃的孤独，还是电视机前两颗心虚伪的共鸣、周

日全家人在鹿苑的闲逛，抑或动物园小径上独特的风景，在那道风景里，父亲们把孩子扛在肩上同时觊觎着别人的妻子，反之亦然。可悲。周日，午睡时分，跟平时一样，我努力备考，始终把那场考试当作我的幸运星。

考前两个月，我选择了托儿所，早晨当我把赤裸的小身体通过窗口塞给保育员时，夜晚当我不能第一眼认出那个穿着全市统一格子衫的小男孩时，必然怀有负罪感。当一个男人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成功通过考试，人们总是祝贺他英勇的妻子，疼爱地说，他的成功有您一半的功劳，您给予了他精神上的帮助和支持，不让孩子哭闹，让他没有后顾之忧。而对于他，人们更多的是同情。一个麻烦的女人，他都忍受了些什么。总而言之，他更喜欢被同情，要是像一个隐在幕后的女性那样被祝贺，让人疑心他帮助了我，多没面子，对一名主管和受人尊敬的管理干部的形象不好。男性价值观，神圣的两性差异，我算是领教

一二了。

读成绩单，感觉自己洗去了一年的辛劳，冲到大街上，酒吧的气味带来突然的幸福，置身于六月或十月的人群，一整天都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这是从前会有事。拿到中学教师资格证，我体会不到丝毫的快乐。阅读现代小说史或戏剧理论时有太多需要分心的事：焦虑的午睡、洗婴儿服、盯高压锅、削胡萝卜皮。这像是一次额外的机会，我觉得评委们暗自嘉奖的不是我的智力水平而是我作为母亲的功劳。

我成了一名教师。起初这是学习的目的，后来是解放的希望，是在公园带娃和擦洗平底锅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的希望。开学那天我差点迟到了，家政工没赶上来我家的公交车。走廊里人挤人。接着出现四十张脸庞，下个小时的课是三十五张，然后是二十四张，这些晃动的身体，这些眼睛，这些还没开口但准备好要向我提问的嗓音。远处的小公寓，此刻阳光正洒向厨房，温柔的灰尘和米糊，一个孩子简单的温情。尽

管我曾诅咒这种窝在家的生活，想要抵制它，但它还是占据了我的心。这也是第一个上午我需要提心吊胆加以抑制的东西。在家时要么昏昏沉沉一片安静，要么是皮克的咿呀学语，在这里只是讲话和被人倾听，感觉好奇怪。但是愉悦感来了，也许是源自力量感的愉悦。我重新抓住了世界，甚至身处四十名学生中间的孤独也变得那么激动人心。重生。放学时，我心里盘旋着很多计划，要出门，去图书馆，教科书先放一放，要另外找一些他们会喜欢的文本。我依然记得第一天晚上，九月的暑热几乎还未散去，我感觉自己的生命被白天遇到的所有那些生命打开，炸裂，眼前浮现出他们的样子，我还叫不出名字来，有的眉头紧蹙，有的神气活现，一个女生陷在椅子上，神情恍惚，真是千人千面。我想立刻就为第二天备课，立刻就读学生们交给我的卡片，上面写着他们的家庭状况、兴趣爱好。与此同时，一阵疲倦袭来，让我产生听一张唱片的冲动，听完再投入工作，然后再坐下来

吃饭。跟他一样。确实不想做其他事，所以他是对的。但是就此打住，你好啊，两性差异，坐下来，逗一逗皮克，读《世界报》，做梦，陶醉于第一个工作日的女人不切实际的幻想。一到家，我见到了家政工离去的背影。得由我来给皮克做饭，我的食物也不会自己跑到盘子里。备课，要等孩子睡下。至于他，看电视。我不是教师，我永远都不会是教师，而是一名女-教师，细微区别。我进入角色学习的第二阶段，最苦涩，也最不易察觉。拥有一份职业，这是我一直渴望的，是在孩子午睡时，在公园遛娃时我的幸运星。一方面，家庭主妇，我深感厌恶；另一方面，单身生活，想必很空虚。不得不认为我目前的状况是最好的。最终我们不再跟自己从前想要的生活，而是跟其他女人的生活作对比。从不跟男人比，怎会有这样的念头。然而，那些男同事能以审慎、庄重的步伐离开学校，走向他们的汽车，从容、舒展地去参加工会会议，倾听彼此的发言，对有关恶劣工作条件的提

案进行投票，吹毛求疵地界定工作范围，主张教师无需监督学生，无需批改罚写的作业，在细节问题上施展辩才只为了能少干点活，这也许是男人的习惯。而我作为妻子和母亲，一路飞奔。中午十二点，下午五点，他们想要在课后讨论，没时间，再见了孩子们，我的小家伙在等着我，我得去肉店。我不会成为我自以为可自由支配时间的教师，光是运转起来就已经耗费我相当的力气，上课、购物、批改作业，冰箱里空空如也。出错了，雅克师傅⁷⁷是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同样的工作，但从不忽视家庭生活，进校时把它暂放在校门口，离校时再带着它一起走。晚上，当我把意面倒进沸水，皮克围着我打转时，感觉我的生活被填得满满当当，再没有空隙能塞进去一丝一毫的意外或好奇。我不敢这样想，听听他们所有人的议论，教师，“对一个女人而言”是多好的职业啊，十八小时的课，剩下的时间都在家里，有那么多假期可以照顾孩子，梦寐以求，而且这份工作完全不会给身边人带

来痛苦，“实现了自我”，能挣钱的女人，同时还是个好妻子、好母亲，有谁会抱怨呢。甚至我自己也不再抱怨，我已经深陷全能型女性的陷阱，最后还为自己感到自豪，有能力协调一切，竭尽所能维持生计，一个孩子和三个班的法语，家庭的守护者和知识的传播者，女超人，不仅只是个知识分子，总而言之一个和谐的女性。当再没有其他东西，尤其没有任何思考能行得通时，就轮到抒情上场了。和谐、“全能的”男性，在外面上着班，在家里系着围裙给孩子洗澡，如果存在这样的男人，他不会到处歌颂自己所做的一切。我已经安顿在两性差异里，不去进行那样的思考。我觉得他不去购物很正常，因为男人站在购物车后面太滑稽了，有错位感；我也习以为常地接受，他的薪水对我们来说是完整的一大笔钱，而我的薪水被视为一份补充，尽管数额不小，但总要从扣掉好几笔，用来支付家政工、第二份工资的税等，剩下的跟他的相比就只是薄薄的一小沓了。我还怎么敢说我的工

作不是为了快乐，只是为了快乐。每当周六开班级议事会需要让他带孩子时我总有负罪感，他本来可以去打网球的，想让他去倒垃圾时我也总是犹豫不决，家务之海里的一滴水，有什么用呢。甚至温柔，我也尝试过，亲爱的塑造你自己，塑造吧，在男人身边这样更有效，争强好胜会破坏别人的生活。注意，两种声音，一种用来跟学生说话，充满活力，尽可能接近男性权威，像那些在家吼叫揍人的父亲，外面的声音；而另一种，在家和跟他出门时的声音，小鸟依人，无足轻重，适度发声，对于外面生活的一切，班级，教学，都保持着低调。那些爱看侦探小说、情绪激动的女人，我们知道，都是麻烦制造者。幸运的是你比较平和，他说，而这意味着我对我的职业保持沉默。

假期。我跟其他女人一起坐在沙滩上，身边满是小桶和小铲子，与此同时，单身的女孩们奔向海浪，因为到一定时间，最糟糕的安慰也不再可怕，暗

想也会轮到她们，丈夫一整天驾着帆船乘风破浪而她们被孩子拴住。我相信亲子度假村，只接待亲子，两个食堂，一个吵闹黏糊，是孩子们的；另一个无聊透顶，是父母的，见面寒暄您今天下午做什么，这里真不错，我是医药代表，您呢。有一年我们呼吸到了普罗旺斯的空气，还有一年是在阿基坦地区，皮克午睡时有专人看守，我俩去晒日光浴，身边没有小桶小铲子，晚上在松树下跳舞。模仿一种从前的生活，那时我们还没有被各种账单、共进午晚餐以及孩子捆绑在一起。模仿而已。在回程的高速公路上，不可能抱有幻想，剩下的十五天不会留下美好回忆。我想着得买一桶洗衣粉来洗脏衣服，还得买面包、火腿和牛奶。你就不能管管你儿子吗，哄哄他，真是烦死人了，我在开车呢我。我在真正的大家庭里度过了几周。最糟糕的几周。妯娌们剥着豆子闲聊，而父亲先生和他的儿子们在钓鱼或打牌。母亲夫人骄傲地去喊他们：“男人们，过来吃饭啦！”在这种愉悦的氛围中，看着

别人欢快地接受了自己的角色，我觉得我不太正常，神经兮兮的。对男人这么小肚鸡肠真是可耻，让他们好好放松，像孩子一样玩耍，难道你更希望他拈花惹草，一个人度假吗，养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他肯定已经受够了。

我还有一个多月才开学，这舒适的一个月可用来扮演家庭主妇和温柔的母亲，而他在办公室上班。你知道，你做教师有多么幸运。终于有时间仔细检查衣物的状态，去除污渍，亲自带皮克去看天鹅，滑滑梯，尝试做桃子果酱和虾仁牛油果。还可以享受阅读的乐趣，在孩子午睡的宁静时刻写诗。总之，像一个现代女性，务实，不单单只会做饭，有一些创造力，画画，做靠垫，绣绒绣，玩填字游戏。我在哪儿读到过弗吉尼亚·伍尔夫“也”会做馅饼，你看这并不冲突。两个半小时。皮克在睡觉。纸，笔。随便写什么，日记、诗歌或小说。时刻担心他醒来。不仅如此。我无法相信我所写文字的真实性，写作像是在虾

仁牛油果和遛娃之间的一种娱乐。一种从事创作的假象。皮克醒了。重新开始严肃的工作，给他穿衣服，吃点心，去公园，文学间歇只能等到明天了。孩子午睡时，最好还是翻阅《新观察家》杂志，玩单人扑克或在阳台上晒太阳。这与我现在的生活相称。

我慢慢走出了跟童子尿相伴的岁月。皮克开始上幼儿园，尿布和婴儿车成了糟糕的回忆。我等这段时期的到来已经等得够久了，逐渐获得解放，一切变得跟从前一样，或几乎一样。终于熬到头。我身边有各种类型的活动，社团，您来参加戏剧俱乐部吧，您来听弗雷内⁷⁸教育讲座吧，学习滑雪，学打网球。我甚至不再清楚我真正渴望的是什么。什么都尝试了一遍，什么都没有坚持下去。太耗精力，总是半途而废，一些会议要请假，皮克得了麻疹，还有一些会议，为了回家烧饭中途开溜。这一切都只是混乱的家庭生活，在家务中随波逐流。而这，这次冒险，可能

只需要跟他再多聊几次，金发男同事，令人心动。最糟糕的是，我能把一次秘密约会安插在哪儿呢。

那最简单、最温和、毫无风险的冒险，在我能力范围以内，几乎不用做什么就能实现，只需要将二十一颗有害的胶囊遗留在药柜抽屉里。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的。在投入这唯一会得到所有人认可，会被全社会和夫家祝福的事之前，我几乎没有丝毫的不安，这件事不会惹恼任何人。我到处宣扬正当理由来为自己开脱，独生子女太可怜了，不好，两个才完美，雷米和柯莱特，安德烈和朱利安，来摸摸妈妈的肚子，小妹妹就在里面哦，提前就让自己的眼眶湿润了。真正的动机在于，除了要个孩子，我再也想象不出如何才能改变一点我的生活。我再也不能跌得更低了。

八天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真奇怪，我简直无法相信，二月的这天早晨闹钟响起，今天有六小时的课。不可思议，一夜之间恶心感如蘑菇一般在我胃里长出来。要么呕吐，要么流泪。现在我看到了我所

选择的冒险。半岁以内的嬉戏，散步时一手推着婴儿车一手牵着皮克。再见了教师实习，再见了社团，再见了给予他一整个冬天把他晒成花花公子面色的雪山顶，以后再说。连绵不绝的周日，要守着两个孩子而不是一个。太棒了，多么有想象力。面对这场偷偷谋划的怀孕，他一脸愕然，简直像是在谴责，仿佛面对的是一个愚蠢的举动。立刻谨慎地拉开距离：“最遭罪的还是你自己，我的小伙伴。”不用他说，我知道九个月后只有我自己会冲奶粉，给奶瓶消毒。扮演给孩子喂奶的父亲，昨日的小游戏已经结束，那时还年轻，如今不再有角色的扭曲，他怎么可能还会做这些，他一整天都要工作，等等。美妙的产假在等着我，要是还在他耳边诉苦那是多么可笑啊。

肚子重新开始鼓起来，不像上次那么令人吃惊，已经习以为常。公寓里潮湿的夏天，湖边广场平滑的热浪，皮克在广场上拍皮球，回来时穿过阴暗的街道，我感到自己浑浑噩噩的，手挡在前面保护自己，

防止有游客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一份沉甸甸的重量将我跟世界与未来隔绝开来。尽管如此，我并不急于在某天夜里躺在玻利瓦诊所的刑架上去受折磨。尽可能久地享受跟一个孩子共度的最后时光。我作为女性的整个经历就是不情愿地沿着台阶往下走的过程。

从床上我能看见湖面蓝色的波纹，秋天笨重的苍蝇在玻璃上横冲直撞。他那么完美、圆润和贪食。在那些金黄色的午后，我时不时打盹，胸脯有规律地膨胀成巨大的卵石。我蜷缩在分娩的柔软景色里。好好享受吧，老阿姨，睡吧，让自己像蜂王一样被诊所里那群女士围着打转，被她们养着，千万别费神去问问题，否则产奶会受阻，不能顺利地将奶水喷射到小嘴巴里，这是已被证实的。只能玩弄给布娃娃穿的弹力连体服和套衫，是别人送我的，写出生通告来炫耀胜利，老二来了！还有，每小时十次，弯下腰去看摇篮里的新生面孔，确认他的呼吸正常。这一切都是我自己想要的，想当作一次冒险，那就好好品味。因为

这会是最后一次。停下⁷⁹，我再也不玩了。一个虚幻的自主决定，所做的无非是制造了理想家庭，是布丽吉特，伊尔达，所有女孩幻想未来时所想象的那种家庭：生两个，挺好。

挺好，意味着忍耐极限，不能在本义和引申义上的烂屎里⁸⁰陷得更深。产假，无论从学校还是从我的大肚子来看，都像是一个长假。我们变得越来越没有脾气。清晨五点一阵啼哭划过脑袋，第一次喂奶，重新入睡直到七点钟突然被打断，一家人早餐，给皮克做好准备去上幼儿园，第二次喂奶，接着做家务搞后勤，头昏脑涨，丝毫考虑不到自己。不过他很好，在工作“之外”，还会给家里采购东西，谢谢，谢谢。为了保持清醒直到最后一次喂奶，我跟他一起看电视。疲劳。孤独。但是到了外面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哦，是这样一幅平淡无奇的画面：一个年轻女人在幼儿园门口等候，她前面停着一辆漂亮的婴儿车，里面睡着一个可爱的宝宝。我没有抱怨，产假结束会更难

熬，同事会在学期中途把学生甩给我，晚上要批改作业和备课，皮鲁将由一个陌生女人照顾，每天我都要给她交代各类事项。我投入育儿中，真正的育儿，当年带皮克时可没这样过，孤军奋战，吹毛求疵，高度警觉，啊这一个，不会像当年我们还是大学生时带的另外一个，这个不会泡在自己的尿里，我带着他慢悠悠地在公园里溜达，成为一个像《我如何抚养孩子》里的那种母亲，那本书又被找出来了。每周看着婴儿秤上的刻度，我感到心满意足。洗衣机正在咀嚼一大桶脏衣服，客厅地板刚刚仔细拖过，散发着“雪松”牌清洁剂的香气。夜晚的公寓尽显温柔，我和皮克用乐高搭房子，我对他说，快，我们拿奶瓶去给弟弟喂奶，爸爸一会儿就回来了。他亲吻孩子们，把皮鲁逗得咯咯笑，读《世界报》。洗完碗后，我跟他一起看电视。家庭和谐。天气晴朗时，我会平静地去公园，婴儿车不会碰到路上的任何人。我坐在长椅上，身边全是老人和照顾婴幼儿的女人。我等着到时间去幼儿

园接皮克放学。生活应该就是这样了。我二十八岁。

我们感到害怕，惊慌失措，女性的忍耐力真是惊人，他们把这叫作坚韧。我成功地抚养了第二个孩子，同时还要教三个班的法语，还要购物、做饭、修拉链，还要给孩子们买鞋。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因为，他总是想说服我相信，我是享有特权的，每周有四天半家政工上门服务。照这样说，哪个男人不享有特权，每周七天都有他宠爱的女佣在家服务。作为老师的我，可支配时间自然比从前更少，渴望进行教学研究，参加各种活动俱乐部，对男人或单身女孩可以，对我改日再说吧。为什么要待在一所高中，将作为母亲的时间花在批改作业和备课上。我也跟其他想要平衡一切的女老师一样，迫不及待奔向那座美妙的避风港——初中，从初一到初四，比高中轻松多了。即使我没那么喜欢。“职业发展”，还是留给男人们吧，我的男人已经投身其中，这就够了。彼此间的差

异，什么样的差异，我已经觉察不到了。我们一起吃饭，在同一张床上睡觉，读同样的报纸，以同样的讥讽听同样的政治演说。拥有共同的计划，换辆车，换套公寓，或翻修一座老房子，等孩子们大一点了去旅行。我们甚至表达过同一种模糊的愿望，都想要以另一种方式生活。他有时会叹息着说婚姻是对彼此的束缚，我们很高兴能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

不知不觉，实习期已经结束了。之后，一切成了习惯。家里各种零碎的声音，咖啡机，锅碗瓢盆，低调的老师，干部的妻子，在外身穿卡夏尔或罗迪耶牌服饰。一个被冻住的女人。

回来的路上我跟皮克慢慢走着，那是在冬季。火车站广场小花园里，喷泉中间的雕像上不再有水流淌。坐在婴儿车里的皮鲁浑身被裹得严严实实，他伸手想要抓住盘旋在水池上方的鸽子。我觉得自己仿

佛失去了身体，只剩一个眼神落在广场建筑物的外立面、圣弗朗索瓦学校的栅栏和正在上演一部戏的萨瓦剧院上，戏名我忘了。

差一步，只差一步。很快我就会像理发店里那些面孔沧桑的女人，每当看见她们仰着头，闭着眼睛冲洗头发时，我总是心生厌恶。还有多少年。只差一步就会有再也遮不住的皱纹，坍塌的脸。

我已是这张脸。

译者注

1. 米糕 (gâteau de riz): 将大米在牛奶中煮熟后加入奶油和鸡蛋, 再倒入焦糖, 最后在烤箱中烤熟的点心。
2. 一种老鼠形状的糖果, 用焦糖制作, 外面裹一层巧克力。
3. 戴利 (Delly) 是 Jeanne-Marie Petitjean de La Rosière 与 Frédéric Petitjean de La Rosière 姐弟俩合用的笔名, 两人都出生于 19 世纪 70 年代, 主要创作一些通俗爱情小说, 其作品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一直是法国社会流行读物。
4. 《愤怒的葡萄》是美国现代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 (John Steinbeck) 创作的长篇小说, 发表于 1939 年, 描写美国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恐慌期间大批农民破产、逃荒的故事。
5. 《布丽吉特》(*Brigitte*) 是贝尔热纳夫人 (Berthe Bernage, 1886—1972) 创作的小说, 描写中产阶级少女生活。
6. 《女奴……或皇后?》(*Esclave... ou Reine?*) 是戴利的一部小说的名字, 女主人公是有着虔诚天主教信仰的少女。
7. 转桌 (les tables tournantes): 一种招魂术道具。招魂者

将手放在桌子的上部召唤亡灵，如果桌子出现回旋或任何异常变化，说明亡灵进行了回应。

8. 甜点名。
9. 博尔盖塞别墅（la villa Borghèse）：罗马大型景观园林。
10. Fraulien：德语的“小姐”。
11. mademoiselle：法语的“小姐”。
12. francesa：西班牙语“法国女人”。
13. 法语中“周三”（mercredi）跟“该死的”（merde）谐音。
14. Ségur：塞居尔伯爵夫人（1799—1844），法国儿童文学开创者，著有《小淑女》《苏菲的烦恼》《苏菲的假期》等作品。
15. 一种调情动作。
16. 1905 年创刊的少女期刊，1960 年停刊。
17. “雅克说”是法国一种儿童游戏，一人发出指令：“雅克说……”其他人要按照指令做出规定动作。小说中“我”和伙伴们玩“雅克说”的游戏，发出指令的是一个女孩，“我”听到“雅克说”便开始思念跟自己玩轮滑的小男孩雅克。
18. 1923 年出版的法国小说，讲述的是一名 15 岁少年和一名少妇的婚外情，少妇的丈夫在一战前线。
19. 一种古希腊陶土小雕像，主要在塔纳格拉地区出土。
20. 1917 年在葡萄牙法蒂玛（Fatima）看到圣母玛利亚显现的三个牧童。
21. 1846 年在法国拉萨莱特有两名儿童看到圣母玛利亚显现。
22. “有两个”（duas habet）出自拉丁语“Duos habet et bene pendentes”（有两个而且是下垂的）的前半句，该句出

自中世纪的一则传说：9 世纪一个名叫让娜的女人伪装成男人并成功当上教皇，因为当众分娩被识破，之后的教皇上任之前，会坐在一张有洞的椅子上，一名修士会为教皇检查性器官，确认是男性之后高呼一声 “Duos habet et bene pendentes”（有两个而且是下垂的）。

23. 忏悔证 (billet de confession)：神父提供的证明，证明某人已向他做过忏悔。
24. 苏利·普吕多姆 (Sully Prudhomme, 1839—1907)：法国现代诗人，1901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25. Etoiles des neiges，一首描述牧羊人和牧羊女之间爱情的流行歌曲。
26. Boléro，一首描述跳波莱罗舞的男人细腻情感的流行歌曲，“红黑色的天空下吉他在歌唱”是其中的歌词，尊重原文未加引号。
27. 玛嘉丽 (Magali)：畅销书女作家让娜·菲利贝尔 (Jeanne Philbert, 1898—1986) 的笔名，她一生创作了一百多部小说，以爱情小说为主。
28. bahut 原指餐具橱，在学生俚语中指中学。g.d.b. (gueule de bois) 字面意义为木头嘴，指宿醉之后身体的不适症状。
29. 弗朗索瓦丝·阿诺尔 (Françoise Arnoul, 1931—2021)：法国女演员，在 1950 年代红极一时。
30. 路易·马里亚诺 (Luis Mariano, 1914—1970)：西班牙男高音歌唱家，在法国也很有名。
31. 法国初中学制是四年。
32. 莫里哀 1672 年创作的喜剧，女学究菲拉曼特是家中强势的女主人，克里沙尔是懦弱的男主人。

33. 阿兹纳武尔 (Charles Aznavour, 1924—2018): 亚美尼亚裔法国男歌手、词曲作者、演员和作家。
34. 皮雅芙 (Edith Piaf, 1915—1963): 法国 20 世纪最著名的女歌手之一, 代表作有《玫瑰人生》。前文“只要你向我提出要求”是皮雅芙歌曲《爱的礼赞》中的一句。
35. 布拉桑 (Georges Brassens, 1921—1981): 法国 20 世纪著名男歌手与词曲作者。
36. 詹姆斯·迪恩 (James Dean, 1931—1955): 美国男演员。
37. 让·马莱 (Jean Marais, 1913—1998): 法国男演员。
38. 派特斯合唱团 (The Platters): 由五位美国黑人歌手组成, 也称五黑宝合唱团。
39. la bonne aventure ô gué, 法国童谣里的一句歌词。
40. 杰拉尔·菲利普 (Gérard Philippe, 1922—1959): 法国“二战”后最知名的男演员之一。
41. 贝科 (Gilbert Bécaud, 1921—2001): 法国男歌手、作曲家和钢琴演奏家。
42. “再见”的意思, 该词源自意大利语。
43. 一种文字游戏构成的问候语, 由 comment vas-tu 和 tuyau de poêle 组成了 comment vas tuyau de poêle。
44. 文字游戏, dans quel état j’erre (我在哪国游荡) 与 dans quel étagère (在哪个架子上) 发音相同。
45. 温柔乡地图 (la carte du tendre): 17 世纪文人圈流行的一张地图, 所有的地名都以爱情生活中的行为来命名, 如“尊重丘”“憎恨海”“冷漠湖”等。
46. 20 世纪 50 年代法国的高中生要在高二期末参加“高考第一部分” (la première partie du bac) 的考核, 通过者才

有资格在高三毕业时参加最终的考试。

47. 萨特的小说《恶心》的男主人公。

48. 加缪的小说《局外人》的男主人公。

49. un coup de jus de parapluie, 口语中饮用水的别称。

50. 此处不是指作者现实中的朋友布丽吉特, 而是“布丽吉特”系列书中的中产阶级女主人公, 前文已作注解, 此处不再另注。

51. 考试是二十分制。

52. Hypokhâgne, 希腊语化的法语单词, 用来指为报考高等师范学院做准备的文科预科一年级。

53. 康德的伦理学原则。

54. 波德莱尔诗歌《忧郁》中的句子。

55. 波德莱尔、魏尔伦、普莱维尔都是法国著名诗人。

56. 1962 年上映的美国西部片。

57. 1961 年上映的法国新浪潮电影代表作, 导演是阿伦·雷乃。

58. 指的是法国大学文学院和理学院第一学年, 此学制 1966 年被废止。

59. la Côte d'Azur, 法国南部沿海度假胜地。

60. 珍·茜宝 (Jean Seberg): 美国女演员, 在法国取得事业上的巨大成功, 主演了戈达尔的《精疲力尽》, 以标志性的超短发和中性打扮引领一代潮流。

61. 唐·胡安 (Don Juan de Austria, 1547—1578): 西班牙帝国全盛时期的将军。

62. 莫迪利亚尼 (Modigliani, 1884—1920): 意大利画家, 1906 年来到巴黎蒙马特高地生活与创作, 在巴黎去世。

63. Marsupilami, 一部漫画中想象出的动物形象。

64. 由插画家佩奈 (Raymond Peynet) 设计的情侣玩具娃娃。
65. 反秘密军队组织 (anti-O.A.S.): 秘密军队组织 (Organisation armée secrète) 是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一个准军事组织, 反对该组织则是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 捍卫和平。
66. 雷·查尔斯 (Ray Charles, 1930—2004): 美国音乐家、钢琴演奏家, 开创了节奏布鲁斯音乐。
67. 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帕斯卡 (Blaise Pascal, 1623—1662) 关于宗教信仰的一种论述, 他认为理性的个体应该相信上帝存在, 并依此生活。因为如果相信上帝, 而上帝事实上不存在, 人蒙受的损失不大; 而如果不相信上帝, 但上帝存在, 人就要遭受无限大的痛苦, 即永远下地狱。
68. 布勒东和阿拉贡都是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
69. 原文直译为“我的妻子”, 但原文存在故意的语法错误。法语的名词和冠词有阴阳性区分, “妻子”(femme) 是阴性名词, “我的”(ma) 应该用阴性形式, 文中“我的”(mon) 用的却是阳性形式, 即 ma femme 说成了 mon femme, 让“妻子”(femme) 这个词产生了阴阳性兼具的效果。汉语词汇没有阴阳性, 只能勉强译为“我的队友”。
70. 《鸭鸣报》(*Le Canard enchaîné*): 创刊于 1915 年的法国报纸, 以讽刺幽默风格评论法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
71. 法语中星期三 (mercredi) 和该死的 (merde) 发音接近, 小说中“我”婆婆是个有教养的女人, 遂用 mercredi 来取代 merde。

72. 指的是圣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她不能生育且年事已高，依靠神的力量怀上了圣约翰。一次圣母玛利亚来看望伊丽莎白，圣约翰在伊丽莎白腹中欣喜得颤抖。
73. 指《圣经》。
74. 原文助产士说话 z 和 3 不分，译文为了取得相似效果，将“准爸爸”说成“怎爸爸”，“伸胳膊”说成“森胳膊”，“真的”说成“增的”。
75. 原文用的拉丁语。mater dolorosa 译成法语为 mère douloureuse，这个短语特指圣母玛利亚，她经历了见证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等七项苦难。
76. 法国童话故事，讲述一个公主为了逃避父王安排的不合理婚姻，披上驴皮出逃的故事。
77. 雅克师傅（Maître Jacques）：莫里哀《悭吝人》中阿巴贡的车夫和厨子，现指身兼多职的人。
78. 弗雷内（Célestin Freynet, 1896—1966）：法国教育学家，主张以学生的自由表达为中心来组织教学：自由写作与绘画、校际通信、学生办报、调查研究等。
79. Pouce（停）：法国儿童游戏用语，表示让游戏暂停。
80. 在法语里，merde 是表达烦躁、厌恶时的常见粗话，用来指废物、麻烦事等，其本意是屎、粪的意思。这里之所以要用上本义，是因为母亲要经常面对婴儿的排泄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冻住的女人 / (法)安妮·埃尔诺
(Annie Ernaux)著 ; 曹冬雪译.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 -- ISBN 978-7-208-18990-4

I . I565.45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4Y8V740 号

责任编辑 赵 伟

封面设计 e2 works

封面画作来自朱鑫意的“2020”系列作品

被冻住的女人

[法]安妮·埃尔诺 著

曹冬雪 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 159 弄 C 座)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8

插 页 6

字 数 95,000

版 次 202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8990-4/I·2159

定 价 52.00 元

La femme gelée

Annie Ernaux

©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81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4

本书禁止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销售

2022 年诺贝尔文学奖“安妮·埃尔诺作品集”

已出版

《一个男人的位置》

《一个女人的故事》

《一个女孩的记忆》

《年轻男人》

《占据》

《羞耻》

《简单的激情》

《写作是一把刀》

《相片之用》

《外面的生活》

《如他们所说的，或什么都不是》

《我走不出我的黑夜》

《看那些灯光，亲爱的》

《空衣橱》

《事件》

《迷失》

《外部日记》

《真正的归宿》

《被冻住的女人》

《一场对谈》